

11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5061/5600.1

CL  
DEC 31 1959

#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10

1959

慶祝建國十周年

## 1959年10月号(总第88期)目录

### 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成就 ..... 王利宾、傅懋勛 (451)
- 语言教育的深刻变化和迅速的发展 ..... 張志公 (455)
- 十年来汉语语法学的成就 ..... 陆仁 (458)
- 十年来新闻语言的发展 ..... 毛成棟、王学作、王国璋 (463)
- 国庆十周年谈文字改革 ..... 杜松寿 (469)
- 机器翻译的研究 ..... 刘涌泉、高祖舜 (471)

试谈开国十年以来艺术语言的发展和問題 ..... 吳曉鈴 (479)

戏曲语言与普通話 ..... 馬少波 (483)

大力推广普通話, 相声演員保証把勁儿加! ..... 侯宝林 (485)

昆曲的语言音韵 ..... 韓世昌 (487)

鲁迅作品中的色彩词的运用 ..... 朱泳縈 (488)

现代汉语中一个新的語助詞“看” ..... 陆儉明 (490)

昌黎話的几个語法特点 ..... (493)

### 語文短評

636—648 条 ..... (497)

評《談北昆的“漁家乐”》一文的語病 ..... 楊靜仁 (498)

### 書刊評介

介紹两本苗汉詞典 ..... 王輔世 (封四)

###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

研究工作近况 .....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学术秘書室 (478)

党的教育方針在民族語文教学工作中的輝煌胜利 ..... 吳一飞 (499)

全国汉语方言初步普查基本完成 ..... 方祖高 (507)

十年来我国語言学界記事 ..... 本刊編輯部 (501)

# 我国少数民族語言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成就

王利宾 傅懋勛

我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滿族、畚族通曉漢語以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解放以前，我們大部分少数民族語言都沒有进行过調查研究：有研究的，不是偏于書面語言，就是限于一个民族的个别区。对于广大群众所使用的語言作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是开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和政府把少数民族語文工作作为民族工作和語言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提出了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任务，确定了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字母的原则，組織少数民族語文科学家集体制訂了少数民族語文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1956—1967)远規划，并且在科学院和有关省、自治区建立了專門少数民族語文研究机构。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高等学校中設立了民族語文系和專修班。还在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成立了負責出版民族文字書刊的專門机构。为了全面地討論少数民族語文发展和研究工作中問題，1955年和1958年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全体的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和两次有关出版及辞書工作的專門會議。为了研究語言調查队的調查报告和文方案中的重要問題，在有关地方共召开了十次語文討論会。由于党和政府提出了明确的方針任务和各項重要措施，我国的少数民族語文工作就在各党委的具体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根据第二次少数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制訂的民族語文工作三年(1958—1960)規划，要求我們“苦战三年，争取在1958年内帮助那些需要創制文字的民族完成文字方案的制訂工作。在1960年内帮助那些需要改革文字的民族初步提出文字改革方案”。到1958年，我們已經帮助僮、布依、苗、彝、侗、哈尼、傣、佤、黎和納西十个民族創制了文字，帮助傣、景頗和拉祜三个民族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改革了文字。所有已提出并確定創制和改革文字的民族，都完成了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这说明我国少数民族語文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一样，也实现了大跃进。新創制和改革的十几种文字，大多数已經出版了課本、讀物、報紙。新文字受到了本族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对地区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运动起着重大的作

用，适应了生产建設的需要。

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項細致的科学工作。为了研究各民族語言的关系和发展規律，以促进各民族語言的发展，我們的研究工作不限于創制或改革文字的語言，对那些不需要創制和改革文字的民族語言也进行了科学研究工作。

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們仅就有关少数民族語言科学研究方面，分以下六点作簡要的叙述。

## 一 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

我們从1950年就开始了少数民族語言調查工作，当时由于人力少又缺乏經驗，所以只在某些民族地区进行。1956年，少数民族語言科学調查队伍成長起来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同中央、西南民族学院合作，分別在北京和成都組織了共約五百多人的語言調查訓練班。學員們毕业以后，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組織了包括七百多人的少数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队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到現在为止，已經在云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甘肃、青海、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十六个省、自治区，調查了僮、布依、侗、水、黎、毛难、仫佬、苗、瑶、藏、羌、傈僳、哈尼、拉祜、納西、景頗、傣、白、阿昌、佤、彝、土家、蒙古、达呼尔、东乡、土、保安、鄂温克、鄂倫春、赫哲、維吾尔、哈薩克、柯尔克孜、烏孜别克、撒拉、裕固、塔塔尔、塔吉克、錫伯、仡佬、畚、京等四十二个少数民族的語言。除了根据事先編好的調查大綱搜集語音、語法、詞汇的材料以外，还記錄了短篇和長篇的故事、民歌、格言、諺語，每个調查点一般都記錄了一千到四千个詞，有些重点地区多到一万个詞以上。归納了音位系統，研究了語法規則。在进行方言比較的时候，还和国外相近的語言进行了比較，譬如拿我国維吾尔語、哈薩克語、柯尔克孜語同苏联的維吾尔語、哈薩克語和吉尔吉斯語进行了比較。拿我国蒙語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語进行了比較，拿我国傣語同泰国的泰語进行了比較。我們就是根据这些語言調查



材料编写各种语言的调查报告,描写语法的。其中《藏語拉薩、日喀則、昌都話的比較研究》、《布依語調查報告》、《布依語語法研究》、《僳僳語語法綱要》、《景頗語語法綱要》等書都已經出版。現在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正在編寫一部包括三十八個少數民族的語言,約一百四十萬字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還編寫着四十八個少數民族語言的概況,此外發表的論文也很多。這些調查研究的成果,為解決我國少數民族文字問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也為語言的綜合性的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 二 語言和方言的識別

我國民族語言的情況是很複雜的,即使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以後,對一個民族在不同地區所說的差別很大的話,究竟是不同的語言呢,還是同一個語言的方言呢,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會發生過不少爭論。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原則是:如果一個民族不同地區的話有顯著的共同特徵,而且這些特徵又足以使它們區別於同語族或同語支的其他語言,儘管這些地區的話差別很大,甚至於不能互相了解,它們還是同一個語言的方言,而不是不同的語言。例如苗語,在湘西和貴州省松桃,四川省的秀山構成了湘西方言,在貴州東南部、廣西大苗山和三江一帶構成了黔東方言,四川南部、貴州西部中部和南部、雲南東部以及廣西隆林各族自治縣構成了川黔滇方言。說這些方言的人是不能用方言互相通話的。苗語工作隊曾以湖南省花垣縣吉偉話代表湘西方言,以貴州省凱里縣養蒿話代表黔東方言,以貴州省畢節縣先進話代表川黔滇方言,進行了一千一百多個根詞的比較。結果是湘西和黔東的異源詞占63.38%,湘西和川黔滇的異源詞占67.32%,黔東和川黔滇的異源詞占59.98%。同一個語言內部在詞匯上有這樣大的差別是很少見的;但是它們有共同的語音、語法、詞匯的特點。例如在詞匯方面,有一批基本詞,如“牙齒”“豬”“虎”“厚”“薄”等都和同語族的瑤語(本文“瑤語”都指“勉瑤”語)不同;從語音對應上看,在很多詞上苗語的k q相當於瑤語的tp, e相當於瑤語的ǎu。苗語沒有p t k m四個韻尾,元音不分長短,而瑤語有這些韻尾,元音分長短。在語法方面,名詞作從屬性的名詞修飾語的時候,苗語一般是修飾的名詞在被修飾的名詞的後邊。瑤語支一般是修飾的名詞在被修飾的名詞的前邊。如“牛角”,苗語(川黔滇方言——下同)說ko¹(角)nio²(牛),瑤語說ŋðŋ²(牛)tpðŋ¹(角)。指示詞和

量詞修飾名詞時,苗語量詞在前邊,指示詞在後邊,瑤語指示詞和量詞都在前邊。如“這個人”,苗語to¹(個)nen¹(人)na³(這),瑤語說nai³(這)ta¹(個)mjēn²(人)。這些特點,可以很清楚地和瑤語開。同時它們的民族自稱,雖然在各地發音不同,如說湘西方言的人一般自稱qo¹pion¹,說黔東方言人一般自稱mbu¹,說川黔滇方言的人一般自稱moŋ¹。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它們的對應關係基本上是同一個民族名稱。因此,把上述各地區的苗語分為方言而不把它們看成不同的語言的意見是正確的。海南島苗族說的話和瑤語各方言是有共同的區于苗語的特徵,應該是瑤語的方言,不是苗語的方言,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語言。

瑤族的語言情況和苗語不同,他們說的話,是三民族語言。一種是勉語,這是語言分類中的瑤語。一種是布努語,它的特点和苗語極相近,應該屬苗語支。一種是拉珈語,它具有僮侗語族語言的特点,應該屬侗語族。不能把它們看成同一語言的不同方言。

## 三 方言的划分

關於方言划分的标准,曾經發生過而現在還存在着爭論。有的同志認為必須有語法的差別才能划分方言。我們認為應該根據某一具體語言的具體情況來划分方言,在語言差別的大小方面很難定出一個統一的标准。划分方言可以主要根據語音、詞匯、語法,或把其中二者或三者結合起來作為划分方言的根據。這就是說,即使在語法上沒有差別,也可以划分方言。根據過去這一階段划分各種語言方言土語的工作經驗,以語法作為方言的主要特徵的情況,還沒遇到。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民族語言內部在語法結構方面基本一致的,一方面說明了就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划分标准來說,語音和詞匯更為主要。划分土語一般主要根據語音的特点。例如以詞匯和語音為主把苗語划分为上述所說的三種方言;把彝語划分为部、東部、南部、東南部、西部和中部六個方言;把吾爾語划分为中心、和闐和羅布三個方言。有些語言內部雖然有語音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和同語族的其語言的內部差別程度比較起來是很小的,我們就只分了土語而沒有划為方言,例如撒拉語划分了兩個土語,東鄉語划分了三個土語。有的語言內部很一致,有一些零碎的細小的語音差別,我們既未划分为方言也未划分为土語,例如東部裕固語、西部的裕固語、毛難語。當然,在划分方言土語的工作中,還應該參民族的历史、人文等方面的材料,例如各地的自稱,



特点、地理分布情况，等等，但主要应该根据语言的  
情况。

#### 四 音位系统和语法构造的研究

为了设计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方案，首先就要进行  
位系统的研究。在我们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不少  
同志只根据一个语言的原有语词（包括早期借词）归  
音位系统，把正在大量增长着的汉语新借词的语音  
情况排除在音位系统的研究工作以外，这种只看静止  
像而不从发展中来观察问题的作法，是违反历史唯  
主义的。我们已经指出了这种偏向。现在已经明  
显，当我们归纳音位系统的时候，要把新借词和原有语  
词（包括早期借词）的语音情况联系起来研究。在一  
种情况下，通过汉语新借词增加了一些音位和复元音，而  
这些音原来在本族语言里不论是作音位或音位变体都  
出现过。例如：苗语湘西方言增加了一个辅音 f，一  
个元音 e，一个卷舌元音 əɿ，一个复元音 ue。西部裕固  
增加了 f 和 ʃ 两个辅音和 ai, au, ei, ie, uo, ye, ian,  
uai, əu, ia, io, ua, uə, ya 十六个复元音，其中  
有的七个复元音除了在汉语借词上使用外，还用在  
本族语词上。在另一种情况下，有些语音原来在民族语  
中是音位变体，由于汉语新借词语音的影响，使这些  
变体转成了音位，例如侗语 ph, th, kh, tɕh, phj, khw  
等送气音本来是 p, t, k, tɕ, pj, kw 出现在一定声调  
的变体。由于汉语借词的送气音出现在它们原来不  
出现的声调中，所以在现代侗语音位系统中所有这  
些送气音就成了许多独立的音位。我们还注意到，对  
某些语言或方言不能完全根据孤立的词来得出一套  
完整的音位系统，还要根据词跟词连用时的语音情况  
确定音位系统。例如苗语滇东北次方言的石门坎第  
一调 and 第三调的词单独使用时都读高平调，但是根据  
它们和别的词连用时的语音情况就应该把它们分为第  
一、三两个调。这样做的根据是第一调在任何环境下  
不变调，但它能使它后边作修饰语的词变调（除第一、  
七调以外都变），例如：

$ti\alpha u^1 + z\alpha u^2 \rightarrow ti\alpha u^1 + z\alpha u^1$  羊毛  
毛 羊

$ts\alpha u^1 + mpa^5 \rightarrow ts\alpha u^1 + mpa^7$  猪鬃  
鬃 猪

第三调不能使后边的修饰语变调，但它在第一调  
第二调后边作修饰语的时候，它本身变第五调，例

$i^1 + t\alpha^3 \rightarrow i^1 + t\alpha^5$  一朵  
一 朵

$dz\alpha^2 + t\alpha^2 \rightarrow dz\alpha^2 + t\alpha^5$  九朵  
九 朵

上述第一和第三调的词在这个次方言的其他地区（如  
武定）就按不同的调值分成第一调和第三调。可见处  
理一个语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统的时候，一方面应该看  
到它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一个词在连续的  
话里的非音位变体的变化，不应该只看原有语词，或只  
就一个一个的孤立起来的词观察问题。这种观点的确  
立，解决了音位系统的研究工作中不少的困难问题。

在语法构造的研究方面问题更多。摆在我们的面  
前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一个语言的语法体系，特  
别是对于那些一向没有进行过语法研究的语言。在这  
方面我们进行了很复杂的工作。现在我们对这些语言  
的语法体系总算是都提出了初步的意见，尽管还有许  
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们在进行语法体系研究工  
作中并不拘守成规，主要根据一个语言的语法结构特  
点来进行，例如：动词和形容词在景颇语中具有很大的  
共同特点，它们都受副词的修饰，都能在后边加上助词  
ai 以后修饰名词，都用前加词头的手段表示他动，都  
可以使用重迭式给词增加“弱化”“经常”“全部”等附加  
意义，更重要的是动词和形容词都用后加语尾助词（这  
样的语尾助词有二百三十六个）的手段构成“人称”  
“数”“体”“式”“方向”等语法范畴，因此把景颇语的动  
词、形容词合并成“谓词”是有根据的。又如一般称为  
指示代词的在苗语中同代词有显著的区别：1) 代词修  
饰名词的时候放在名词前边，但指示代词放在名词的  
后边；2) 代词能单独回答问题，指示词不能单独回答问  
题，代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指示词不能；3) 代词能直  
接修饰名词，指示代词必须同量词或数量词组连用才  
能修饰名词。根据这种情况，苗语工作队在苗语词类  
系统中把指示代词从代词里抽出来另立了一类“指示  
词”。在建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系统方面还有许  
多困难问题，我们正在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研究解决。我  
们已经把三十八个民族的语言的语法体系（其中有一  
些参考了前人的著作）写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  
里，以便大家作进一步的讨论研究。

#### 五 新词术语

解放以后，我国各民族间是平等、团结和友爱的，  
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各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使各个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获得飞跃发展，民  
族间交往也日益频繁，因此在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中  
都增加了大量的新词术语。我们一开始调查的时候，  
在语言调查工作队里，有不少同志只注意搜集民族语  
言中的旧词，忽视了新词术语的调查，这是“厚古薄今”  
的思想意识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中的表现。经过

批判,大家認識到这是不对的。为了弥补过去的缺点,近两三年来我們不断地派工作组到民族地区去研究新詞术语在人民口語中产生、使用 and 发展的情况。对已有文字的語言还在出版物中搜集有关新詞术语的材料。1958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出版工作会议和今年举行的少数民族詞書工作会议都着重地討論了少数民族語言新詞术语的問題。根据我們的調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新詞术语的产生和使用有以下的几种情况和趋势:

1) 少数民族語言制訂新詞术语有音譯、意譯、半借半譯、音譯加注、借音譯义、借詞素另排、音譯加本族語言的附加成分、旧詞賦予新义和創造九个方式。虽然在某几个語言,如藏語、蒙語,意譯的詞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总起来看,从漢語里音譯的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其次才是意譯,至于用其他方式制訂的新詞术语是很少的。

2) 解放以前,各少数民族一般从邻近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語言吸收借詞,借詞的来源較多;就一般情况說,解放后主要是从漢語中吸收借詞。

3) 在早期的音譯詞中,除了在某些民族的書面語言中增加了某些新的音位和音节的書写法以外,从群众的口語系統看,一般都适应了本族語言的音位系統。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四、五年以来,由于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漢語对少数民族語言的影响也就更深了,增加的新的音位和音节也就更多了。这样就自然地使借詞的語音更多地跟漢語相同和相近。

以上的趋势反映了我国各少数民族語言的新詞术语逐渐靠攏漢語,各民族語言中共同成分逐渐增加的客觀規律。現在各个建立了書面語的民族已經初步提出了制訂新詞术语的原則和一些具体办法。由于在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很多新事物不断出現,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在各民族的語言中新詞术语也在不断增加。新詞术语的研究将是一个比較長期的工作,我們还需要及时地从民族語言的口語和書面語中搜集更多的資料,研究新詞术语的发展規律。

## 六 語言的相互影响 和民族标准語的規範

我国各民族語言在历史上早就产生了相互的影响。解放以前少数民族語言相互的影响主要产生在邻近的民族当中,只有漢語和少数民族語言的相互影响是最有普遍性的。根据我們的初步了解,漢語很早就

从少数民族語言中吸收借詞,而且这些借詞几乎全是音譯的。解放后这类詞大有增加。但是应该指出,我国各民族語言的相互影响中漢語对各少数民族語言的影响是最广泛和最深入的,这不仅表现在新詞术语的吸收和音位系統的变化方面,同时对許多語言的语法形式和句子构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們正在这方面广泛地搜集資料进行研究。例如:在侗語里都把限制的代詞、名詞和形容詞放在中心詞的后边,而在侗語南部方言里又增加了把限制的代詞、名詞、形容詞放在中心詞前边的新結構,这种新結構和原結構并用;在北部方言里已經以新的結構代替了原結構。两个方言都吸收了漢語的結構助詞 *tji*<sup>6</sup> (例如:“我的書”原来只說 *le*<sup>2</sup>(書)*jau*<sup>2</sup>(我),現在說 *jau*<sup>2</sup>(我)*tji*<sup>6</sup>(的)*le*<sup>2</sup>(書)。“英勇的人民解放軍”現在一般都說成 *jan*<sup>6</sup>(英)*joŋ*<sup>4</sup>(勇)*tji*<sup>6</sup>(的)*joŋ*<sup>2</sup>(民)*kai*<sup>4</sup>(解)*faŋ*<sup>4</sup>(放)*tən*<sup>6</sup>(軍)。侗語還吸收了漢語的一些連詞如“虽然”“可是”“因为”“所以”这样就使侗語增加了許多新的語句結構,丰富了表达能力。現在我們正在按照不同語言分別进行对少数民族語言影响的研究,少数民族語言研究的主編《漢語在少数民族語言中丰富发展中的作用》文集,有些論文已經完成初稿。深入研究漢語对民族語言发展的影响,对于少数民族标准語的制定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怎样对待借入形式和本族語言形式的并用現象,怎样处理在本族語言材料基础上的一些不能簡明确切地表达意义的詞和詞組,正确地結合漢語借詞和本族語詞的正字法文字怎样設計才能符合我国民族語言中共同成分日益的客觀規律,这些問題都和漢語的影响有十分密切联系。

关于民族标准語的規範化問題,我們过去这段着重在詞汇規範方面的研究。对某些語言已經了許多等义詞以及詞汇和詞組方面的混乱現象。混乱現象較多地出現在文字历史比較久的語言当中而且特別突出地表现在出版物上。現在中央民族社、地方出版社和有关的語文机构正在所搜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辞書工作会议已經提出一个編写各民族語言和漢語对照的規範性詞典的规划,現在正根据这个规划积极地进行工作。对創制文字的語言也正在編写規範性的簡明辞典和綱要,其中有些辞典已經出版,如《僮汉詞汇》、《苗明詞典》(按照不同的方言分別編写的)。有一些性的語法綱要如苗語、布依語、黎語的語法綱要,完成初稿,《僮語語法概述》已經出版。現在对于



# 語言教育的深刻变化和迅速的發展

張志公

近年来从事与語言教育有关的工作，亲身体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年間我国的語言教育事起了多么深刻的变化，有了多么迅速的发展。全面論述这个变化和发展，我个人沒有这样的能力。这裏談一談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和感想。

回想解放以前，語言教育的情况是十分黯淡的。会上一般人对于語言学，对于汉语，对于語言教育学，非常陌生。这方面的書籍刊物出版得极少。市上大量流行的是“尺牘大全”“酬世大全”“公文程式”及“英語百日通”“日語一月通”，等等。至于講汉语音、語法、修辭等的書，無論是專門些的还是通俗些的，出版的种数都很少，每种印数更少；而且流行在少数学校的少数爱好者的手中，跟社会广大公众几乎无关。高等学校開設汉语語言学課程的也很，有之，大都是因人設事，碰巧学校里有那么一位教授，就开上一兩門課，沒有就拉倒。中学里，国文称主科，其实最不受重視。試与英文比較一下。以課时数論，国文每周大都四五小时，多則六小时；英文每周少則六小时，多的能到十小时左右。以課内容論，国文不过是每学期講上十几二十篇文章，

作上几次作文，別的沒有，有几种国文課本里編了些文法、修辭知識的教材，然而事实上只是配搭，大多数教师并不理它；英文，至少是讀本与文法两套，相当系統地进行教学，有的学校一直教到《英文典大全》《譚氏英語修辭与作文》甚至叶斯柏森的《英語語法綱要》，口头練習、書面練習、作文，等等，一絲不苟。学生，早晚自习大部分時間用在英文上，讀課文，背生字，作練習，字典人手一冊，有的在学校外边还再專請教师补习；国文課本，則上課之外无人問津，字典，一百个人里未必有一本。社会上大量的文盲，能够动笔写写的只有那么极少数的一部分人，而写出来的东西很有些是不文不白，不中不西，似通不通的。汉语好像成了一种“背时”的語言；学汉语、研究汉语是“走冷門”；教汉语被看作一种“无聊”的工作。旧社会的語言教育，大致就是这么一种景象。解放以来，短短的十年中間，情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值得重視的是語言教育的广泛普及。早在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号召，社会各方面立即掀起了学习語法修辭的热潮。随后，在党的推广普通話，促

文字和已改革文字的民族，都已经選擇或确定了基方言和标准音，制訂了正字法；有些文字也制訂了正法。这些工作对民族标准語的规范化起着重大的作用。关于民族語言规范化的研究在苏联有許多有价值的著作，为了吸收苏联在这方面的先进經驗和研究成果，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的翻譯組已經譯出《辞典編纂論文选譯》的第一集（9月出版），現在正翻譯苏联及它国家有关民族标准語发展的論文，国庆前就已经出一本《民族标准語論文选譯》。民族标准語规范化研究是一个長期性的工作，这项工作現在只能算是开始，我們將配备更多的力量来进行。

除了以上所說的以外，我們在語言的系屬，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语的平行比較，音位和字母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并根据平行比較研究的成果編着某些民族怎样学习汉语普通話和汉族怎样学习某些民族語文的著作。應該在这儿特別指出，在我們

的工作中不断地进行着对资产階級学术思想的批判。譬如，在語言的普查工作中批判了只重本族原有語詞、原有詩歌故事材料的搜集，而忽視新借詞和現代新詩歌的“厚古薄今”思想；在新詞术语的工作中批判了借口保护語言的“純洁”和系統的“完整”来排斥汉语借詞，生挖、硬創、乱借外国語等脫离政治、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傾向；在研究方法中批判了以偏概全的资产階級治学方法。經過了討論与批判，同志們都大大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我們在實踐中已經完全証實了民族語言科学研究工作必須走群众路綫，才可以集思广益，充分地發揮群众智慧和积极性，才可以保証質量，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我們更親切地体会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各級党委的领导下，才能取得上述的重要成就。我們今后一定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奋勇前进，使我国民族語文科学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发展。



进汉语规范化、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文字改革的方针指导下,学习语音、学习拼音字母、学习语法修辞的活动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提出之后,在1958年社会主义全面大跃进之中,适应着工农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文化革命也进入了高潮。扫除文盲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学点语法、学点修辞、学点逻辑在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干部中间成了普遍的风气。几年来,通俗普及的语音、语法、修辞书籍,出版的种数之多,远远超过了从清末到1949这五十年来出版的总和,以印数计,那就更无法比较了——有的书印到将近二百万册,有的印到五十万册以上,印到十万册以上的有许多种。中央和地方出版的语文刊物,我所知道的就有十种以上,其中有的每期印数曾经达到二十几万册,从1951年创刊到现在总计印了一千四百多万册。至于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方面之广,参加的人数之多,更是难于描述的。单就北京一地而论,我个人曾经被邀参加讲课的、规模较大的语法修辞讲座之类就有许多次,有的是为企业职工,有的是为机关干部,有的是为部队干部,有的是为文艺工作者,有的是为编辑出版工作者,有的是为学校教师,每次参加的人数少则二三百,多的竟有一两千;知道而自己却没有参加工作的这类讲座还有很多,至于规模较小的,那就不计其数了。语音、语法、修辞这些方面的知识已经从过去那个极端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学校里,据我所知道的,几乎每所综合大学和每所高等师范学校里都设置了有关汉语语言学的专业;中学,从1952年就有不少学校在语文课里规定了教学语法的课时,1956年到1958年曾经在全国大部分中学里设置汉语课,后来虽然由于必要的考虑,汉语不再实行单独设科,但是教学必要的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知识已经成为语文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阅读课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教师们更在努力加强阅读课里的语言教育因素。总之,在学校教育中,语言教育越来越受到更大的重视,越来越趋向于科学化,并且密切地结合我国语言文字和教育工作的实际。语言教育的这种发展是与语言的发展相适应的,并且进而促进了语言的更加发展。就目前我们书面语言的情况来看,我们的词汇、语句形式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大量的群众口语、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有用的外来成分被吸收到我们的语言里来;同时,适应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词汇和语句形式方面有了不少新的创造。

而另一方面,语言规范空前地受到重视;许多报纸刊物经常在讨论语言规范问题;书籍报刊上的语言越来越趋向于纯洁和健康。这里还没谈到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内各兄弟民族中语言教育的迅速发展。目前,国内各兄弟民族,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多半都创造或者改革了自己的文字,并且用它作工具在进行着本民族的语言教育;同时,由于全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为了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各兄弟民族的学校里也都热烈地进行着汉语的教育。这些,更加是空前未有的情况。解放前,历来的反动统治者都执行着一套民族歧视政策。兄弟民族在反动政权的歧视与压迫下,谈不到文化教育,许多民族都没有文字,自然也就没有科学的民族语言的教育。至于汉语教育,那就更谈不到了。

把语言教育的今昔情况略加比较,我们深深体会到,解放以来语言教育的发展是跟我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分不开的,跟党的领导、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分不开的。一个社会的教育事业,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又回过头来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语言教育,自然也是这样。语言是交际工具,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工具。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上流行着什么样的交际活动,传播着什么样的文化知识,谁传播,为谁传播,语言教育的性质、内容和方式具有决定的作用。因此,尽管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而语言教育则从来就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前边说的解放前的语言教育的情况,分明地反映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面貌。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教育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要高速地发展生产。为了这个目的,人民要求迅速掌握文化,掌握科学技术,为此,首先要掌握传播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工具——语言文字。要建设社会主义,全国人民需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交流各地方的经验,这样就必然要求并且促进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大力扫除文盲,领导语法修辞的学习,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进一步规范化,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文字改革,党的语言和语言教育方面的这些方针政策,正是上边说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的集中的反映。在党的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十年来的语言教育获得了如前所述的迅速发展和辉煌成就。我敢断言,中年以上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语言科学工作者和语言教育工作者回想一下解放前语言教育那种冷落凄惨的情状,看看解放后十年来这样巨大的成绩和蓬蓬勃勃、一日千里的发展,没有一个不是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的。

必須思源。當我們為語言教育的发展而庆幸的时候，我們不能不深深感激促进这个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推动和督促着我們的工作的全国劳动人民和领导着我們前进的偉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們还不能不感謝苏联的先进經驗和苏联的語言科学工作者和語言教育工作者給我們巨大的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周年的前夕来看語言教育的燦烂的十年，我們心头的兴奋和激动是难于抑制，难于描述的。

十年来，我們語言科学工作者和語言教育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为語言教育的发展作了不少的工作。許許多多語言学者为广大的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編写了許多种有关漢語各部門的学习讀物。《語法修辭講話》首先打破了解放前各种語法書籍只重理論，忽視实际的傳統，企图針對青年們在运用語言中的实际困难，把語法和修辭結合起来，解决語言运用的各种具体問題。許許多多語言学者和語文教师为各地、各級、各类学校編写漢語教材，特別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編写得更多，更好，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集体編写的大学用的現代漢語教材，以及許多地方为普通中学、工农学校、部队学校編写的語法教材，等等。許多位語法学者曾經为中学的語法教学共同商討、解决存在多年的語法体系分歧的問題。許許多多語文教师研究、創造語言教育各部門的教学方法。許許多多辞典工作者为广大的学习漢語的讀者編出了可用的字典、詞典，像《新华字典》《学文化字典》《漢語成語詞典》，等等，目前并且正在編輯着更完备的現代漢語詞典。許許多多語言学者和語文教师为了教学語音知識和漢語拼音方案，为了推广普通話編写教材，創制教具，研究教学方法。許許多多語言学者和語文教师在《語文学习》这一类的普及性的語文刊物上介紹漢語各方面的知識，交流教学的經驗。……（憑着我个人的所見所知，是无法把我們各方面值得称道的工作列举齐全的。）这一切，都对十年来語言教育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良好作用，在偉大的节日——十月一日到来的时候值得提出向党和全国人民汇报。

但是，我們还應該想一想，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有多么艰巨。作为語言科学工作者和語言教育工作者队伍中的一員，我深深感到，我們作的工作还很不够，距离党和人民所期望于我們的还很远。在語言教育領域內，旧社会留給我們的有用的底子是极薄极薄的，而资产階級学术思想、教育观点等等有害的坏东西反而留下来很多。我們要加倍努力，加緊努力，更快更好地解决語言教育工作中的各項問題，編写群众迫切需要的各种讀物。举几个例子來說。“字”，無論作为一个

語言單位来看（叫作“詞素”或者别的什么）或者作为一个書写單位来看（写出来的方块汉字），从語言教育的角度考虑，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在語言教育中應該怎样对待它，各級学校的学生所能掌握和應該掌握的單字数量有多少，識字、写字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效果最好，都需要更好地研究。現代漢語普通話里用的詞、熟語和成語有多少，各个教育阶段的儿童、少年、青年應該掌握和能够掌握的有多少，詞汇教学應該用些什么方法；漢語这种語言，在实际运用中，詞法和句法的关系到底怎样，从語言教育的角度考虑，在各个教育阶段應該教些什么，怎样教：这些問題也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我們需要迅速編出更完备的、分別供各級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使用的普通字典、詞典，更完备的同義詞典、熟語詞典、成語詞典，以及比較專門的詞典，比如詞源詞典、文言詞典、虛詞詞典、外来語詞典，等等；我們还需要更完善的、分別供各級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用的、易于学习又切合实用的語法讀本，現代漢語修辭学讀本，等等。这些工作，还有这里沒提到的另外一些工作，我們虽然都作过不少；这些工作虽然都不容易，不能希望一个晚上把这些事作尽。不过，摆在我們面前确实还有許多工作迫切地需要去作，这就不能不在回顧过去十年来的成績的时候，更多地鞭策自己。十年来，我們都會認真地学习过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学习过毛主席关于語言和語言教育的重要指示，学习过斯大林同志的杰出的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以及別的有关語言和語言教育的經典著作，我們对語言、語言学和語言教育的認識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资产階級語言学观点和語言教育观点留給我們的影響还不能說已經清除干净。我們曾努力地要求自己面向实际，使語言学成为广大群众的文化財富，成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一个有力的工具；但是脱离实际、为理論而理論、輕視通俗普及工作、忽視語言教育工作的毛病也还不能說已經一去不返。我們曾通力合作，就語言学和語言教育的各項問題进行过非常有益的討論，解决过不少重要問題；但是也有过意义不大的、学术性不强的、不解决問題的爭論。我們的思想上或者工作上，有待提高、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很多。这样，我們就必須下定决心，以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精神努力以赴，把我們的語言教育思想和語言教育工作迅速地、大大地提高一步。

在党的領導之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我坚信，我們一定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我們的任务，以更多更大的成績獻給我們明年的、后年的、年年的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 十年来汉语语法学的成就

陆 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汉语语法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现代语法学，从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算起，迄今已有六十一年了。建国十年来汉语语法学在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远非解放前的五十一年所可比拟。现在，我们从语法知识的普及和语法学研究的进步与提高这两个方面来对十年来汉语语法学作一简要的回顾。

开国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语法知识的普及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它明确地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号召人人都来改正使用祖国语言的混乱现象。为了帮助大家改正语文中的缺点，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人民团体都很重视这一工作，作了许多组织、宣传工作。广大的干部、职工、解放军官兵、中小学教师也从自己的工作中体会到迫切需要学习语法修辞的知识来提高语文修养。这一切汇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语法修辞知识的高潮，普及语法知识工作得到蓬勃地开展。

基于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十年来介绍语法知识的通俗读物出版了一百多种，①《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知识》等十几种期刊也时常登载语法方面的文章，散见在报章杂志的语法文章数以千计。语法书籍的发行数量非常大，《语法修辞讲话》单行本第一次印刷时，第三、四、五讲就印了二十至三十万册，②《语法初步》自1952年至1956年四年内共发行一百六十余万册。这样大的发行量是解放以前难以想象的。

在这些为数极大的通俗出版物中，有不少是质量较好，为群众欢迎的。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是第一部面向群众，联系实际的比较通俗的著作。它是“为了帮助大家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而写的。讲求实用，目的明确。它引用的正面例句大部分来

自当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尤其是毛主席和鲁迅的作品；同时又从报纸、期刊、文件上摘取大量的错误例句，把两者加以对比说明。因此“着实介绍了语言使用上的实际问题”（叶圣陶语），深受读者欢迎。曹伯韩的《语法初步》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介绍的语法知识还是比较全面的，文字写得浅显，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就可以看懂，它的普及面比《语法修辞讲话》更广。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在《中国语文》上连载，对于语法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他象吕叔湘的《语法学习》、张志公的《汉语语法常识》也都是比较好的著作。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力求吸取过去各家语法研究的长处，并用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取材都来自当代的作品或报章杂志，文字力求浅显易懂。这些事实说明这些著者都在努力为广大群众服务。

语法知识普及工作的蓬勃开展，不仅使我国语法工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时也使过去被少数人搞得深奥神秘的语法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它使语法学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要求，同祖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语法研究工作获得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因而使语法学界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学校语法教学是语法知识普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解放以来同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解放以前语法课程只在少数几个大学里开过，课程内容一般都脱离实际需要。解放以后苏联语言教学的先进经验、各种语法教材、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大量介绍到我国来，对我国语法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的安排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十年来高等学校语法课程作为整个语言学课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得特别

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根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统计，解放后出版的语法著作（包括重印解放前的著作）约有二百零四种，其中：通俗著作一百零四种，大学教材二十五种，函授教材五种，语法理论著作三十六种，一般教材十一种，外国留学生汉语语法教材两种，文言语法二十三种。（以上数字不包括中学课本）

② 第三讲《虚字》二十万册，第四讲《结构》三十万册，第五讲《表达》二十三万册。



伏。現在許多綜合性大學不僅講授現代漢語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就是漢語語法史和語法理論等課也開始講授，語法課程已初步形成一個系統。師範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普遍講授“語言學引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等課，都很重視語法的教學。各大學編寫的語法教材公开发行的就有二十五種，院校之間交流的語法講義更多。1958年全民大躍進中北京大學漢語教研室集體編寫的《現代漢語》上冊語法部分，把講授系統的語法知識和糾正語法上各種錯誤結合起來，着重聯系同學的實際需要，這是雙反後的一個新的改革。

中學語法教學的推行是學校語法教學工作的重大進展。中學語法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能正確使用祖國的語言和提高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中學語法教學過去缺乏經驗，解放以來才摸索着前進。1956年曾經一度把中學語文課分成文學和漢語兩科，加重了語言教學的份量，但由於中學生課程負擔過重等原因，半年以後仍并為單一的語文課。這次變動為今後更好地進行中學語法（語言）教育提供了很多教學上的經驗。

中學語法教學在解放初多是採用《語法修辭講話》、《漢語語法常識》、《語法學習》、《語法初步》等作教材或參考的；各個地方各個學校都不一樣，使教學上發生很多困難，各方面都迫切需要一個比較統一的語法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編寫漢語課本時採納了各方面的意見，從1954年上半年開始着手擬訂一個語法系統，經過幾次修改，幾次試教，並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在1956年正式發表《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根據這一系統編寫了中學《漢語》課本的語法部分，又組織各地語法學者集體編寫了《語法和語法教學》。新知識出版社也組織許多語法學者根據這一系統編寫了《漢語知識叢書》中語法部分的三輯共二十三冊。《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和中學漢語課本語法部分的出版，是語法教學、語法知識普及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國語法學者、語文教師空前大合作的產物。發表以後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很多單位都拿它作為課本或參考材料，不僅成為中學共同採用的語法教學系統，而且也促進了全國各種教學語法系統的統一。在語法教學和語法知識的普及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後到我國來學習的外國留學生愈來愈多，對學生進行漢語語法教學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編寫的《漢語教科書》（上、下兩冊）是根據幾年來的教學經驗認真總結而編寫的。它是我國為外國人編寫的第一部完備的漢語教科書。由於它切合漢語實際，又盡量針對外國人學習漢語中的特殊困難，出版以來受到國內外讀者的歡迎。

解放以來，各類業餘學校，尤其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紅專大學普遍設有“語法修辭”課程，廣大人民響應黨向文化進軍的號召，迫切需要學習語法（以及文學、歷史、邏輯等）知識，這就為語法教學開辟了一個更廣闊的天地，語法學與社會聯系的面更寬廣，它的社會基礎更加堅實了。

## 二

十年來，不僅語法知識普及和語法教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而且在語法學本身也起了重要的變化，獲得很大的進展。

解放後，語法學家學習了馬列主義，這對語法的研究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發表給我國的語法學家指出了正確的道路，漢語語法的研究因之起了轉折性的變化。蘇聯先進的語言學、語法學家也給我們很大的幫助。1955年鄂山蔭同志、郭路特同志來我國參加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時，介紹了蘇聯漢學家研究漢語語法的情況，1958年冬謝列勃連尼柯夫同志來我國講學，作了《論語法結構的研究方法》的報告，穆德洛夫同志也在刊物上參加了我們的詞類問題討論，這些在中蘇文化合作事業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特別是蘇聯漢學家的許多著作先後被介紹到我國來，對我們的幫助很大。蘇聯漢學家完全不同於西方漢學家那種厚古薄今的作法，他們既重視古代語言材料的研究，更重視現代語言材料的研究。在語法研究方面，很重視研究現代漢語的形態問題，對現代漢語的形態學和造句法的研究作出了不少成績。龍果夫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康拉德的論文《論漢語》都對我們的語法學起了很大的影響。我們的語法學家從這些著作中受到不少啟發。蘇聯漢學家也很重視我國學者的研究和意見，他們積極介紹我國學者的語法著作，吸收我國語法學家的研究成果。比如蘇聯出版的《華語教科書》的語法體系就採納了我國學者的不少意見。中蘇學者互相合作，有力地推進了漢語語法的研究。在學習蘇聯的方針下，我們的語法研究也開始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進行。

解放前，我國語法學是在西方資產階級語言學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它存在着許多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學術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解放後，黨幫助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很多語法學家也在黨的幫助下，開始批判自己。王力在《中國語法理論》再版的《新序》中檢討了搬用叶斯柏森“三品說”的缺點。呂叔湘在《中國文法要略》的修訂本序中也對此作了檢查，並刪去了有關的章節。陸志韋對自

已在《北京話單音詞詞匯》中所用的同形替代法作了自我批判，黎錦熙也修正了《新著國語文法》中的一些不正確說法。特別是1958年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運動中，對語法學中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更展開了比較集中的批判。語法學家黎錦熙、王力、呂叔湘、陸志韋、高名凱等都受到了批判。批判的主要內容是：為研究而研究，理論脫離實際的學術思想；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忽視漢語特點、崇拜西方語法理論，生硬搬用西洋語法體系的作法等。還有，對資產階級粗制濫造的治學態度也進行了批判。通過學術思想批判，不但對解放前語法學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了初步的清算，而且指出了目前語法研究中的問題，解除了妨礙語法學發展的束縛。

解放前，語法是少數專家學者的事情，一般地說他們是各搞一套，互不過問，語法學是在個人鑽研的情況下緩慢地發展的。解放後，黨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學術討論在一切科學領域內蓬勃展開，語法學也不例外。語法中個別問題的爭辯，語言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對某一語法問題舉行討論會已是經常的事情。就是在雜誌上展開的語法問題的大型討論就有關於詞類問題的討論、主賓語問題的討論、什麼是詞兒的討論、單複句問題的討論等。1956年還在青島召開了語法座談會，許多語法學家聚集一堂，交流了研究情況，交換了對語法問題的意見。

詞類的區分是一個很老的問題，解放前就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1952年在《中國語文》《語文學習》上發表了幾篇關於劃分詞類的文章。1953年10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高名凱關於漢語實詞不能分類的文章後，掀起了廣泛的熱烈的討論，直到1955年5月才基本上告一段落。這次討論雖沒有解決漢語的詞類問題，但是它使大家明確了不能單純憑意義來劃分詞類，使大家對漢語有無形態以及漢語形態表現在什麼地方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推動了大家對詞法的重視和研究。

主語賓語問題的討論是1955年7月在《語文學習》上展開的，1956年4月基本上結束。這次討論從語法跟邏輯的關係、語法跟修辭的關係討論到倒裝句、省略句等問題，從主語賓語的定義討論到時間詞和空間詞作主語、句子形式做謂語、賓語和補語的分合等問題。儘管各人的意見還有許多分歧，但是通過討論，大家認識到分析句子、確定主語和賓語必須同時顧到結構和意義，認識到漢語的句型、句式是豐富的，推動了大家對句法的重視並深入進行研究。

除了學術討論外，還有集體進行研究。《語法講話》就是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寫的，《漢語構詞法》也是

語言研究所一部分同志集體寫的。中學《漢語》課本，《語法和語法教學》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組織國內許多語法學家共同編寫的，其他高等學校也多採取集體編寫語法教材的方式。這表明解放後語法學在加強合作、發揮集體力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語法講話》和《漢語》課本不僅在語法知識普及和語法教學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語法學的發展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語法講話》是解放後提出的第一個語法新體系，材料相當豐富，分析很細緻。雖然有些問題尚待商榷，有形式主義的毛病；但是它提出了不少可取的論點，引起了語法學界對語法形式、語法結構的重視。《漢語》課本吸收了各家的長處，綜合了幾十年來漢語語法研究的成績。這一系統雖然也還存在着缺點和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目前來說，它確實是一個比較好的系統。發表以來，許多人贊同它，提出了許多證據來充實它，或者修正它的個別論點，使它日趨完善。即使不贊同它的，也只能在個別的問題上提出意見。

正確的理論指導，正確的研究方法，學術討論，集體研究，這就構成了語法研究中嶄新的局面，推動了語法學的飛速發展。綜合起來看，十年來漢語語法研究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首先，解放後開始並重詞法和句法，詞法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解放前，語法學家受了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把漢語看作單音節語、孤立語的影響，因此從黎錦熙先生提出“句本位文法”起，所有的語法學家多只注意句法的研究。王力先生說：“漢語沒有屈折作用，於是形態的區分也可取消。由此看來，中國語法所論，就只有造句的部分了。”<sup>①</sup>這可以說是解放前語法學家的共同認識。因此，在他們的語法著作中，就沒有詞法的地位，完全把語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詞法抹煞掉了。《氏文通》雖然是以詞類為綱來講語法，但實際上也多講的句法問題。

事實上，任何語言的語法都應該有詞法和句法兩部分。漢語雖然沒有印歐語那樣的詞形變化，但是有自己的形態，有自己的詞法規則，這是可以肯定的。抹煞了詞法不僅本身是錯誤的，而且就是句法的研究也无法真正研究好。解放後，糾正了忽視詞法研究的錯誤，展開了關於形態學的討論，肯定了漢語是有形態的，詞法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視。

我們知道，構詞法是語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漢語語法中尤其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為漢字不是拼音

①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冊，8頁。



文字,在漢語語法研究中,詞的界綫還不清楚。進行構詞法的研究,就能幫助解決詞的界綫問題;而且掌握了詞的構成規則,對詞性辨別和詞的用法也有幫助;同時對解決漢語拼音文字的連寫規則也有好處。因此,構詞法研究的進展,是漢語語法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成績。

詞法的被重視,首先表現在構詞法的研究上。解放前語法學家對構詞法都不很重視,1940年後才有少數的語法著作在講句法之前,簡略地提到一些構詞方式。解放後,情形就不同了,許多語法研究工作者都從事了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不少論著。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陸志章等的《漢語構詞法》是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它材料豐富,分析也比較細緻,全面地探討了現代漢語中的構詞格式。雖然沒有最後解決漢語構詞法的問題,但可以說是總結了現有構詞法研究的所有成果。其次《漢語》課本、張志公的《漢語語法常識》、胡附和文煥的《現代漢語語法探索》也對構詞法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還有黎錦熙解放前根本不講構詞法,但是在解放後的《中國語法教材》的《附編》里,卻相當詳細地講述了漢語構詞法。高名凱的《漢語語法論》原來只有“句法論”“範疇論”“句型論”三部分,構詞法是放在論中附帶講的,在1957年的修訂本中他也把構詞法抽出來獨成一篇。總之,從1951年以後,所有新出版或修訂重版的語法書都增加或充實了構詞法的內容。

詞法的被重視還表現在研究詞類劃分和研究詞類語法特點方面。解放前,語法學家只根據意義來對詞進行分類,根本不研究詞的語法特點。有的甚至認為詞的分類“只是語法的皮毛”,只是為了講語法的方便。這顯然是錯誤的。解放後,大規模地進行詞類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一些分別詞類的方法,探討了一些詞類的語法特點,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它促進了語法學的發展。通過這些討論,語法學家都有意識地重視詞類研究。有的研究某類詞的語法特點,有的研究某類詞的區別,朱德熙的《形容詞研究》就比較詳細地研究了形容詞的語法特點。中學《漢語》課本用了很多篇幅談詞法,在講述每類詞的時候,都介紹它的語法特點,可以說是綜合了現有漢語詞法研究的全部成果。

蘇聯漢學家龍果夫說:“各種語言的語法結構的本質反映在詞類上。離開詞類,既不可能理解漢語的句法特點,也不可能理解漢語形態的特點,因此就不可能說明漢語語法。”<sup>①</sup>這一意見是正確的。足見詞類的分類,詞類語法特點的探索,在語法研究中占有多么重要地位。在這方面取得的任何進展,無疑都是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成績。

其次,十年來漢語語法研究的進步還在於明确了

在研究方法上要把意義和語法形式結合起來,並且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

解放前,從《馬氏文通》起,語法學家基本上都是從意義、思維、概念出發來研究語法的。黎錦熙說:“思維底規律,並不因民族而區分,句子底‘邏輯的’分析,也不因語言而別異。”<sup>②</sup>因此,他的“句本位文法”是“從句子底‘文學的’次序上,透進一層,看出‘邏輯的’次序來”。<sup>③</sup>這就是說,“句本位文法”分析的是句子邏輯關係,而不是語法結構、語法規律,那末實際上就是一種“邏輯本位”的語法,把邏輯和語法完全混同起來了。這當然是錯誤的。王力、呂叔湘、高名凱等也多從意義、心理、思維、概念來研究語法。這就不能不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抹煞或者曲解了某些漢語語法規律。

同時,單純從意義出發研究語法,又會對某些語言現象作毫無意義的煩瑣分析。比如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文法》中把名詞分成了三類十二種,加上量詞(名詞的附類)的三種,總共十五種。斯大林同志說: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體內容。”<sup>④</sup>黎錦熙這樣的分析,顯然是考慮詞的具體內容,不是語法規律的研究。解放前的語法著作大多有同樣的毛病。

解放後,大家認識了單純從意義出發研究語法是錯誤的,都開始重視語法形式。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陸志章等的《漢語的構詞》就都是偏重形式結構的;胡附、文煥在《現代漢語語法探索》中就相當強調從語法結構和意義相結合的原則來研究語法;詞類問題的討論、主賓語問題的討論更是大多數人都強調語法形式和意義相結合的原則,也試圖用這原則來解決問題;《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和中學漢語課本在貫徹語法形式和意義相結合的原則方面,更作了很多努力。就是解放前強調從意義、心理、思維來研究語法的人也改變了觀點。比如解放前王力認為:“中國的詞不帶詞類的標記,所以不顧形式才是詞類區分的正當辦法。”<sup>⑤</sup>但是1955年在《關於漢語有無詞類的問題》中,也主張“應該注意詞的基本意義跟形態、句法統一起來”“應該盡先應用形態標準”,“在不能用形態標準的地方,句法作用是起決定作用的”。<sup>⑥</sup>呂叔湘在《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中也提出:“詞類是根據語法特點來分的。”“結構關係、‘鑑定字’,能否重迭以及用什么方式重迭——這些都可以用來劃分詞類。”“結構關係能照顧的面最大,宜於用來做

① 龍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文版)著者序。

②③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引論。

④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21頁。

⑤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冊,24頁。

⑥ 《漢語詞類問題》第二集,61頁。



主要的分类标准。”①也不再主張从意义划分詞类。

当然，語法形式和意义怎样結合还是个沒有彻底解决的問題；不过大家都明确了方向，开始朝这方面努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語法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还有，十年来汉语語法研究根据的材料多是現代典范的白話文著作。这跟过去有些語法著作把文言和白話混在一起研究或是以清代小說为主要材料的情况很不同。語法是发展的，清代的小說，离現在数百年，它不能代表現代汉语。特别是把时代不同的材料混在一起，古今杂收，新旧并蓄，有許多規律就无法建立。比如，数詞和名詞之間要有量詞，这无疑是現代汉语的語法規律之一，但是若把古今材料混在一起，这一条規律就不能成立。分清断代和历代，分清历史的研究和描写的研究，这也是十年来語法研究中的进步。

上面主要是談的現代汉语語法方面的收获，在历史語法的研究上解放后也有不少进展。解放前历史語法研究是很少的，只有寥寥几篇論文探討了历史語法中的个别問題，有些語法書中对古今語法作了一些零星的比較。解放后历史語法的研究日漸多了起来，历史語法中有許多問題都开始有人探索。洪誠的《論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詞》、黄景欣的《論否定詞勿与不》、周迟明的《汉语的連动性复式動詞》，都对历史語法中的个别問題作了比較詳細的研究。刘景农的《汉语文言語法》、張貽惠的《古汉语語法》也都比解放前的“文言語法”有了一些进步。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在历史語法的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地位。它接受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一些新見，如被动式的发展等。它是第一本比較全面地闡述汉语語法发展史的著作。尽管它談的問題还比較零碎，离全面地闡述汉语語法的客观发展規律还差得很远，但是我們总还是有了一部历史語法。这不能不說是十年来語法研究中的重要进展。

还有方言語法的調查研究也逐漸开展起来。近几年来，《中国語文》上时常登載一些研究方言語法的文章，新出版的方言学著作大多談到方言語法。內容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解放前这完全是一个空白点，現在总算把它填补起来了。随着方言調查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方言語法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也一定指日可待。

历史語法研究和方言語法研究的进展为历史比較語法学的建立作了准备，也为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了解現代汉语語法創造了条件。

现在，汉语語法研究中主要的問題仍然是要加强学习馬列主义的語言学和語法学，进一步肃清資產阶级的学术思想，摆脱西方唯心主义語言学和語法学的影

研究的各个方面去。其次，我們需要全面地掌握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們的研究工作一般还不是建立在极端丰富的材料基础上的，許多的語法現象还有待我們去发掘。我們只有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解决汉语語法研究中現存的問題，把汉语語法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此外，如何結合汉语来进行語法理論的研究，如何解决意义和形式相結合的問題，如何把历史語法研究和方言語法研究更加推进一步，并把它同現代汉语語法研究結合起来，都是有待我們去努力解决的問題。

解放十年来，汉语語法的研究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我們可以說，汉语語法的全面研究（包括現代語法、历史語法、方言語法）已經开始并且正在健康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 \* \*

十年来汉语語法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非偶然。

解放前，广大人民群众对語法学是陌生的，語法的学习与研究停留在一个比較狹小的範圍里。解放后，文化教育的普及，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便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这样，就为語法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廣闊的社会基础。

党的領導是語法学得到巨大发展的保証。党非常重視語文知識的普及，重視語文教学，重視汉语规范化的工作。1955年10月在党的领导下召开了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討論了普通話的涵义、現代汉语规范化的具体要求，1956年6月2日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在党的领导下，普通教育和业余教育中都加强与改进了語文教学，国家机关和部队都曾普遍开展語法学习，語法知識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党号召我們向苏联先进的語言学学习，在回顾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时候，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先进的語法学所給予我們巨大的帮助。

十年来汉语語法学的成就是与在党的领导下語文教师、語法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的。老一輩的語法学家經過党的帮助与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努力学习馬克思主义，在业务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参加了語法知識的普及、語法教学等各种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青年語法工作者成長非常迅速，新老語法工作者團結合作，形成了一支很大的科学工作队伍。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清洗了一批右派分子，加强与巩固了党的領導。

十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瞻望未来，我們應該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更加百倍地努力，使汉语語法学更好地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① 《汉语詞类問題》第一集，171、172頁。

# 十年来新聞語言的發展

毛成栋 王学作 王国璋

建国十年来，在党的語言政策和毛澤东同志的語言學說的正确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推动下，我国的新聞語言有了迅速而健康的发展。半文半白的現象大大减少，新聞八股越来越不得勢，語法修辭錯誤逐漸减少。我国新聞語言的这种发展变化，无疑地对整个現代汉语的書面語言有着巨大的积极的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准确、鮮明、生动。

不論是资产階級还是无产階級，对于報紙的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都“极力設法利用語言为自己的階級利益服务”。①

我国的近代報紙，一开始便同早期的资产階級民主运动相联系。当时的“报人”，由于文言文——旧的書面語言不能很好地表达新的思想内容，便使用了一种所謂“报章体”的書面語言。这种書面語言是淺显化的文言。在文言文还占据着統治地位的时代里，“报章体”的語言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真正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起来了。統治階級害怕广大人民掌握文化，害怕动摇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不敢在他們的報紙中使用白話文，仍然讓所謂“报章体”占据津。这种現象，在国民党統治区，一直持續到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

在这种所謂“报章体”的束縛下，当时报刊的語言枯燥乏味、晦澀难懂，里面充滿了陈詞濫調。例如：“应晋見”“拔擢”“履新”“垂詢”“总縮百僚”“私邸”“膺”“忝列”；“殊足令人兴奋”“有裨于健康”“臻于現代化”“趋前致意”“殆系…之故也”。

这种充滿陈詞濫調的“报章体”，是“只能够看，不能够讀的东西”，“始終是中国式的古老工具，不能够适应現代的生活。”②它当然不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也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因此，远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報紙，毅然决然地踢开了这种“报章体”，采用了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們党在重庆的机关报

《新华日报》，因条件限制，不能完全运用白話，但是，白話文仍然占了主导的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白話文就最終地在全国的報紙中取代了所謂“报章体”的地位。这是新聞語言中的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变化。

解放以后，新聞語言虽然获得了長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某些新聞工作者一时还不能完全从“报章体”的深刻影响中解放出来，因而在解放初期，報紙上半文半白的現象还相当严重。我們党对糾正这种半文半白的偏向，是非常重視的。新华总社在1949年的一个指示中曾經对新聞語言提出过具体的要求：“我們一切发表的文字必須以最大多数的讀者能够完全明了为原则，因此，無論我們的邏輯，我們的造句文法，我們的选詞用字，都必須人人能懂，然后我們所宣傳的正确内容才有被人接受的可能性。”要人人能懂，就得彻底清除这种半文半白的現象。近几年来，由于党的語言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这种半文半白的現象已經大大地减少了。这个事实，可以从下面的一些对比的例子中看出来：

- 1) 我职工代表团首途返国(人民日报 1949. 7. 27.)  
李一卿启程去加尔各答(人民日报 1950. 8. 9.)  
我穆斯林朝覲团去卡薩布兰卡(人民日报 1950. 7. 27.)
- 2) 捷大使謁我政府首长…(人民日报 1951. 1. 18.)  
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見我軍事友好代表团(人民日报 1958. 4. 7.)
- 3) 程潛將軍昨抵平(人民日报 1949. 9. 8.)  
日本法律界代表团到京(人民日报 1950. 8. 11.)
- 4) [新华社二十六日訊] 来京参加国庆盛典之西南各民族代表团二十七位代表、暨各民族文艺工作队及隨行人員共一百一十二人，于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乘車抵达北京車站。  
前往欢迎者，計有…。(人民日报 1950. 9. 27.)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10頁。

② 《羅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42頁。



[新华社25日讯]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古巴、阿根廷和智利青年代表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是：路易士·西蒙……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有……(人民日报 1959.8.26.)

从上面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新聞工作者在克服半文半白的現象方面是做了不少的努力的，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們采用的是代替法，即用普通話的詞語代替沒有生命力的文言詞語。例如：

抵达——到达  
首途——启程  
媾和——締結和約  
該——这、之——的  
暨——和

有时，也采用变换句式的办法避开某些文言詞語，这多半是由于在現代汉语里找不到恰当的同义詞語，或是由于修辞的緣故。在例2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用“B. B. B 接見 A. A. A”的句式替代“A. A. A 謁 B. B. B.”式。

毛澤东同志早就指出过：“我們还要学习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①我国的新聞工作者正是遵循了毛主席这一指示，在反对半文半白的同时，还注意了吸取古代汉语中有生命的詞語。例如，在报纸中，經常看到这样一些文言詞語：

- a) 逝世 吊唁 謁輓 誕辰 寿辰
- b) 謫言 恫吓 譴責 抨击 聚歼 重申
- c) 殿下 陛下 閣下 亲王 首相 夫人 侍从

这些詞語，a) 組表示了一种庄重严肃的感情色彩；b) 組具有言簡意賅的效果；c) 組反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的事物概念。

在报纸中，也常看到一些这样的文言格式：

鉴于印度政府在这个問題上的态度，鉴于印度一些并非不負責任的人士的言論，我們認為，……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

这是为了維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問題的談判和解决。

我們深信，那些毒化中印关系的謫言，……必将为印度广大人民所識破，所抛弃。

这些格式的运用，使得新聞語言更加准确、簡煉、有力。

此外，在近几年的报纸上，还經常出現一般人所熟悉的成語、典故和詩詞，以1957年以来的《人民日报》的标题为例，如：“欲盖弥彰”“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春風又綠江南岸”“山雨欲来風滿楼”，等等。

大家知道，报纸的标题在字数上要受限制，而且还要求生动醒目，所以标题常常要注意吸取古代汉语經

过千錘百煉的“有生气的东西”。上面所举的那些例子，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这点，所以，它們的感染力很强，言簡意賅，形象生动，富有民族的特色和風格。

同时，从1957年整風反右以来，特别是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新事物風起云涌，因此，反映这些事物的新成語也就在报纸上大量地出現。还是以《人民日报》作例子，如：“移山造海 众志成城”“政治挂帅 妙手回春”“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敢想敢干 后生可爱”“事在人为 地在人种”“一箭多雕 物尽其用”“時間短 任务重 知难而进”“万人皆讀書 唯有劳动高”，等等。

总之，近几年来，半文半白的現象是大大地减少了，同时，也注意吸收了古代汉语中的精华，这就标志着新聞語言已經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新聞語言的这种发展和变化，不能不对現代汉语产生巨大的影响。

## 二

新聞語言健康发展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新聞八股”越来越不得势了。

大家都知道，新聞語言是有它的一定的特点的，但是，解放初期在某些場合所出現的“新聞八股”，却是“报章体”的残余影响的結果。解放以前，国民党統治区的报纸中有一套“八股”式的語言，这就是所謂“报章体”的語言。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新聞工作者抛弃了“报章体”的那一套公式化的語言，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由于某些新聞工作者实际斗争的經驗不够，同群众的接触不够，因而在前些年的报纸中，語言仍然不够生动活潑，仍然带有“八股”气息。

毛澤东同志对这种八股文章一再提出过批評。1956年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的按語中說：“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接着他便要求报纸的編輯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順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毛澤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里还指示我們要下苦功学习語言，要学习“民間的、外国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东西”，首先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語言”。③解放以来，尤其是去年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833頁。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語，280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838-839頁。



进以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遵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向，认真地向人民群众、向外国、向古人学习了语言，从而使报纸的语言风格有了显著的改变。这种语言风格的改变，可以从新闻报导(消息、综合消息)的语言风格的改变中得到证实。

新闻报导，在文字形式上，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标题；一个是导语。

标题要求准确、鲜明、生动，要求政治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但是，在前些年，新闻标题却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有些标题不是拖泥带水，就是“简古”，不形象，没有突出观点和立场。例如：

1) 孙中山逝世二十五周年(引题)

民革召开纪念会(主题)

(人民日报 1950. 3. 10.)

2) 石市人民代表大会

毛主席  
向朱总司令致敬(主题)

(人民日报 1949. 8. 3.)

3) 张垣纸烟厂工会(主题)

面向生产已获成绩(副题)

(人民日报 1950. 3. 20.)

4) 在北平某师“八一”授旗阅兵大会上

聂荣臻将军讲词全文(主题)

(人民日报 1949. 8. 8.)

再看看最近的例子。从准确性来说，做到了恰当地表达新闻的主要事实和中心思想，例如：

1) 我国政府授权陈毅外长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老姆撕毁日内瓦协议

(人民日报 1959. 2. 19.)

2) 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通栏套红标题）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战斗号召(引题)

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主题)

从鲜明性来说，观点突出、通俗易懂、简洁有力，例如：

1) 青春的火花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引题)

体育运动阔步迈向世界水平(主题)

打破和创造了二十六次世界纪录 刷新了解放前全部全国纪录(副题)

(人民日报 1959. 9. 13.)

2) 十成年景十成收 一穗一粒不讓丢(主题)

山西辽宁加强秋收具体领导，掀起增产保收高潮(副题)

(人民日报 1959. 9. 14.)

从生动性来说，语言活泼、形象化，运用了比拟、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例如：

1) 速度赛火箭 质量保万年(主题)

鞍钢一个多月节约投资六千多万元(副题)

(人民日报 1958. 5. 29)

2) 毛主席含笑乘“东风”(主题)

说：“坐了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大众日报 1958. 5. 16.)

导语把主要的、新鲜的事实扼要地告诉读者，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导语的语言要写得简洁、生动、有力。但是，前些年我国报纸上有些导语，在语言上却有“八股”气息。例如：

1) 为了进一步掀起…高潮，保证…的实现，加速…进程，…会议于…日…开幕。

为了总结…经验，保证…更大的丰收，促进…全面大跃进，召开了…会议。

2) 在…领导下，在…基础上，在…条件下，…掀起了…高潮。

3) …打消了…顾虑，贯彻了…方针，掀起了…作风，从而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

在这种公式化的语言支配下，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枯燥无味，面目可憎，甚至是言之无物。这种不健康的现象，近年来已引起了新闻工作者的注意，特别是从大跃进以来，他们在写作上也已突破了这些束缚自己语言的公式，写出了一些很出色的导语。例如：

1) [新华社 1959 年 1 月 5 日电] 本报记者报导：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贺新年的时候，我国煤炭工业战线上传出了令人振奋的捷报：1958 年，我国煤炭产量已经远超过英国。

2) [新华社 1959 年 4 月 29 日电] 29 日下午，在政协礼堂宽大的休息室里，周恩来同志举行一个茶话会，同来自祖国各地的三百位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亲切会见。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敬老会。

总之，解放以后，我国的新闻语言的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用了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因此，我们的新闻语言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即无产阶级的风格，人民大众的风格。

### 三

十年来，新闻语言健康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滥用“简称”的现象大大减少。

在新闻里，经常使用“简称”，尤其是新闻的标题，因为它受到一定形式的限制，字数不能多，需要适当地使用“简称”。这可以说是新闻语言的一个特点。不过，在刚解放的那一两年，报纸上有滥用“简称”的现象，例如：

董副总理等由宁抵沪(1949. 12. 14. 人民日报标题)

甘省主席邓宝珊抵兰(1950. 1. 8. 人民日报标题)

罗总工会电庆全总(1950. 1. 人民日报标题)

反抗铁托集团法西斯政权

南國人民英勇鬥爭(1950.2.2.人民日報標題)  
各地開展兒童保衛事業(1950.6.1.人民日報)

其他如把“莫斯科”簡稱為“蘇京”,“空軍司令部”簡稱為“空司”,“世界青年聯合會”簡稱為“世青”,“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簡稱為“各代會”,等等,真是舉不勝舉。

對於這種濫用簡稱的混亂現象,我們黨是非常重視的。《人民日報》在1951年6月6日的社論中,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們對於任何兩個字以上的名稱都任意加以不適當的省略。這種混亂現象大部分發生在報紙雜誌的文章和黨組織及政府機關的文件上,並且被這些文章和文件推廣,以致濫用省略成為通病。”1951年3月新華總社在《關於糾正新華社新聞稿中文字缺點的通知》中曾把糾正濫用簡稱的辦法列為第一項。1953年新華社在《關於稿件的一些詞類用法的規定》中又對簡稱的使用作了若干規定。從此以後,報紙上濫用簡稱的現象就大大地減少了。下面舉幾個最近的例子:

胡志明主席離蘭州去西安訪問

(人民日報 1950.8.7.)

山西遼寧加強秋收具體領導 掀起增產保收高潮

(人民日報 1950.9.14.)

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

五天斃傷法軍六百餘人(人民日報 1950.9.14.)

南斯拉夫報紙大肆污蔑我國

(人民日報 1950.9.15.)

現在通用或新造的簡稱一般都符合“需要”和“明確”的原則。例如:

全運會籌備工作就緒。

四川省委和省人委發出關於貫徹八中全會決議的指示

上海輕紡工業一片繁榮

#### 四

現在,再談談新聞語言中語法的規範發展。

十年來,新聞語言中語法的規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不合漢語語法的句子減少了,句法結構日趨完整了;另一方面,歐化冗長的句子減少了,新型句式增多了,並且普遍應用了。

在解放初期的報紙新聞中,語法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其中主要是句子成分搭配不當和句子成分殘缺不全。僅以1949年8月7日《人民日報》第一、二、三版為例,我們就發現了上述兩種語法毛病達四十多處。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語言的健康發展。為了糾正語言中的語法修辭錯誤,《人民日報》在1950年5月發表了《請

大家注意文法》的短評。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在發表《正確使用祖國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的同時,還連載了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新華社總社也在同年2月開展了一個目的在於基本上消滅事實錯誤和語法錯誤的練筆運動。近年來,在報紙新聞中,上述這兩種毛病的确大大減少了。如果以1950年8月7日《人民日報》第一、二、三版同1949年8月7日《人民日報》第一、二、三版相比較,前者的總字數比後者約多六分之一,但出現的語法錯誤卻少四分之三強。

在解放初期的新聞中,特別是在國際新聞中,歐化冗長、和指代不明的句子相當多。以1949年6月7日的《人民日報》的國際新聞版為例,可以見到這樣一些令人費解的句子:

荷蘭共產黨是在這種情勢下進行着積極的反戰爭。

它反對北大西洋公約,要求勞動人民不承認它。它要求解散國會,重新進行選舉。(指代不明確)

為了同樣的目的德國被剝奪了獨立,而西方國家的占領則變成長期化。…增加着的戰爭危機,必須以人民擁護和平的堅決意志予以反對。(濫用“化、着”,句意費解)

不久以前,消息報發表(馬特維耶夫評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設立迄今仍在華盛頓執行職務的美英聯合參謀部的)文章,作者着重指出…在“防禦”的帷幕下,英美(在無論是英國或美國都不感受任何國家威脅的環境中),所採取的軍事措置的規模和性質,說明了它們的統治集團的長遠的侵略計劃。

(定語狀語冗長)

近幾年來,新聞工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翻閱今年8月7日的《人民日報》的國際新聞,第一個清新的感覺是:帶冗長定語狀語的句子大大地減少了。那些文章大都寫得簡潔明了,鮮明暢達。現在隨便舉一段在下面:

信中说,大会的崇高目的是力争禁止核武器,这对苏联人民来说是很亲切的和能够理解的。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内外政策中,把关心人的幸福和未来看得高于一切。苏联政府为争取消除“冷战”状态和确保和平与国际合作而进行着始终不渝的斗争。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和平共处,不应该在军备方面进行竞赛,而应该在建设住宅、学校、医院和增进人民福利方面进行竞赛。

正如反对半文半白并不排斥合理吸收古汉语中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新聞語言在逐步淘汰違反漢語規格的歐化句式的同時,也合理地從外國語言中吸收了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所謂“合理…吸收”,就是毛主席所



說的“不是硬搬或濫用”，<sup>①</sup> 而是从准确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結合汉语内部的造句規律而派生出来的新句型。这些句型一經通用就成为汉语自身的組成部分。这是汉语本身的扩大和发展，不是外来的附加物。我們把解放初期的《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論和評論同最近几年《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論和評論作了一个比較，发现句法結構越来越复杂了，句型越来越丰富了，好些过去不常用的句式現在也普遍运用了。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 (一)包孕句的大量使用：

铁托宣傳的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就会造成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論点，换成通俗的语言，无非是：“劳动者們、被压迫者們、革命者們、社会主义者們呀，你們万不可把世界分裂为陣营，…”（人民日报 1958. 6. 26. 社論《欲蓋弥彰》）

#### (二)联合詞組充当謂語或状語的句式大量出現：

以尼赫魯总理为首的印度政府，…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并且繼續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资产阶级却繼承着而且企图繼續保持英国殖民統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遗产。（人民日报 1959. 5. 6.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中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干涉印度。我們願意郑重地告訴一切关心印度安全的全体爱国者：一个民主的、繁荣的、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員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好的因素，而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对于印度共和国的什么威胁。（同上）

#### (三)同位語的格式越来越丰富：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綱領，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人民日报 1959. 5. 5. 社論《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列宁就是在斗争中发展了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同上）

#### (四)介詞結構充当的定語和状語大量使用。例如：

在国际事务中，以尼赫魯总理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問題上，在执行对中国友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不参加美帝国主义的軍事集团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并且繼續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资产阶级却繼承着而且企图繼續保持英国殖民統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遗产。

（人民日报 1959. 5. 6.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我們認為，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決議》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

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錯誤所进行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錯誤的。

（人民日报 1959. 5. 5.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應該特別提出的是：1)“关于”这个介詞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的标题中被大量使用开来。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关于整風运动的报告”、“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決議”，等等。2)“作为…”这个格式近年来也被普遍地运用了。在这个格式中，“作为”轉为介詞。例如：

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魯所討論問題的当事人，我們認為，指出这个錯誤是必要的。

（人民日报 1959. 5. 6.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綜合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句型上的发展变化，使新聞語言更加准确、严密。造成这种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事物关系的紛繁复杂，人們对这些事物的复杂关系認識水平的提高。

## 五

新聞語言在語法方面健康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某些虛詞的用法趋向规范。

解放以前，在国民党統治区的报纸里，定語的标志“的”、状語的标志“地”、补語的标志“得”一般都写作“的”。这种混乱現象，在解放后的报纸中得了糾正。不过在1951年前后的报纸中，还有不少乱用的現象，例如：

如果以为一切进行的非常順利，牌告上的火車在途中不曾遭受任何困难和阻碍地向着目标前进，那就錯了。

（人民日报 1949. 8. 7.）

这几年来，有了很大变化，“的”“地”“得”在使用上有了比較明确的分工。請看下列：

你的办法如果行得好，那么我們再向你学习也不迟。究竟有什么必要象現在这样地迫不及待，…

（人民日报 1959. 5. 6.）

“和、跟、同、与、暨、及、以及”等虛詞，过去在用法上也存在着問題。“与”“和”既用作連詞，又用作介詞：“暨”“及”滿天飞；“跟”“同”很少出現。1955年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召开以后，基本上得到

<sup>①</sup>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838頁。

了解决。现在从报纸上摘引一些对比的例子来说明:

- 1) 苏联政府今后將繼續和偉大的中国人民, 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密切合作, 加强和他們的兄弟友誼与团结。

(人民日报 1953. 5. 1.)

合众国际社在报导这种輿論反映时说: 由于戴高乐的“大法国政策”, 法国同美国、西德、意大利和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关系, 将要达到“危机阶段”。

(人民日报 1959. 9. 4.)

- 2) 而与武装部队一同下乡工作的党政干部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及革命的工人、学生, 則除了学习政治和政策以外, 还必须了解一些普通的軍事知識……

(人民日报 1949. 8. 7.)

尼赫魯总理跟許多对中国显然怀有恶意的人們不同, 他跟我們在西藏問題上有某些分歧, …

(人民日报 1959. 5. 6.)

从上面两组对比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和”“跟”“同”現在已經有了分工。“跟”“同”用作介詞; “和”用作連詞。“与”有被淘汰的趋势。目前只常見于“××与××为敌”“××与××相結合”等格式中。“××与××为敌”, 这是文言格式, 可以看成是吸取古代汉語的問題; “××与××相結合”中的“与”字, 有被“同”替代的趋势, 如: “由于贯彻党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 教育事业经历了深刻的革命, 广大师生正在又紅又專的大道上迈进。”“及”“以及”也有了分工。“及”

只連接名詞, “以及”除連接名詞外, 还能連接動詞、詞組。

上面所談的虛詞在新聞語言中的規範发展, 仅仅是个开始, 这是个好的开始, 值得重視。

建国十年来, 我国新聞語言所发生的变化并不限于上述几个方面, 但是仅就所說的这些来看, 已經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 十年来, 新聞語言是在不断地朝着准确、鮮明、生动的方向发展的。它的发展速度是飞快的, 但又是穩妥的、健康的。这个发展变化反映了并且促进了整个祖国語言的健康发展。促使新聞語言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 是党的語言政策和毛主席語言学說的正确指导。毛主席关于向人民群众、外国和古人学习語言的指示是新聞工作者学习和运用語言的一把鑰匙和指針。有了这把鑰匙, 就可以打开語言宝庫的大門, 从中吸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 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新聞語言; 有了这个指針, 就可以保証新聞語言永远沿着正确和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可以断言, 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高速度的发展, 新聞出版物的迅速推广, 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 新聞語言必将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成为向群众宣傳真理、贯彻党的方針政策、进行階級斗争、交流建設社会主义經驗的更加有力的武器。

(上接 500 頁)

向国庆献礼时, 师生苦战編写出成套的大学彝語和大学僮語課本, 結束了历年来語文系民族語文教学上現編現印現講的忙乱局面, 給改进教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1958 年全系师生普遍地参加了各种生产劳动, 上山、下乡、下厂、夏收、秋收、大煉鋼鐵等, 为国家創造了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 提高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 丰富了科学研究, 改进和提高了教学质量, 从学生的考試成績上就可以証明这一点。如維語班的民族語文課, 1957 年度第一学期考試成績得“优秀”的二人, “良好”的六人, “及格”的六人, “不及格”的五人。1958 年度消灭了不及格現象, “优秀”的增为三人, “良好”的增为十二人, “及格”的四人。又如三年級同学同汉語文学班的朝鮮族同学去黑山劳动半个月, 不仅思想劳动双丰收, 在詩歌創作方面也获得很大成績。二百人半个月共写詩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七首。如照过去只依靠課堂教学是不可能短期内取得这样的

成績的。

5) 加强协作, 注意培养青年教师。民族語文教学工作是一个新的工作。如前所述, 語文系在初創时期專任教师只一人, 既要記錄材料、整理音系、制定符号, 又要編輯課本, 还要課堂講授。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單位都給予很大的支援, 每学期經常有两三門主要課程是依靠外援, 他們給語文系的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穩固的基础。

但是随着教学事业的发展, 这样依靠外援已不能滿足客觀实际的需要, 必須采取积极措施, 开研究班到外校进修, 送国外留学, 有计划地培养师資, 給青年教师培养和鍛煉的机会, 尽快使青年教师上講台, 給他們在教学实践中鍛煉提高。今后只有在依靠外援加强协作与培养师資自力更生相結合的情况下才能把教学工作搞得更好。

随着祖国十年建設的輝煌成就, 語文系的教学工作取得了以上所談的成績, 这是总路綫的胜利, 是党的教育方針的胜利, 是大跃进的胜利。讓我們在党的领导下繼續鼓足干劲, 跃进! 再跃进!



# 国庆十周年談文字改革

杜松寿

十年来祖国的经济文化面貌大为改观。有谁看见过五年计划两年完成的奇迹！有谁看见过短短的几个月之间六亿人民竟建成了共产主义的萌芽的基层组织——人民公社！朋友的赞誉使我们鼓舞，敌人的诽谤也从反面肯定了我们的成绩。

文字改革事业也同文化革命的其他项目一样，十年来有了质的改变，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六十几年来文化界先进人士不断提出文字改革的要求，拟出拼音方案并在社会上推行。但是也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没有无产阶级和他的政党的领导，特别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人民政权，文字改革工作不管在方向上、内容上以及实践上都不可能明确的和可靠的保证。解放前的文字改革倡议和运动都只能看做是人民在文化要求上的反映，看做是人民在文化方面向统治阶级的抗议。

早期的盧慧章(1892以后)，以后的王照、劳乃宣(1900以后)以及1913以后的注音字母提倡者都只提出了拼音字母的重大用处：1) 穷苦的劳动人民和妇女在无力上学认汉字情况下学会拼音就可以写信、记帐、阅读拼音书报；2) 学了拼音也可以阅读汉字拼音对照读物，通过自学逐步认识汉字，达到能阅读汉字书报的水平。他们的提法和出版物都说明了这一点。

1928年以后的国語羅馬字，其倡议者想把它作为文字代替汉字，它以拼音文字的面目出现——词儿连写，大写用法，略写等。反动政府则把它贬为注音字母的另一种形式。国語羅馬字，顾名思义是以国語(普通话)为标准的，这跟当时的国語运动是异曲同工的。

1931以后的北方化拉丁化新文字，顾名思义，是作为拼音文字提出来的。当时的提倡者主张，不仅有北方话新文字，还应该有方言的拼音文字，由分散走向统一，同时把北方话新文字作为全国共同的拼音文字。他们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但不主张立即废除汉字，而是双轨并行，让拼音文字逐步代替汉字，最后正式取而代之。

这时期也有一部分人提倡简化汉字或手头字，以节约汉字笔划或减少字数。

所有这些倡议或运动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群众的要

求，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组织，统一意见和全面观点。当时的政府则是站在消极的或者反对的地位。

只是在解放后，党才把文字改革的诸项事业集中起来，明确地提出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拼音字母。

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一样，党对文字改革事业的领导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之下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两条腿走路。

我们成立过文字改革协会，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我们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为了简化字方案和拼音方案以及推广普通话，我们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先后成立了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和其他专门委员会；曾经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周总理向全国政协作了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报告；人代会作了关于拼音方案的详细讨论和庄严的决议。

我们的党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第一次公正地说明了汉字的历史贡献和今天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有有力地论证了迫切需要汉语拼音方案的道理；要人民诚心诚意地学习汉字，也要大力学习和使用拼音字母；既要学习汉字，又要简化汉字；既要整理汉字，又要研究推行拼音方案；既不排斥方言，又鼓励大家学习普通话；既要发展少数民族的语文，又欢迎他们学习汉语普通话。这就是党在文改事业中的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对文改事业有了明确的认识，有了行动的方向，这就是党对我们深刻的、结合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十年来的事实和经历证明了党的文改政策是正确的，是吸收了几十年来文改运动的优良倡议，同时放弃了一些对今天说来并不合适的东西，并且结合今天的需要提出了新的内容。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地主社会、官僚主义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着重点是笔者加的)我们承受了这个“发展的结果”，就可以澄清我们一些糊涂观念和片面看法。比方

說，我們了解到漢字的歷史貢獻和它在今天所起的作用，我們就不能對漢字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者對它漠不關心，不關心學生和文盲學習漢字，不關心漢字的整理工作（簡化漢字、統一異體字……），而是要研究怎樣使它簡易好學，怎樣學好它，怎樣才能多快好省地學會它。我們了解了普通話的重要，了解了它在促進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們就可以正確地對待所謂方言文字、方言文學問題。認識到：作為口頭語言，方言是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的。作為文化遺產，方言文學必須保存、整理；但是作為文字和書面語發展的方向，我們就不必提倡方言文字、方言書面語，同民族文字和民族書面語對立起來。我們了解到，拼音的作用在今天還不是拿來代替漢字，而是幫助漢字，幫助人們更多更好地認識漢字，幫助漢字來辦一些漢字自身搞不好的事情（如電報、索引、盲文、聾啞人學話和手指語、作創制或改進少數民族文字的字母基礎……），我們就不會脫離客觀實際，只醉心於拼音文字的倡導而忽視當前的主要工作——把拼音字母交給群眾，廣泛利用拼音字母為現代文化技術服務，來推進我國的文化革命。我們看到了文字的遠景，我們就必須分出一部分精力對拼音文字作一些研究、實驗工作。在當前的實踐工作中，我們也在某些方面已經邁開了大步。比方拼音電報、海軍旗語、盲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等等。十年來鋪好的文字改革的坦途和聲勢浩大的進軍，這分光榮的業績，應該完全歸功於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

漢字的簡化現象雖然在漢字產生的初期就出現了，但是形成了一種不可遏止的寫簡體字的洪流，則是與解放的時日而俱增的。1956年國務院公布的簡化字表已經分四批正式使用了，但是隨着廣大人民的文化教育程度的不斷普及與提高，怎樣使文字寫起來更加簡易迅速，仍然是人民迫切的要求。已經公布了簡化字遠不能滿足客觀要求，群眾臨筆自行簡化，自行創造的風氣有如雨後春筍，不可遏止。這種現象很使一些人頭疼，怕天下大亂。但是我們應該從積極方面考慮這個問題，應該為提高工作效率去滿足群眾的這種合理要求。而黨就是根據這種要求指示我們，要提出更多的簡化字。一方面廣泛吸收群眾創造出來的好簡體字，一方面更大膽地有系統地本着易寫易記的原則研究出來一批新簡化字。

普通話的推廣，在解放後有了新的意義，因而也獲得了顯著的發展。新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求更多的人會講普通話，對知識分子是這樣，對解放軍戰士、對工人甚至對農民也是這樣。而這樣的事也就

這樣發生了：在方言非常複雜的福建山區和廣東、浙江一些地方，人民公社里全民性的學習普通話運動早已展開，取得了典范性的成績。這次全國第二次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應該說是大會在進行推廣普通話丰收的驗收工作，而對這些代表的評獎應該說是中央和全國人民對他們的優異成績的批准。在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精神號召之下，普通話的推廣工作正在迅速飛躍，人們將以卡甘諾娃的精神消滅推廣普通話方面那些不平衡現象，讓小學帶動中學，低年級帶動高年級，語文老師帶動別科老師；讓課堂講帶動課外講，校內講帶動校外講；讓先進的全民性的普通話地區帶動全國各地。

漢語拼音方案的擬定和推行在中國文化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為我國廣大勞動人民開了文化的大門，從此有了學習漢字的鑰匙，有了學習統一的語言——普通話的捷徑。它沖破了兄弟民族、兄弟國家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學習漢語的兩道藩籬——漢字和方音分歧，它已經成了外國朋友學習漢語普通話的憑借，成了他們進一步學習漢字的拐棍。由於我們採用了國際通行的拉丁字母，由於我們方案的科學性、準確性以及對漢語語音體系的緊密結合，外國的漢語教學逐步在放棄舊日自行擬定的譯音符號而代以漢語拼音方案。兄弟民族掌握了拼音字母，在很短的期間就可以學會漢語普通話。更重要的是這個方案提供了兄弟民族新創或改進文字的共同基礎。這一切也就說明了漢語拼音方案的超技術的意義，它有助於國際和國內的團結友愛、合作互助，它具有了重大的政治意義。漢語拼音方案為我們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开辟了廣闊的途徑。這些科學技術必須通過數碼通過字母才能利用，而更其重要的是字母必須是拼寫本族語言的，這樣我們的科學才能廣泛地、飛速地發展。從前借助外國字母傳播科學技術的那種阻滯我們迅速進步的絆腳石，從此可以一掃而清，這是我國人民引以自豪的一件大事。

幾年來尤其是大躍進以來文字改革的工作在飛速發展。它已經與全國廣大工农群眾的文化生活密切結合，它也把漢族和兄弟民族更加團結起來。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這反映了黨和人民政府文化政策、文改政策的英明正確，反映了黨和人民政府對人民文化教育的無限關懷，反映了祖國文化科學的飛躍，反映了廣大人民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和信任。

在國慶十周年的時候，作為一個文字改革工作者，緬懷解放後十年來在黨的領導和指導下文字改革事業上的巨大成就，無限的興奮油然而生。為祖國萬歲歡呼！為文字改革勝利歡呼！



# 机器翻译研究

——庆祝建国十周年——

刘涌泉 高祖舜

1956年，在我国科学史上展开了新的光辉的一页：一门崭新的学科——机器翻译（亦称自动化翻译）研究列入了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计划。几年来由于党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关怀，在党的正确的科学发展方针指导下，机器翻译研究象其他所有方兴未艾的学科一样，以它无限的生命力迅速地成长和发展起来，并获得了不少的成就。机器翻译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是在语言学、数学和计算技术这三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应用语言学中的一个新的分支，也是数理语言学中最主要的部门之一；从数学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应用数学（主要是计算数学）和控制论的分支之一。机器翻译，由于它所担负的光荣使命——减轻人的脑力劳动；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使语言研究精密化——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

诚然，机器翻译在中国，是在苏联的研究成果传到我国之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的。<sup>①</sup>但是在此以前，如何利用机械来寻求翻译出路的这一念头，早在一些科学工作者和翻译家的脑海里出现过；并且在如何进行翻译的问题上有过某些考虑。<sup>②</sup>

1958年初，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机器翻译研究。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成立机器翻译研究组。该组以俄文的数学文献（彼得罗夫斯基的《偏微分方程讲义》）为主要材料，进行了大规模的俄汉机器翻译研究。一年多来，这项工作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制定了一套俄汉机器翻译的规则系统，并即将在我国第一架电子数字计算机上进行试验。下面我们将简要扼要地谈一下该组在研究俄汉机器翻译工作上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sup>③</sup>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也正式成立专门的机器翻译研究小组，该组一方面和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研究俄汉机器翻译，同时又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合作研究英汉机器翻译。英汉机器翻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下面我们也将简要地谈谈这一工作的情况。除此以外，法汉、德汉的机器翻译研究目前也正在筹备中。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工农业大跃进的鼓舞下，在党的“全民办科学”的方针指导下，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展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去年12月，北京俄语学院（已和外国语学院合并）和华南工学院先后成立了俄汉机器翻译研究小组。今年3月，北京外国语学院又成立了英汉机器翻译研究小组。4月，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成立了俄汉机器翻译研究小组。另外，对机器翻译作某些研究和准备进行研究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等单位。目前，在高等院校编制的以机械学文献和以控制论文献为基础的两套俄汉机器翻译系统（语言学部分）也已完成。

## 俄汉机器翻译

在电子计算机上，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实际上是通过求得两种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别的对应规律而实现的。假如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机器翻译问题乃至于一般的翻译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由此可见，我们要研究并实现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机器翻译，首要的任务也就是要弄清这两种语言的结构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进一步进行严密的语法对比研究，以求出两者之间的对应规律。但是，研究两种语言之间具有哪些对应关系，并不是机器翻译研究的最后目的。对于机器翻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如何制定这样的一套规则系统：使译出语中的一种语法手段（比如词形变化）固定地转变成译入语中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语法手段（比如词序）。

俄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按照形态学语言分类法的划分，俄语属于综合型、屈折型语言；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形态成分很少。因此，在这两种语

① 见胡世华：《数理逻辑的基本特征与科学意义》，《哲学研究》，1957年，第1期；刘涌泉：《谈谈机器翻译问题》，《语言研究通讯》，1957年，第9期。

② 参看于道泉的《谈谈翻译的机械化》，《中央民族学院院刊》，1956年9月21日，第17期。

③ 本文所讨论的只是机器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

言的語法上和詞匯上都有其不少的差別。

大家知道，俄語靜詞有性、數、格的語法範疇。俄語的名詞、形容詞、形動詞在句子中都可能以單數或複數的六個格中的任何一個格出現；俄語動詞現在時也有六種變化形式。因此，如何巧妙地確定這些詞的每一種形態，如何在漢文譯文中表達這些形態（當然不需要表達所有的形態），這是俄漢機器翻譯研究中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俄語詞的形態變化（變格或變位），雖有一套嚴整的系統，但也還有為數眾多的例外現象，即所謂“特殊變化”，這就給機器翻譯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為在編制機器翻譯規則系統時，必須要考慮到這些例外現象，並加以個別地處理。

俄語和漢語的不同點，不僅表現在詞的構造和變化方面，而且还表現在句子結構，即句子成分的排列（詞序）方面。在俄語句子中，一個詞的作用，一個詞對另一個詞的關係，主要是通過不同的詞尾來表現的。因此俄語的詞在句子中的位置具有很大的靈活性，甚至有時變動得非常厲害。蘇聯一位語言學家彼什考夫斯基曾經作過這樣的統計：一個由五個詞組成的句子，比如象“Я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пойду гулять”，它可以有一百二十種排列方法，這對形態成分很不發達的漢語來說，是難以想象的。但是，俄語的詞序靈活性並不是漫無邊際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如在邏輯性很強的科學技術文獻中，也受到很大限制。

漢語的情況與俄語不同。漢語的詞序在句子中占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組詞成句的一種語法手段。在漢語句子中，詞的作用，以及詞與詞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詞序來表現。因此詞的排列基本上是固定的，不能任意變更的，否則會引起整個句子的意義的變化。

由此可以看出，俄漢這兩種語言的差異很大，這就決定了俄漢機器翻譯的研究是一個十分複雜而又艱巨的任務。

俄漢機器翻譯系統，是由以下兩個相繼工作而又各自獨立的部分組成：俄文句子的分析和漢文句子的綜合。俄文句子的分析包括俄文詞典和俄語語法分析諸綫路圖表；漢文句子的綜合包括漢語語法綜合諸綫路圖表和漢文詞典。二者及其各部門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俄文詞典給俄文語法分析和漢文句子綜合提供詞匯語法信息；① 俄文句子語法分析依賴於從俄文詞典中得到的信息；漢文句子的綜合同时依賴於詞典中所給出的信息和俄文句子語法分析後所得到的信息；而這兩個部門工作的結果是通過漢文詞典輸出譯文

的。下面我們簡單地談一下有關機器詞典、俄文分析和漢文綜合的幾個一般問題。

## I 詞典

1) 詞典的結構 俄漢機器翻譯詞典和一般詞典不同的特點之一就是它是由兩個獨立的部分組成：俄文詞典部分和漢文詞典部分，前者的任務是給俄文語法分析和漢文句子綜合提供詞匯語法信息，而後者只是提供輸出的漢文詞。俄文詞典部分構造比較複雜，它里面包括“單義詞詞典”，“詞尾詞典”，“詞組詞典”和“多義詞詞典”。事實上，這些名稱都具有一定的假定性。例如，所謂“單義詞詞典”，它包括需要收入機器詞典的所有詞，也就是說，它也包括多義詞和組成詞組的詞。“詞組詞典”也是一種廣義的稱呼，它不僅收入一般常見的成語、熟語、習慣用語，同時也包括那些在文獻中（在我們的情況下是數學文獻《偏微分方程講義》）出現頻率很高的詞組，如 уравнение с частными производными，以及一些較難處理的詞組，如 параболический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多義詞詞典”不僅收入具有多種意義的詞，而且收入擔負多種語法功能的詞。

機器翻譯詞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詞匯不是按照俄文字母的順序排列的，而是根據詞的出現頻率分段排列的，這樣可以保證機器迅速而有效地工作。

2) 詞尾詞典 詞尾詞典就其工作的性質而論，是單義詞詞典的一個附屬部分。它與單義詞詞典相互協作，交替工作，完成查詞工作，並提供由詞尾所表示出來的語法特徵。

上述詞典的這種結構，是由機器翻譯本身的特點和俄語的特點決定的。正如上文所述，俄語是一種有形態變化的語言，一個詞（指有形態變化的）在上下文中可能以它為數眾多的變體中的一種形式出現，而每種變體都具有特定的意義。因此，就原則上來說，機器詞典應該包括所有需要收入的詞以及它們的所有變體，這樣才能滿足從詞典中找到原文中出現的每個詞（原形詞或詞的變體）。然而，這樣做不會給機器翻譯帶來什麼好處，因為機器詞典中詞匯的數倍擴大，其結果必然減緩機器翻譯的速度。事實上，俄語的詞的各種變體都是以特定的形式——詞尾表現出來的。俄語詞尾的數量並不太多，因此在機器翻譯詞典中設置一個獨立的部分——詞尾詞典，它提供有關詞尾的信息，就可以

① 這裡所談的語法信息，從語言學的观点上來看，是指各種不同類型的詞所具有的語法特徵，例如：該詞屬於哪個詞類，有生命與否，是否多義，什麼性、數、格，屬於哪個詞匯組別……等等；在電子計算機中，信息是以一種物理現象或狀態來出現的（如脈沖波或穿孔紙帶）。



解決絕大部分俄語單詞的各種變體的語法意義問題。

關於詞尾詞典的內容及其工作的基本原理，我們簡單地分述如下：

詞尾詞典中，詞尾按組成詞尾的個數分成三類：1) 三個字母的如-ому, -ете；2) 兩個字母的如-их, -ах；3) 一個字母的如-а, -и。三個字母的排在最前面，其次是兩個字母的，最後是一個字母的。除按詞尾的類別排列之外，每類詞尾內部又根據頻率的高低先後排列。然而，從純形式的原則上來看，俄語的詞尾最多可以有5—6個字母組成，如 красивейший,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красивейшему,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у。從詞尾的性質上看，俄語詞尾又可以分兩種：詞形變化詞尾和構形詞尾。前者如-ошу, -ите, 後者如-енн-, -им-(видимый), -т-(взятый), 等等。

詞尾詞典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使俄文的上下文詞形還原成詞典形式，亦即詞的原形。還原的方法可分“代尾法”，“削尾法”和“加尾法”三種。

這三種還原法除了可以單獨使用以外，還可以綜合應用。例如 равен (形容詞 равный 的短尾) 一詞，應先剷除最後第二個字母 e，然後再加上詞尾-ый 才能使它恢復原形。

3) 詞典存詞的形式 關於解決機器詞典中的存詞形式問題，目前存在着如下兩種方案：(1) 存詞的原形；(2) 存詞干（即詞的不變化部分）。我們認為，無論是詞干詞典或原形詞典都具有其利弊之處。前者的優點是，它能以較快的速度完成查詞的工作（在查詞的程序設計上可省略幾條指令），但是詞干詞典本身包孕着一個較難克服的弱點，那就是：利用俄語詞干形式，容易發生大量偶合的同形現象。實踐證明，不僅 как-ой, перевод-перевод-ить 類型的詞發生同形現象，而且 работ-а-работа-ть, дел-о-дела-ть, отдельно-отдельн-ое 類型的詞也發生同形現象。

同形詞產生的可能性與詞匯數目成正比，詞越多，產生同形詞的可能性就越大。上文列舉的第一類同形詞在編制詞干詞典時就可以發現，但第二類往往是上下文中出現的某一詞形與詞典中某一詞干發生同形，因此事先很難估計到。確定整個詞匯系統究竟有那些同形詞，是一件十分艱巨的統計工作。

解決同形詞的問題，對機器翻譯研究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它關係到機器翻譯的成功與否，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克服不了的困難。同形詞同樣可以根據詞的本身構造和上下文分析而區分開來。

至於談到原形詞典，就目前來說，它比詞干詞典

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這是因為原形詞典的存詞形式以及查詞方法可以大大地堵塞同形詞的泛濫。

所謂原形詞典，是根據詞典中的主要存詞形式而命名的。事實上，為了查詞方便起見，原形詞典也可以而且必須存入一定量的詞干；同時還可以存入一部分“假原形詞”。①

然而，原形詞典不足的地方就是查詞的速度較之詞干詞典要慢，根據我們的初步統計，兩者之間的懸殊不是很大。

在我們新編制的俄漢機器翻譯系統中，採用的是原形詞典。

4) 詞組詞典 詞組一般由兩個、三個或四個詞組成。在詞組詞典中，組成詞組的每個單詞，也應該以原形形式存儲。比如，成語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應以 в такой случай 形式存儲。這樣做便利檢查。因為詞組在上下文中無論出現哪種變體，我們都可以在詞組詞典中直接查它的原形，而不管它的變體。

從詞組在句子中所處的地位，即它和其它詞的關係上來看，可以分成以下兩大類：1. 獨立的——即與句子中其它詞沒有支配關係的，如 так как, в такой случай；2. 非獨立的——即與句子中其他詞有支配關係的。這裡又可分兩種：a) 支配他詞的，如 в отличие от, b) 受他詞支配的，如 уравнение с частный производная。根據詞組種類的不相同，它們的特徵也不同。第一類詞組的特徵，完全根據它本身而定，如 так как 得“非等連詞”特徵。而第二類詞組的特徵則根據支配關係而定，這類詞組的第一種如 в отношении 得“前置詞，支配二格，引狀語”特徵；第二種如 уравнение с частный производная 保留第一個名詞所有的各種信息。

5) 多義詞詞典 在一般雙語言詞典中，對多義詞照例是羅列它的幾種可能的意義，因此一個翻譯者在查詞典時，必需從幾種可能的意義中選取一種需要的意義。機器翻譯的情況完全不同，機器不能象一個翻譯者那樣，“有意識地”從機器詞典的幾種可能意義中選取一種需要的意義。

機器翻譯的多義詞詞典是按這樣一個原則編制的：使機器能固定地從多義詞的幾種可能詞義中選定

① 所謂“假原形詞”，我們是指一部分動詞變位後的詞干加上動詞詞尾 -ть 的存詞形式，例如 интересоваться-интересуют,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等。這樣存是為了便於檢查。這類詞可以用檢查 читать 型動詞詞尾的方法（即以-ю, -ет, -ем 等上下文詞尾去代-ть）來確定該動詞的人稱、數、時等語法範疇。

需要的意义。根据上下文分析的原则,就能制定这样一套有效的规则系统,即多义词词典。结构学派的“位置语法论”,即依据词出现的环境,依据所谓“可能出现的地位”来确定词的类型的研究方法,虽然不是研究一切语言事实的有效方法,但对于编制以形式来决定翻译意义的机器翻译的多义词词典来说,它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上文已经讲过,多义词词典具有很大的假定性,即它不仅对多义词进行加工,而且对那些同音异义词即同形词也进行加工。多义词在加工过程中,还在可能的条件下确定它们的句法成分,这样可以使这部分词不必经过分析图示加工而在下一步直接转入综合线路图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机器翻译词典中,在确定多义前置词的同时,还可以确定它的多义的句法功能。例如,前置词“в”加工后可得:1,“在……中”(引状语);2,“不译”(引间接补语);3,“不译”(引定语);4,“为”(引间接补语);5,“在……”(引状语);6,“到”(引间接补语);7,“在……上”(引状语)等等。

6) 词典的语法特征 如上所述,词典除报导或确定词义外,还为语法分析和语法综合提供必需的语法特征。据此,词典中提供的每一个信息都应以“实用”为原则;同时考虑到节省存储单元起见,语法信息又以少为佳。

机器翻译词典需要哪些语法特征,这要视语法分析和语法综合必须依靠和利用哪些语法特征而定。工作实践证明,传统语法中的绝大部分语法术语和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在机器翻译中应用。当然,为了适应机器的性能,必须使传统语法中的那些术语更趋精密化,使那些语法概念具有更严格的概括性。为了这一目的,我们首先重新划分了俄语词类。划分词类的原则是:凡具有共同的形态特征和相同的句法功能的那些词都为同一个词类。根据这一原则,俄文数学文献中的所有词都可以归入下列六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前置词,副词,连词。

机器词典除报导一般语法特征之外,还报导某些词的分组特征。必须指出,这些组别中有很大部分不是依据词的形态即词的形式规定的,而是根据词的意义上的某种共同性而规定的。例如,形容词 каждый, всякий, любой, 组成“综I组”的原因不是由于它们同属于形容词类或各具形容词词尾,而是由于,当它们修饰主语或本身转化为名词并作主语时,在汉文译文中,谓语句前都可加“都”字。在词典分析中,许多词义也都需要依靠词的组别来确定。由此可见,目前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唯心主义学者,说什么机器翻译可以

排除意义而光靠形式来实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无根据的,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机器只能依赖于形式这是无可否认的,因此,为它事先编制一套纯形式的系统;然而不能说,机器翻译可以排除意义而光靠形式。事实上,意义也是实现机器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因为人们在编制纯形式的规则系统时,不能不考虑意义。

## II 语法分析

俄语语法分析规则系统的使命乃是根据词典信息或词典分析所得的信息,进一步对原文分析,以确定原文句子中词的形态成分和句法关系,为汉文句子的综合工作准备条件。

在介绍语法分析系统之前,先谈谈俄语语法分析的基本原则——形态结构分析法。应用这一分析方法的根据是:俄语拥有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形态,不阐明这些形态所代表的内容,其他任何问题都不得解决。比如要想知道 книги 是单数还是复数,是第几格,是什么句法成分,都需要从形态(词尾)-и 上分析。然而光从形态本身分析,除个别情况外(主要是动词的一些形式),一般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还应从结构上,即从词与词的关系上想办法。例如,要想求得 книги 的数格和句法成分,需要了解它前面有无前置词;是哪一种前置词;句中动词属于哪一类,前面有无否定词;它前面有无名词,是否为动名词;它在句中的位置如何,等等。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应用这一分析方法,才能解决从俄语译成他种语言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说:俄语句子分析过程中采用形态结构分析法,这是由俄语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针对俄语本身的特性而制定的分析法,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在语法分析系统中,确定任何一个词的特征,都是在直接分析上下文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该词直接发生关系(比如说支配关系)的词不一定紧靠着该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无支配关系的词(如一般形容词,副词等)以及插入语,插入句,独立语等。这就提出了另一个任务,即在语法分析系统中需要制定一套严密的“放过规则”,而且首先应对分割句子结构的标点符号进行加工。在标点符号分析加工过程中,中心问题乃是确定逗号的多种功能。解决这个问题方法,目前也有几种方案<sup>①</sup>。我们认为,

<sup>①</sup> 参看:Т. М. 尼柯拉耶娃,《俄语—外语机器翻译中的标点符号分析》,译文见《语言学译丛》1959年第2期;Gerard Salton “The Use of Punctuation Pattern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载于《Mechanical Translation》杂志,5卷1期。



确定具有多种功能的逗号,可以依据逗号的位置分几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应先确定简单插入语①前后的逗号,进一步确定由一部分非同等连词如 как, чем 等引出的插入语或插入句前后的逗号,然后再确定副动词独立语、后置定语、各类副句和同等成分间的逗号。这几个步骤有的可以在一个线路图中实现,有的分若干个图表实现。

1) 形容词和形动词 形容词和形动词,②就其在句子中的作用而论,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它们可以在同一个分析图示中加工。俄语形容词和形动词在句子中最常见的句法功能,一般是作名词的一致定语和后置定语。③然而,要确定形容词和形动词作哪个名词的一致定语或后置定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紧靠形容词或形动词的名词不一定是被定语,它可能是形容词的补语或支配格的形容词的补语。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比较名词和形容词(或形动词)的词尾的性数格。

为了综合加工的方便起见,在确定两类词的一致关系之后,它们应各自得到一个相关的信息:“一致定语”——“被定语”;“后置定语”——“引后置定语”。

在形容词分析线路图中,应辨别以-o 结尾的短尾形容词与 o 型副词的同形,以及以-ee 结尾的中性形容词与 ee 型形容词或副词比较级的同形。另外,在形容词分析图示中,还应考虑到词类转换的问题。

2) 动词 俄语动词的语法范畴,由很明显的形态标志表现出来;俄语动词的句法功能也比较简单:除不定式之外,通常都作谓语。在科学技术文献中,俄语的动词不定式通常也只是作副谓语④,名词的非一致定语,补语。由此可见,处理俄语的动词要比处理其它词类简单得多(只是指确定它的句法功能而言)。因此,在动词分析线路图中,只对带有“动词”特征的下列三种词进行加工:1)动词不定式,2)动词过去时,3)作谓语的形动词。

确定动词不定式的句法作用,只要检查其左方的词便可以。如果它左方有谓语副词、谓语形容词、助动词、系词,该词便得“副谓语”特征;左方如有 возможность 类名词,则为“非一致定语III”;左方一词如为变位动词,则为“补语”。在俄语中,带有过去时词尾的动词,不一定表示动作曾经发生或已完成;在带有 бы 的假定句中或带有非同等连词 чтобы 的分句中,动词过去时的词尾实际上是无语法意义的。因此,动词分析图示应消除这类动词的“过去时”特征。短尾形动词在动词分析图表中加工的目的,也是要确定它作主谓语呢还是作副谓语。

从谓语中分立出“主谓语”和“副谓语”的要求是汉文综合所提出的。因为很多说明谓语的副词(包括前置和后置的)在词序改变时,通常应移至副谓语前,而状语一般都移至主谓语前。

3) 名词 俄语名词词尾多义的普遍性,俄语句子诸成分排列的“自由性”,给机器翻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尽管如此,俄语名词的格的范畴仍然可以依据它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依据前置词,动词,支配格的形容词,数词以及句法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确定。

要确定名词的格(当然,这里管的只是带多义性词尾的名词,如 уравнения——“单数二格,复数一、四格”),我们首先得通过一系列对前后词的检查确定它的位置,然后再根据它的位置或是作出特征或是进行下一步检查。例如,当我们检查出 уравнения 的左方一词为支配二格的前置词时(在检查时,我们照例按放过规则放过那些无支配关系的词),我们便可以给 уравнения 作出“单数二格”特征。然而,即使我们通过检查知道 уравнения 是在及物动词直接之后,我们也无权按它所处的位置立刻给它作出“复数四格”的特征了。这是由于俄语词序的自由性,及物动词之后的 уравнения 完全有可能作主语,因而为复数第一格。这样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检查谓语前的名词的情况和谓语本身的情况,再根据新的数据给该词作出特征。

为了便于综合,在确定名词的句法成分时,应同时确定它的同等成分⑤,并给后者一个“同等成分”的特殊信息。

在谈到俄语名词分析的时候,我们应顺便谈一下不变名词和公式的处理问题。不变名词通常可以根据上述方法直接确定它的句法成分。在数学文献中,公式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其一带有句子的性质,这可视其有无 =, <, >, ≤, ≥ … 等符号判断;其二带有名词的性质,对这类公式需要作专门的加工,以确定它

① 这里是指词典中已给出“插入语”特征的词,如 например, во-первых…等。

② 指不作谓语的长尾形容词和形动词。

③ 后置定语包括传统语法中的形容词独立语和形动词独立语。

④ 我们把合成谓语中有形态变化的部分(包括助动词,系词,谓语形容词)以及谓语副词叫做“主谓语”,而把动词不定式叫做副谓语。复合谓语如 может быть определено, может 为主谓语, быть определено 为副谓语。简单谓语也通称为“主谓语”。

⑤ 语法综合时,需改变词序的名词应连同其同等成分一起移动。

在句子中所担负的句法功能。

### III. 語法綜合

俄汉机器翻譯的語法綜合,是根据詞典所提供的信息和語法分析的結果而进行的。語法綜合的內容有:調整詞序,形态加工和修辭。詞序調整的工作非常复杂,是語法綜合部分的中心,也是整个俄汉机器翻譯系統的中心。“詞序是一种句法范疇,因此,應該把它了解为由一个詞或一串詞組成的各个和造句法有关的單位的次序,而不應該了解为作为詞汇学和形态学單位的‘單个詞’的次序。”<sup>①</sup>因此,俄汉机器翻譯中的調整詞序,是依据汉語的规范对俄文的造句法單位(包括复合句中的分句)的次序进行調整。

汉文句子的綜合,是由一些相应于各个俄文造句法單位的綫路图表組成,这些图表相互連系,并依次进行工作。

下面我們簡單介紹編制綜合綫路图的几个基本原则。

1) 綜合系統中諸綫路图的加工次序,依赖于所加工的句法成分与其他句法成分的依从关系。例如,一致定語依从于补語,主語,状語……等;一致定語在綜合加工时是否需要調整詞序,通常是由它所依从的句法成分决定的。因此,一致定語的加工图示在整个綜合系統中应摆在它所依从的句法成分加工的图示之前。其他句法成分的加工次序,也应以此原則为准。否則譯文一定会造成驢唇不对馬嘴的局面。

2) 在改变詞序时,首先应确定改变詞序的基本軸心。在一个簡單句或复合句的分句中,这个基本軸心就是謂語。主語,补語,状語的位置都依靠謂語而定。在后置定語和副動詞獨立語中,这个基本軸心就是后置定語或副動詞,与其有关的补語、状語的位置都依靠后置定語或副動詞而定。除了基本軸心以外,还应该确定次軸心:定語的軸心是它的被定語;同位語的軸心是它的被說明詞,等等。

3) 与上述两点相联系的是:必須使定語和被定語或其他相互紧密联系的句法單位連結成为一个整体(組合),即应給加入組合的每个詞一个共同的號碼。这样可以保証在需要移动組合中的主要詞时,整个組合也随之移动。

4) 每个句法成分及其同等成分在与之相应的图表中加工之后,不管其位置移动与否,都应給它一个“已加工”信息,以免在綜合綫路图的循环工作过程中,重新选取出来加工。

5) 俄文一部分前置詞在譯成汉文时,构成汉語中的方位結構,如 в (在……中), на (在……上), 等

等,为了翻譯这些前置詞,在諸綜合綫路图中对前置短語加工完后,应将前置詞的第二义素(“在……中”一結構里的“中”字,我們称之为第二义素)連結在該短語及其同等成分之后。

6) 在改变詞序的同时,句子中的标点符号也应随之进行調整:增加或消掉多义性标点符号的某一特征。

7) 为了翻譯俄語的某些形态成分,在改变詞序的过程中,需添加汉字。

8) 根据原文分析得到的信息,对動詞的时间等进行加工,即翻譯其形态所表达的意义,如加“过”、“了”,等等。

9) 为了使譯文更接近于汉語规范,机器应对綜合就序的譯文进行修辭潤色。修辭工作可以憑藉句子中的某些詞,有时也可依靠某些特征来实现。例如在带有复合連詞 если……, то……的条件复合句中,我們就可以憑借这两个詞而在主句的謂語前加一个“就”字。

汉語綜合系統由下列一系列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綫路图組成:1)同位語,2)副詞状語,3)一致定語,4)非一致定語 I (A. Б), 5) 非一致定語 II, 6) 非一致定語 III, 7) 后置定語, 8) 副動詞獨立語, 9) 插入語, 10) 主語, 11) 直接补語, 12) 間接补語 (A. Б) 13), 状語, 14) 副句, 15) 形态加工, 16) 修辭。本文的目的不是描写这些图表,而是初步提出編制綜合图表的上述几項原則。

### 英汉机器翻譯

上面已經談过,研究和实现任何两种語言之間的机器翻譯,首要的任务是弄清这两种語言的結構的特点…研究英汉机器翻譯,当然也不能例外。必須先要摸摸英汉两种語言的底(即进行对比研究),针对它們的实际情况,規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英語和汉語也是彼此类型不同的語言。英語是一种半綜合型、半分析型的語言(它原是綜合型的,后来逐漸向分析型发展,现在是两方面的成分都有,因此,給了它这样一个名称)。而汉語是分析型的。由于类型不同,因而它們之間存在着不少差別。但是,它們之間的差別,比起俄語和汉語之間的差別,要小得多。这一点說明,英語和汉語在类型上還比較接近;同时也說明了,英汉机器翻譯,較之俄汉机器翻譯,有些方便。

<sup>①</sup> 見刘涌泉:《俄汉机器翻譯中的詞序問題及其解決办法》,載于《語言研究》,1959年,第4期。



(当然,也有一些独特的难题,例如同形词问题等。)

英语有哪些特点呢(与汉语比较)?英语中某些词类仍保留着形态变化,如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数、时、态,形容词和副词的级等等,但它们的形式标志(词尾)并不多(-s, -'s, -', -es, ies, -ing, -ed, ied, -er, ier, -est-iest, -th 等等),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多义的。英语词序虽然比较固定,也和汉语的词序比较一致,但是在这方面仍有不少独特的地方。此外,一词多类的现象(即同形词)也是个突出的问题。

以上这些情况规定了我们的工作。例如,英语有形态变化,因而在存词形式,辨别同形词,形态加工等方面要考虑到这些形态,但是,它的形态很不丰富,因而分析方法不能专依靠这些形态(指狭义的形态,即词尾);英语和汉语词序比较一致,这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化调整词序方面的工作;同形词多,影响分析工作进行,因而必须在分析之前就应辨别它们的实际面目。

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也由两大部分组成:原文(英文)分析和译文(汉文)综合。原文分析部分包括词典分析和语法分析;译文综合部分包括语法综合和词典综合。词典分析和词典综合基本上和俄语的差不多;语法分析与俄语的差别最大,这里应用的是句段分析法;语法综合的基本原理与俄语的相同,但整个线路简单些。下面扼要地谈谈这个系统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同形词处理问题:英语中有大量的同形词,如 N-V, lead, study; N-A, light, constant; V-A, complete; Prep-Adv, before; A-Adv, even, first, A-N-C: that, which; A-N-V, square, round, 等等。这些同形词不仅从语法意义上说是同形(即一个词代表多种词类),而且从词汇意义上说也是同形(即译法不同)。其中只有极个别的词在英译汉的条件下可以是词类不同而译法相同(即免去词义同形现象),如 study(研究), work(工作)等词。但是应该指出,就是这些极个别的词也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如此。范围一大就不保险了。例如 work 还可以译成:著作,事业,开采,等等,又如 study 还可以译成:学习,书斋,等等。因此,处理同形词(包括那些极个别的词)不单单是区别它们的词类,而且同时要确定它们的意义。然而,为了便于分析其他词,同形词的处理应先于一般的多义词。

同形词是如何处理的呢?先是依靠本身的形态加以辨别,如果 V-A 类型中的词有 -s, -ing, -ed 尾,则可肯定不是 A, 又如 N-A 型中的词带有 -er, -est, 可肯定为 A。其次是根据位置来判断,例如查 before 后面有无名词等,有则为 prep, 无则为 Adv。又如,查

work 是否在冠词或形容词后,查它是否在助动词、代词性名词后,等等。以上各词在区别语法同形的同时,得到相应的意义。如果其中之一或两个都是多义,那么可继续检查。例如 form 一词:

- a/b, I/ 查该词左方一詞为 A 或 Art.
- b/II c/ 查该词左方一詞为 spherical.
- c/III, IV/ 查该词左方一詞为 isotopic

I. 形成(v), II. 形(n), III. 零义(n), IV. 形式(n)

除了上述一些方法外,有时还要应用一些局限性的补充规律,例如查句中是否有另一动词以确定是动词或是名词,等等。

至于有些英语的名词可以用作形容词来修饰第二个名词的现象,(这是英语发展的趋势,如 a hydrogen atom[氢原子], electron volt unit[电子伏单位]等等)。我们没看作是同形现象。汉语中也有这样的特点,即所谓“词无定类,入句而后定”。因而,没有必要区分它们。然而,在英俄机器翻译的条件下,这却是一个问题。前者译为 водородный атом, 而后者则译为 еденица электрона-вольта。

(二)语法分析:前面已经谈过,英语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使用句段分析法。所谓句段分析法就是:以句中一些关键词(名词、动词等)为中心,根据一定特征(词类等)把其周围有关的词合在一起,形成为句段。例如,名词句段有以下一些类型:

1. Art + Adv + A<sub>1</sub> + ... + A<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 N<sub>1</sub> + ... + A<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2. Adv + A<sub>1</sub> + ... + A<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 N<sub>1</sub> + ... + N<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3. A<sub>1</sub> + ... + A<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 N<sub>1</sub> + ... + N<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4. A + Art + Adv + A<sub>1</sub> + ... + A<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 N<sub>1</sub> + ... + N<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5. N<sub>1</sub> + ... + N<sub>m</sub> (或再加同等成分)

[以上各类型中所列的成分是可能出现的,不见得都一齐出现。例如,第一类型中最常出现的是 the man 或 the wise man, 等等]

名词句段前如有前置词,①则和前置词合在一起,构成前置词句段。无前置词的名词句段根据其位置或其他条件得到句法特征。

(三)汉文综合问题:英语词序和汉语词序除了定

① 英语前置词也和俄语前置词一样,在确定其词汇意义时,也确定了其句法作用。

語、狀語和副句以外，基本上是相同的：主語十謂語十賓語；主語十謂語十補語。因此，我們主要是調整定語（后置的）、狀語和某些副句的次序。英譯漢的調整詞序的綫路圖也和俄譯漢的調整詞序的綫路圖相同，也是先對各分句中的句子成分（定語、狀語等）加工，然后再對副句加工。

上面已經提到，制定英漢調整詞序綫路圖的原則和方法，基本上和俄漢調整詞序綫路圖的相同，這裡不再重述。

最后，举个例子說明英漢機器翻譯的過程：

<sup>1</sup> The	<sup>2</sup> operation	<sup>3</sup> of	<sup>4</sup> nuclear	<sup>5</sup> reactor
(art.)	(N)	(prep.)	(A)	(N)
“O”	（工作）	“O”引定。	“核”	“反应堆”
<sup>6</sup> depends	<sup>7</sup> on	<sup>8</sup> various	<sup>9</sup> types	
(V)	(prep.)	(A)	(N)	
“取决”	“于”引宾	“各种”	“类型”	
<sup>10</sup> of	<sup>11</sup> interaction	<sup>12</sup> of	<sup>13</sup> neutrons	

(prep.)	(N)	(prep.)	(N)
“的”引定。	“相互作用”	“O”引定。	“中子”

<sup>14</sup> with	<sup>15</sup> atomic	<sup>16</sup> nuclei.	<sup>17</sup> .
--------------------	----------------------	-----------------------	-----------------

(prep.)	(A)	(N)
---------	-----	-----

“与”引定。	“原子”	“核”
--------	------	-----

分析結果：	7+8+9=賓語
-------	----------

1+2=主語	10+11=定語。
--------	-----------

3+4+5=定語。	12+13=定語。
-----------	-----------

6=謂	14+15+16=定語。
-----	--------------

綜合結果：定語 2 移至前一成分前并加“的”字；如其后有定 5，則先加起來然后再前移。其他都不動。于是得到，(3+4+5)+“的”+(1+2) 6+(7+8+9)+10+12+13+14+15+16+“的”+11+17。  
[核反应堆的工作取决于各种类型的中子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

当然，英漢機器翻譯中的問題并不都是这样簡單。这方面有不少問題还需要研究。

##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研究工作近况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員，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集中了全所主要的研究力量，正在积极編写《中国少数民族語言簡志》、《中国少数民族語言概况》、《漢語在少数民族語言丰富发展中的作用》論文集、各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报告和《新詞术语詞典》等著作。

在《中国少数民族語言簡志》里介紹了三十八个民族的語言，这是一部約 150 万字的巨著。通过这部著作，讀者可以了解这些民族語言的語音、語法、詞汇的特征，方言土語的基本特点，語言使用情况和文字情况以及各种語言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这部著作的各部分都已經在各語言組完稿，大部分語言簡志已經送出版社付印，其中苗瑶語族部分即可出版，这是少数民族語言所向偉大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中国少数民族語言概况》是一部通俗性的著作，它簡要地介紹了四十八个民族的語言。現在已經基本上完稿。《漢語在少数民族語言丰富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是研究漢語和少数民族語言的关系，通过对具体語言事实的分析，闡明漢語在各少数民族語言丰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大影响和这些影响的規律，从而进一步地說明我国各民族語言中共同成分的不断增長是符合社会主义各民族共同成分日益增多的客观发展規律的。这部論文集中已有十几个民族語言完成初稿。少数民族語言調查报告是在大量的口語材料的基础上，全面而系統地分析語言結構和方言土語情况，由于各个語言的发展情况和工作需要不同，各种語言調查报告都有自

己的重点。語言調查报告大部分正在分头編写，其中《布依語調查报告》和《广西瑶語調查报告》已經編写完成，《蒙古語調查报告》已經完成初稿。这些著作既是几年来少数民族語言調查研究的初步总结，也是今后深入开展少数民族語言和語言理論研究的基本資料。《新詞术语詞典》主要是帮助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在政治和文化学习中正确理解常用新詞术语的含义的。在 10 月底以前就可以完成二千个詞条的注釋工作。

这些著作的編写，不仅都是在具备了相当充足的实际語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持走群众路綫，貫徹了專家和群众相結合的工作方法。从拟訂編写提綱、分析具体的語言問題、編写、修改，直到审查校对工作，都是反复地通过集体討論來完成的。这样做，不但發揮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而且保證了工作的質量和数量；同时这种工作方法使得同志們的业务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尤其是初級研究人員，在业务上都得到了实际的鍛煉。在工作中除了参加工作的同志們都發揮了革命干劲外，特別要提到的是得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有关省（区）的語文研究机构及其他有关單位的有力支援和合作。最近通过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同志們的革命干劲更足了。他們表示，一定要繼續遵循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反右傾、鼓干劲，为不断地实现民族語文工作的大跃进而奋勇前进。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学术秘書室）



# 試談開國十年以來藝術語言的發展和問題<sup>\*</sup>

吳曉鈴

在前些時候，中國語文社送來一分提綱，說是要組織筆談，叫我也參加進來，談一談開國以來藝術語言的發展情況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事兒：我不是表演藝術家，又不是地道的語言工作者，實在說不出什麼來，想要繳張白卷了事。最近，在九月號的《中國語文》上讀到了馬連良同志的《談談傳統戲曲中的用詞問題》、吳青同志的《應該重視電影語言技巧的繼續提高》、老舍同志的《土話與普通話》和白鳳鳴同志的《讓曲藝語言在推廣普通話中起橋樑作用》等四篇文章，各從京劇、電影、文學創作和曲藝表演的角度談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問題，對我很有自發作用。就在讀到九月號《中國語文》的同時，又從《中國語文》的編輯同志的手里讀到了馬少波同志和侯寶林同志的文章的原稿，（因為我是十月分《中國語文》的“值月編委”）不禁想到許多事情，覺得還不是沒有話可說：那麼，且不管它有沒有系統，我就把它說出來吧。

正如馬連良同志在《談談傳統戲曲中的用詞問題》里①所說：“應當肯定地說，自從開國以來，我們的傳統戲曲在使用語言上已有了較前大不相同的變化。”這裡的“傳統戲曲”可以用“曲藝”“話劇”“電影”和“歌曲”任何一項來替代，都能符合事實的真相。這就是說，在解放後，各種藝術形式的語言都發生了較前大不相同的變化，也就是，有了迅速而顯著的發展和提高。

為什麼自從開國以來，我們的各種藝術形式的語言都發生了較前大不相同的變化呢？原因非常清楚，也非常簡單：我們的黨和政府是十分重視祖國語言的使用問題的。遠在1951年的6月6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來闡述正確使用祖國語言的重要性，它重重地指出：“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現思想，在今天，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用正確的語言來表現思想，使思想為群眾所正確地掌握，才能產生正確的物質的力量。”②在這裡，社論科學而辯證地說明了語言的社會性作用，從而使人理解到容許不純潔、不健康的語言混亂現象的繼續存在，不但是對於祖國的語言的一種不可容忍的破壞，

更嚴重的是，在政治上對於人民利益的損害。把祖國語言的使用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這是舊中國時代從來所沒有過的事情。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來，從事舞台表演藝術的人們對於這個响亮而嚴肅的號召是如何的興奮，並且感覺到應該承擔起來的責任的重要。在這種政治責任感的鼓舞和推動之下，各種藝術形式的語言都發生了較前大不相同的變化。到了1955年，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的政治鬥爭，更加具體地以“推廣普通話和促進漢語規範化”的要求推向了再高一級的新的歷史階段。應該說，這都是非常自然的現象。因為，在這四年之間，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工作成績是卓著的。總的方面姑且不談，談起來話長；其中，必需指出，各種不同形式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做了不少的有益的工作，起了不少的良好作用。關於這個，1955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報》在《為促進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里就曾經做出了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說明，並且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電台廣播員、電影和話劇演員，他們也都是語言規範的宣傳家，每天有無數的觀眾和聽眾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在向他們學習。他們在普通話的推廣上，過去已經有過很大的功勞，今後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推廣普通話的情況下，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須加強自己的語言的規範性。”③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在1955年10月召開之後到現在為止，整整又是四年的光景，我們看見了表演藝術工作者沒有辜負黨和政府的殷切希望，比前一個階段更加目的性明確地作了許多不懈的努力；而且，我們也親切

\* 這裡所說的“藝術語言”實際並不包括一般所謂“藝術語言”的全部含義，它只是指着“語言技巧”里的語音等基礎問題談的，並不包括“藝術朗讀”部分。寫成之後，余意未盡，容另為文談談生活語言和藝術語言的關係、傳統戲曲語言的發展程序及內容等問題。

① 《中國語文》，1959年9月號，418頁。

② 引自《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255—259頁，1956年7月，科學出版社。

③ 引自《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259—263頁，1956年7月，科學出版社。

地看見了在若干实际而具体的事实中所做出的貢獻。如果說,在某些專門性或技術性的問題上,大家的理解或看法以至於行動還多少存在着分歧,甚或是矛盾,那也不足為奇。那正是在藝術語言的變化和發展的道路上所必然產生的正常現象,矛盾的不斷產生和逐漸得到統一說明了我們的藝術語言在短短的十年間提高的速度和程度是使人為之振奮的。在短短的十年間,藝術語言取得這樣的成就,首先要歸功於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

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之下,各有關方面和機構的積極響應和採取具體措施,就有效地保證了取得現在的勝利成果的可能性。舉例來說:國內培養話劇工作者的最高教育機構中央戲劇學院,在1953年剛剛開始了五年制正規化教學制度之後不到一年的時候,就同時在一年級、導演幹部訓練班和表演幹部訓練班的課程表上增加了向所未有的,而且比重很大的必修課程“台詞”(歐陽予倩同志在這個課程的建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兩個訓練班的学生絕大多數都是國內話劇團體的優秀導演和演員,其中包括人民群眾所熟知的歐陽山尊、耿震、于藍、田華諸同志,他們在回到本單位之後,都把在“台詞”課上學到的東西在導演和表演工作中進行了實踐,並且有意識地起了帶動作用,影響了更多的人,象散播出去的種子,普遍地在話劇的園地里萌芽滋長,已經得到了豐盛的收穫。同時,正規學習過“台詞”課的話劇學生,截至目前為止,有三個班次都畢業了,並且被分配到祖國各地的劇團里工作。這一批新生力量——裝備精良、又紅又專的新生力量的成長和扎根在廣闊肥沃的土壤里,毫無疑問,是會完成提高話劇語言的光榮任務的。另外,除了各有關方面和機構的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並且採取相應的具體措施之外,還有一個極為可喜的現象的產生,那就是“土洋並舉”的兩條腿走路的大協作的開始。舉例來說:語言研究工作者和話劇工作者掛上了鉤子,就我的狹窄的了解範圍所及,只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來說,不單派出了幹部參加中央戲劇學院的“台詞”教學工作,而且和在北京的許多話劇團體,如青年藝術劇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軍委總政治部文工團的話劇團和公安軍話劇團,都發生了聯繫,為演員們做了“語音鑑定”,下排演場排戲,或者是制訂出來練習台詞的計劃。另外的例子是,許多話劇團體聘請了戲曲或曲藝演員教授傳統的送字歸音等練聲的方法。同時,戲曲或曲藝演員也和語言工作者建立起業務上的關係,侯寶林同志在本期發表的一篇文章里說到的“半師半友”,正是說明了這種同志式的協作關

系的緊密情況。這樣,一方面,理論指導實踐,在實踐過程中又豐富了理論,這樣相互為用,彼此都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傳統的方法和新的科學方法有了碰頭的機會,截長取短,推波助瀾,這樣相互為用,彼此也都得到了提高。以上提到的兩種新的情況的產生,就使藝術語言改變為一個全新的精神面貌,這是在開國以前的政治條件和社會組織下所不能想象的。

那麼,在各有關方面採取具體措施和互相協作的情况之下,究竟我們的藝術語言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就呢?

我只能在這里談一談我個人的不夠成熟的看法。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情況相當錯綜複雜,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但是,如果必需先從总的情况方面做一個概括的說明,那麼,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都好,很有成就,都提高得相當迅速。這里可以拿電影語言做一個說明:從前的相聲段子裡有一段叫做“學電影”的,它的内容完全是拿電影語言做“抖擻包袱”的笑料,真是千奇百怪,盡非人間之音。雖然相聲這種形式不掉慣於使用擴大缺點的誇張手法,但是,我們終究不能否認它還是反映了不少的真實情况的。盡管在開國之前有些進步的電影工作者注意到了電影語言的問題,然而成績並不很顯著,一種定型化的“舞台腔”始終沒有能夠清除淨盡。從前兩年我們重映的優秀影片《桃李劫》里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現象。在開國初期製的一些影片里還或多或少地遺留着“舞台腔”的遺迹,但是我們也看得出來電影工作者已經是有意識地在改正舊的缺點,例如,對話都很緩慢,(這可能是由謹慎,然而,緩慢本身實際就是一種缺點,它甚至於能夠影響電影的故事內容,破壞情緒和氣氛。)這在《華女兒》里就表現得相當突出。不過,問題還是不少,方音(特別是東北方言)色彩濃厚,有時候方言雜沓,頓、間歇、強調、重音和語氣使用得不恰當,等等,都在着。拿近幾年來出品的任何一部影片來和開國初的影片比較,單就語言方面來說,真是相差不可以道計,無煩一一例舉。吳青同志在她的《應該重視電影語言技巧的繼續提高》里,對於電影工作者提出了一些高的新的要求,然而她却不能說“隨着普通話的推廣,漢語規範化的要求,我們的電影語言和話劇語言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了。”<sup>①</sup>因為,這是彰彰在人目的事實。

各種藝術形式的語言全都提高得相當迅速,這是事實。如果再個別地進行一下排比,那麼,似乎我們

① 《中國語文》,1959年9月號,頁419。



由說明，以北方曲藝形式為主的曲藝和話劇在使用  
音方面的成績是相當顯著的。先來談一談曲藝吧。  
如侯寶林同志在本期發表的文章所談的，曲藝的“先  
足實，也就是，以北方曲藝形式來說，它基本上是用  
京話打的底子。我們不要被什麼“奉調”、“西河”、  
“樂亭”等等地域性的名詞冠語所蒙哄，實際這都早已  
離了北京話，所謂不同之處，只是樂調聲腔而已，其  
他，就連“河南墜子”和“山東快書”之類的形式，也不過  
帶方音成分，有些象在炒菜時攪點兒味精，提提味  
似的。這倒不是目的在於專供北京市民欣賞，而是  
為了使聽眾範圍擴大到全國各地。很明顯，在南方流  
行的“評彈”不是也有了使用普通話來說唱了嗎？這是  
一條正確的道路。用北京話打底子的曲藝形式在規範  
的道路上行駛的時候，標準音不成問題，它所拋棄  
的只不過是方言詞，這個包袱不算沉重，容易丟掉，丟  
了有利而無損。這大約就是“先天”足實的意思。然  
而，“先天”足實也要“後天”保養得好，應該指出，曲  
藝工作者在這方面是做了不少的事情的。象中央廣播  
電台說唱團把馬季同志派到科學院去學習語音，侯寶  
林同志創作相聲段子去問羅常培先生要資料，這都并  
不簡單。更加值得表揚的是，他們都自願做推行普通  
話的宣傳員，許多節目的內容就是宣傳的內容，如《普  
通話與方言》、《詞匯學》和一些繞口令以及通篇使用卷  
舌韻的段子之類。至於話劇呢，那就更加看得出話  
劇工作者的努力程度。中央戲劇學院及其分院建立  
“台詞”課程是一樁極其重要的措施，目前已經落  
實，收了成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曾經舉行過“學習普  
通話”的運動，並且把演員的語言學習成績列為年終鑑  
定的一個項目。青年藝術劇院有專職的語言教師，這  
名教師同時也就是每個劇本在排練過程中的語言顧  
問。據我的很不完整的了解，甘肅的鐵路話劇團曾經  
里迢迢地派出幹部到北京來學習，哈爾濱話劇院把  
台詞課作為大破技術關的第一個階段，這都是使人聽  
為之高興的消息。同時，話劇工作者（以導演和演員  
為主）對於劇本進行一些必要的語言加工工作也是值  
得提出來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龍須溝》演出本和  
青年藝術劇院的《沙恭達羅》演出本都在老舍同志的原  
稿和季羨林同志原譯的基礎上做了必要的語言加工，  
這就把戲的身分托得更高，演出的效果更好。

在曲藝和話劇之外，電影語言的提高也是顯著的，  
前面已經談到，這兒就不多講了。如果需要我们提出  
來的話，那麼，我們向老一輩演員的要求就比年青  
一代演員的要求迫切一些，完全有必要趕上前去。但  
是，我們的要求並不太高，希望首先掌握標準音，然後

再說別的。

聲樂方面，我們的了解太少。聽說全國聲樂會議  
曾把語言問題列到日程表上，當時我由於某些原因沒  
有參加會議，現在回想起來還很後悔。我覺得有些作  
詞者和作曲者的協作似乎不夠緊密，有的歌曲唱起來  
就“倒字兒”。隨便舉個例子來說，我記得歌劇《小二黑  
結婚》裡有個“羊上圈”聽起來總象是“羊上捐”，因為，  
“圈”是個降調（去聲），作曲的人要在这儿“擡高”，于  
是就唱成高平調（陰平）了，聽的人很容易誤會詞義。當  
然，還是好的占多數，象“勝利歌聲多麼響亮”的譜子  
就制得精到，唱出來氣勢雄厚，“响”字的調值214  
能夠唱得十分飽滿。所以，我認為“倒字兒”的問題  
是在作詞者和作曲者的協作不夠緊密，而不是對於  
語言問題不重視的原因也就在這裏。這個問題容易  
解決。

比較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是傳統戲曲的語言問題。  
單就京劇來講，大家的看法就很參差。其實，在傳統戲  
曲里京劇的語言問題還是比較容易解決的，而且，就京  
劇語言的自然發展情形來看，在語音方面向普通話標  
准音靠攏的趨勢很明顯。根據語言學的观点來看，現  
在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就語音方面說京劇如何來源  
於徽調或漢調的話，因為實際上已經找不出真正方音  
被保留下來的痕迹。況且京劇吸收許多地方戲的有益  
成分做為滋養，不同的方音自然會由分歧和對抗逐漸  
走向統一和融合。我們在這裏只拿所謂“中州韻”和  
“尖團字”做個例子來說吧。“中州韻”這個術語的含  
義就不夠明確，恐怕很不容易請一位京劇演員來坐實  
它到底是個什麼具體的方音系統。“尖團字”在北京  
音系里早已消失，北京的人在生活語言里是不分尖團  
的，因此，要北京的人學習京劇又區別尖團，這就很  
不現實；所以，我們在京劇里聽到的尖團字是一天比  
一天少，是二者混淆。如果拿本《國音正考》來做為  
標準衡量，這個標準並不高，恐怕大多數京劇演員  
都得不到三分。這兒可以舉一個很有趣味的例子：  
語言研究所曾經轉錄過郝壽臣老先生的《青梅煮酒  
論英雄》的音檔，據說念白遵依中州，尖團分明。  
但是通過實驗語音學專家用簡單的語音實驗方法  
進行分析，竟沒有找到尖字。這個情況並不能說明  
郝老先生的“話白”不地道，（大家都知道他在念  
白上是具有特殊的成就的）而是一般在京劇舞台  
上的所謂“尖團字”大都是些假象，並不等於方  
言里尖團字音的讀法，而且就連這些所謂“尖團  
音”的分別現象還在日見減少。那麼，直截了當  
地用標準音讀出，豈不也是一個順乎自然的辦法？  
所以，我個人這個問題上還是同意李少春同志在  
《京劇界應以實

实际行动来拥护汉语规范化》<sup>①</sup>和《京剧字韵不能逐步采用北京音吗》<sup>②</sup>里的意见。我并且注意到,他的确还是在实际行动中体现他的主张,举例来说:他在《白毛女》里不但不用“尖团”和“上口”,而且连儿化韵都用在唱词和念白里,和他同台的许多演员(如袁世海同志和杜近芳同志)也都采取了同一的步调。最近看到他在梅兰芳同志的《穆桂英挂帅》里扮演寇准,把“世界”的“界”字就讀成 jiè,观众的反应很好,我曾经向不只一个人了解过。因此,有不少的人循着京剧语音向普通话标准音靠拢的轨迹,在演出实践方面推波助澜的情况就成为在开国以来推动京剧语言发展工作方面的一个可喜的成就。

谈到地方戏的语言问题就比京剧复杂得多了。这里让我们根据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谈谈。

田汉同志在《送“关汉卿”访朝》<sup>③</sup>里有一段话接触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粤剧《关汉卿》的演出为了争取普遍理解,用了字幕说明。这是很必要的,到朝鲜演出恐怕还得使用这一武器,因为让观众看懂是艺术成功的首要条件。

在演出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幻灯打出的对话过于“普通话化”了,广东话的味道甚少,是不是可以更地方话化一些?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粤语《关汉卿》有两种道路,一种是象省粤剧剧团这样大体上用广东语音念普通话;一种是把普通话的台词更广东话化。据说前者艺术风格较高,而一般听众却感到一些隔阂,他们说这样的对话既减弱广东话的特色;也不是一种好的普通话。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情况,但完全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我把这情况跟欧阳予倩同志谈过,他同意我的看法,我曾向剧团提建议,字幕还是用普通话,为了人家好懂,念白却要尽量用适当的广东方言。如关忠对汉卿说:“天都快亮了”。广东人不这样说,还是说“快天光哪”为好。

听说目前广东戏剧界提倡一种“过渡语”,就是由方言向普通话逐渐过渡。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不敢妄发议论。但我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要求长期不懈的努力,不要过于急躁。周总理在去年1月10日关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曾说:“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或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这在地方戏问题上尤其如此。如同方言会长期存在一样,地方戏也会长期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在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这几年地方戏的改进成绩很大。地方戏的好处和特点跟方言是分不开的。我们既不能过度强调方言特点,坚持方言之间的隔阂状态,也不要为了大力提倡普通话采取过早地抹煞方言的措施。我们既要大力推广普通话,也要学习方言,甚至充分发挥方言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要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

总的讲来,田汉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还需要仔细研究,慎重考虑,分别对待。仔细研究的是

不同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差别;是绝对相排斥的,还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可能。这就可以就语音、语法和各个方面去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得出其相应或相应的规律。譬如说,不同方言之间的基本词汇的问题就很重要。慎重考虑的是根据仔细研究的结论考虑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步骤、速度和时间。说,是采取“过渡语”的方式呢,还是田汉同志举出另外两种方式。分别对待的是,有的方言同普通话距离近,区别也小,有的方言同普通话的距离远,区别也大;那么就不能运用一种方式或程序进行戏曲语言改进工作。譬如说,粤剧和豫剧就很不相同。因此躁既不宜,笼统地一概而论也无法解决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认清的是:自从推广普通话以来,方言虽然不会立刻就消失,但是方言的活动范围越缩小则是事实,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方言逐渐衰亡的趋势并不是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要掌握住这样的一个原则,既不能在逐渐衰亡的过程中仍旧为一定地区的人民服务的方言的存在,同时也不能够扩大它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情况是,普通话在日渐普遍地学习、传播和使用则是一件好事情,它既为客观实际所需要,而且客观形势又推动它扩大它的影响,它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普通话在逐渐推广和提过程中,一定会汲取方言里的生动性与丰富性的东西做为营养,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现象来看,普通话和方言的差别是在逐渐消除的过程中,尽管时间不会很短,但是总有一天民族共同语走上居于至尊的领导地位。这是规律,我们无法抗拒它,然而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推动它。那么,回过头来看粤剧演出所采取的办法,我个人认为用广东语音念普通话的方式恐怕不只是艺术风格较高,应该说它富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至少是它这样做就能够为在“广府话”以外更多的人服务,而那些更多的人是欢迎它的这种发展的。我也不懂什么叫做“过渡语”,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语言。可是,我觉得粤剧要走的第一条道路似乎就是一种过渡的方式。当然,里也不会有人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不许粤剧团同时走第二条道路,第二条道路对于第一条道路的开拓可能会起着推动和丰富的作用。第一条道路也总有一天

① 《戏剧报》,1956年5月号,18—19页。

② 《戏剧论丛》,1957年,第4辑,207—213页。

③ 《人民日报》,1959年8月4日,第7版。



把广东方音由减少以至于消失，然而，肯定地说，却不会死掉。因为，地方戏的发展和方言的特殊性必然的联系，地方戏的特殊色彩大约主要还是表它的声腔、音乐、表现手法等方面。举例来说，川剧《秋江》能够在国内外受到欢迎，恐怕不是由于台词“啥子”所决定下来的。纵使说“啥子”之类能够表殊的艺术风格和情趣，这也不过是一个选用词汇题，不能以偏概全。值得注意的是，“啥子”之类的不是特殊的方言词，外省的人能够了解它，所以它住，无需把它一棍子打死。相反地，北京话里把又叫做“撒鸭子”，有人把它用在一段曲艺里，说是只狐狸撒了鸭子”，不只是不说北京话的人不懂，就京人也有很多人不懂，听了之后都觉得奇怪，认为

那个段子里并没有交代过狐狸偷抓鸭子的情节，怎么又凭空跑出来一只鸭子呢。“撒鸭子”可能很富于情趣吧，然而在听众面前并不能创造气氛，连交流都引不起来，虽生犹死，大可不必吝惜。

粤剧只是地方戏中的一个剧种，就语言来讲，它有特殊性，但是粤剧工作者仍旧能够摸索一条并不差的道路来，这就是成就。在将近四百个地方剧种里方言色彩浓厚象粤剧的剧种终究不多，我们用不着急躁，嫌它发展变化得太慢，因为我们纵观所趋大势，是满怀乐观的。

开国十年以来的艺术语言的发展和成就，在鼓舞着我们对于在前进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无所畏惧。

(1959年9月)

## 戏曲语言与普通話

馬少波

语言学是专门的学问，我是外行。只能就戏曲语言与汉语规范化的关系，试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戏曲语言与汉语规范化有没有关系呢？肯定地说：因为戏曲语言毕竟是中国语言；而且戏曲艺术的，是以它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来观众的，那么它用以表现生活和感染观众的重要之一——语言，就需要使人容易了解，容易接受，是易懂。汉语规范化的作用，正是为了容易了易懂。这一点，二者是一致的。因此，任何地方的语言必须作到出语明快，入耳爽然，一触即解，有味，无论是唱词或念白，都要象形象化的动作一清楚地展列于观众之前，“不劳耳鼓重思，即能贯心。”这样，才能和它的表演艺术一起收到感染观众果。反之，虽不至于损伤整体，至少也有“黄河千挟沙泥而俱下”的感觉。任何剧种的舞台语言中，杂着一些生涩的词汇或冷僻的土语。例如：我的有句土语“不藏竿儿”，究竟是那四个字，很难写来，勉强写出，人们也莫明其妙。其实，这是“不候”的意思。那末何妨就改为“一会儿”或“不大工使听者一听即懂呢？况且各种地方剧，产生在各省之中，各县各乡又各自有它的土话，有些土话流范围非常小，即使在同省的各县各乡之间，有时人往往瞠目而对，不知所云。因此，戏曲语言中一些生僻的土语，应当加以清理。

戏曲语言与汉语规范化有没有区别呢？肯定地说：存在着区别。汉语规范化推广的是普通話，普通話是一般生活中的语言；而戏曲语言却是特殊的艺术用语，是提炼加工过的，富有节奏感和音韵性的艺术语言。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戏曲艺术语言的特征、以方音为基础的唱腔和曲调，是与剧本、表演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从而展示了各个剧种的不同特色。

全国有三百七十六种戏曲，各个剧种之间，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只要差异性，不要共同性，就不可能彼此互相交流，共同发展；只要共同性，不要差异性，就必然形成千篇一律。党的方针，是大力提倡“百花齐放”，多色多采。世界上每种花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与众不同。

如上所述，各个剧种既要保持并发展它的特色，那末，在剧本、表演艺术和演出形式之外，对于那构成艺术整体的“戏曲语言”部分，应当特别注意其艺术性和方音特征。

各个地方剧的戏曲语言，其艺术性、方音特征，是与音乐性互相结合的。王世贞在《曲藻》里说过：“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这虽然只就南北曲而论，但也可以说明各种戏曲的语言特色。例如：我的家乡的古老剧种“柳子戏”，

它的曲調，是由早年流行民間的俗曲小令，如“黃鶯兒”、“山坡羊”、“打枣竿”等，與“柳子調”結合而成。所謂俗曲小令，是經過明代作家的藝術創造而流行於民間的。李開先在《市井艷詞》序中說：“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鎖南枝…雖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語意則直出肺腑，不假雕刻。”在《一笑散》中又說：“如十五國風出諸里巷婦女之口者，情詞婉曲，自非後世詩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沈德符在《野荻編》中也說過這些俗曲小令：“沁人心腑”。馮夢龍在《太霞新奏》中也說過這些俗曲小令，“其佳者語多真至”。這裡所談到的“直出肺腑，不假雕刻”和“沁人心腑”“語多真至”的語言，並不是生活中的一般語言，而是經過廣大人民和作家創造再創造，發展再發展，而逐漸形成了它的獨特風格。

任何劇種的舞台語言，都有它的文學性、音樂性和方音的特徵。甚至高元鈞的山東快書之所以生動出色，受人歡迎，也與他用山東方音是有關的；如果用京口或北京語匯來說山東快書，豈不是百味索然？至少不成其為山東快書了。

川劇的《評雪辯蹤》，劉翠屏念白里的“啥子話嘞？”“望你嘛…”“是妻嗎？就有偏了。”呂蒙正念白里的“那就變囉…”“卑人與你這樣囉！”“稀飯都倒囉！”其語法結構和方音的使用，是結合着川劇的表演，而完成了統一的艺术風格的。假若不這樣說，不這樣念，至少會損傷了川劇的風格，使人感到不夠“味兒”。還有《柳蔭記》里的媒婆，從“老身姓侯，丈夫姓丘，我家人丁八口，又不担，又不抬，全憑我這一張口，穿的是綢啥，吃的是油啊…”一直到“按倒這頭說那頭，憑着我這一張嘴，死人都要說起來跟我走，樹上的麻雀都要哄在我的手頭…我邊說邊走，為了搞錢，哎呀，不要停留啊”。這一大段敘事的念白，都組織在富有節奏性、音韻性的“尤求轍”里。假若沒有川劇語言的方音特徵，毫無疑問，就能使這一段生動精粹的語言大為減色。

粵劇《搜書院》第六幕鎮台所唱的“海南曲”，有四句唱詞是“你好比螻蛄，分明將氣斗，天時已經下晝，還不快些走。”這裡面的“螻蛄”“下晝”，都不是普通話，但為了結合曲調里的音樂性，就不能不允許保持粵語的特徵。同幕里，謝福、謝祿與鎮台謝寶的對話，用的是“口古”，也不能不把語言藝術化，如“老師，已到竹樹坡，不如讓我們歇一口”。“我已抬到氣喘喘，大汗滿頭”。“不准歇息，休多開口！走！”“大人，人心肉造，他們非是馬牛。你騎的是畜生，我用的是人力；人怎比得你只禽獸！天時未晚，何必耽憂。”必須這樣，才能合于“口古”的音樂性、節奏性，從而顯示出粵劇的特色。

楚劇《葛麻》，當葛麻聰明地用兩只茶杯暗示抗拒馬鐸的退婚，他說：“他們兩人這對姻緣，員外是想把他們拆開；從這個彩頭看，不但拆不開，還配攞了。”“攞”兩字，雖是楚地俗語，但是適當運用，便確切地配合了葛麻的表演，收到很好的藝術效果。

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祝英台所唱的“書房門一枝梅，樹上百鳥對打對，喜鵲滿樹喳喳叫，向你梁報喜來。”這四句的韻腳“梅”“對”“來”，若按京音十韻的“灰堆”“懷來”而論，顯然是不協調的。但是用越劇的方音唱出來，不但非常協調，而且聲情并茂。再如秦腔的《賣畫劈門》，白茂林所唱的“他的父作提督誰不怕，在邊庭動不動把人人來殺，那一個州縣官管他下，父女們且忍淚另想良法。”轍是合的，韻是協的，京音唱也可以唱得順溜。但是真用京音唱起來，就不如用秦腔的方音唱起來那樣的感情充沛。

滇劇里有一個曲調叫“七句半”，基本上很象京劇的“南鑼”。但是滇劇的生、旦、淨、丑，都可以唱“七句半”，而京劇里則只有“丑”和“花旦”可以唱“南鑼”（極少數的二花臉也有時用），生、淨是與之無緣的。滇劇的《打瓜招親》，鄭子明唱的“七句半”：“田邊果，瓜，你不要認錯咱偷它。丫頭何必嘴喳喳，老鄭的頭有斗犬，一拳打你叫爹媽。”不但聲正韻妥，而且合表演動作，非常自然。假若運用在京劇里，那就格格不入了。原因很簡單，滇劇的鄭子明使用方音，以唱好了這個曲調；而這個曲調，能够在生、淨兩行中大量使用，也就顯示了滇劇劇種的特色。

由此可見，各個劇種的戲曲語言，都有它自己的特徵，假如我們在戲曲語言中生硬地推行普通話，必然影響劇種的特色。其結果不是“百花齊放”，而是“千一律”了。

但在各個劇種中，京劇與漢語規範化的要求是較接近的，河北梆子、評劇、曲劇等就更接近。從推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來看，京劇的舞台語言在某些部分上很符合這一要求。當然，我們不能以京劇冠了一個“京”字，就認為京劇是北京土生土長的東西，而與“北京語音”簡單地聯繫起來。由於京劇的源，來自“徽調”“漢調”“昆曲”…，因而京劇一直存在“徽”“漢”“吳”的方音，而且這些方音已經與京劇的樂結構，水乳交融地溶在一起了。於是，在唱念藝術一定程度地表現了京劇的特色。但是從歷史的發展客觀規律來看，京劇里的方音，早已逐漸縮小，而京逐漸占了重要的位置。遠在“前三鼎甲”——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時代，張二奎就以廣采京音而成奎派，當時稱為“京腔大戲”。程長庚雖然以徽音為主



三胜虽然以湖广音为主,但其念唱之間,也或多或少  
渗入了京音。“后三鼎甲”的譚鑫培、汪桂芬、孙菊  
在湖广音与徽音的基础上,发展京音,更为明显,譚  
甚至把北京話如“不認就拉倒”,使用在《清風亭》  
由譚派蜕化而出的刘派(刘鴻升)京音更多,象他  
新黄袍》的“孤王酒醉桃花宮”,“寡人一見龙心动”,  
侍臣摆駕上九重”的“王、桃、人、臣”四个阳平  
字,一律用北京音的阳平唱,并不损伤它在音乐上的  
完整性;余派唱《洪羊洞》的“尺寸光阴”的“尺”字,念  
《檀州》里“小畜生”的“畜”字,都用京音,不“上  
声”。旦角和花臉的使用京音,比老生行更为明显。花  
臉念“得令”的“令”字,一般的都用京音。金少山唱《盜  
馬》的“找不着御馬圈今在何方”的“圈”字,“自有那  
三太与你們抵偿”的“太”字,都用的是北京音的去  
声。旦角从王瑞卿到四大名旦,使用京音,更有显著的  
发展,因而使观众觉得他們的唱念,很容易懂,容易  
受到艺术的感染。丑角有京白、韵白之分,韵白也不完  
全是湖广音,而是渗入了京音的;京白完全用北京音,  
不必說;但这种京白是根据北京話提炼加工艺术化  
了的,而不是生活中原样的北京話。为什么京剧的戏  
語言随着时代的推进,方音逐漸縮小,京音逐漸扩展  
呢?主要是因为京剧虽然有来自地方剧的淵源,但它  
竟已經成为京剧了,多少年来,以北京为中心繁荣滋  
养,从演員到观众,自然形成了它的地方特点。就如 同

在京的河北梆子演变分化为“京梆子”,和在京的“昆  
曲”演变分化为“京昆”一样,这不只是人为的,更主要  
的是它符合客观发展的規律。

但是京剧唱念艺术的特色之一,却又表現在方音  
与京音之相互結合。假若完全使用京音,彻底消除方  
音,那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京剧的特色。因为京剧在  
多少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原有的方音已經同京剧  
的音乐結構相当凝固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为有机的艺  
术整体了,簡單地改变或清除,也是不妥的。我認为京  
剧中有些方音,必要时还应慎重地細致地加以保存和  
运用。試想,使之既不妨碍观众的了解,而又保持京剧  
的唱念特色,满足观众的艺术享受,有什么不好呢?

不过,从历史的发展和舞台的实践来看,証明京剧  
語言的扩展京音,在許多前輩演員和当代演員的嘗試  
中,已經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作得好,不但不会损伤京  
剧唱念的風格,反而能使京剧唱念艺术更富有表現力,  
更加活潑生动起来。因此,在京剧中,京音的逐步扩  
展,看来已是必然的趋势;但在京剧中无条件地彻底消  
灭京音以外的方音,則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戏曲語言与普通話的关系,是一个比較复杂的問  
題,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大家在这一問題上进行  
探討,对于人民文化生活的活跃和戏曲艺术的发展,有  
重要的意义。(1959年9月)

## 大力推广普通話, 相声演員保証把勁儿加!

侯宝林

我虽然会說話(也只是会說北京話),可是文化程  
度太差。小的时候在家里只念过一本《六言杂字》;后  
来考进了当时的北京市立第二十七小学(現在的厂桥  
小学),讀了三个月就算“毕业”了,家里貧寒,得找个容  
得下飯的营生。十一岁学唱京戏,十六岁改了学相声,  
从这儿起算是注定了終身,拿“說話”做飯碗。

在学京戏的时候,就知道师傅怎么教,我怎么唱。  
不鑽研,也沒有鑽研的条件。对于戏詞里的“馬走战”、  
“帶虎豹”、“蓮花宝”和“敢莫是”等不純洁和不健康的  
所謂“官中詞”真是見怪不怪,根本就沒想到过它不通;  
但是現代人不这么說,大約古代人也不这么說;相反

地,我还觉得很順嘴,我懂得是甚么意思。我管不着它  
不合語法习惯、构詞規律,也不管观众懂不懂,不懂也  
得听着。

后来一学说相声,情况可就不同啦。观众不懂,  
“包袱儿”(笑料)摔不响,說一整天也“圓不上粘子”(聚  
集观众)。在相声的台詞里,除了有的时候引用孟老夫  
子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声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有的时候拿着“跳出  
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打打禪語,或在專为諷刺乱用文  
言的《家堂令》段子里大量使用“之、乎、者、也”以外,相  
声的主要台詞和大部分的叙述都是純粹的口語。由于

相声的内容和人民日常生活联系得异常紧密,那么所使用的语言无论是在选择词汇,或是造句方法上都得和生活语言靠拢,字字句句都得让观众听得懂,不然的话,观众就笑不了。从这儿起,我才算是注意了语言问题。可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在离开北京到别处去表演的时候,并不远,就是天津,不想不简单的問題就找我来了:演出效果不合理想。仔细一研究,原来是观众不懂,我在台詞里使用的北京方言里的土語成分太多。地方色彩濃厚應該說是一个优点吧,不过,它的局限性也就强了。这又不能不承認它是一个缺点。應該叫相声为更多的人服务,讓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别只給北京的人享受相声的特权。于是,我开始在选詞方面下工夫,万沒有想到这就算自发地推广了普通話。例如:我把“油毛窩”改成“雨鞋”,把“洋拉子”改成“玻璃瓶子”,把“薄沙吊儿”改成“水壶”。这么改动,并没有影响演出效果,观众面反倒扩大了。这样,我渐渐地接触了电影和話剧,也能够讀讀報紙了,得到不少的启发,常常在相声台詞里吸收一些新詞。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观众認為比較“文明”,有些同行的認為“相声味儿不够”。我也鬧不清到底是“文明”好,还是“相声味儿不够”不好,我还是这么干下去了,有些同行也这么干,一直到解放。

这可就是个天翻地复的变化了。在这儿且不談我的翻身之感,党的恩情无法用語言形容。單就提高业务水平里的使用語言方面來說,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我們相声演員直接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的大力协助,語言研究所為我們召开过座談会,并且动員馬季同志学习国际音标。已故的罗常培所長給我們的帮助很大,現在我那段《普通話与方言》里有許多是他老人家的主意。当时吳曉鈴先生也还在語言所,和我成了最亲近的朋友,碰到問題就去找他,真是“半师半友”。这样,在組織的支持之下,相声的台詞从开国以来就有了很大的提高。具体說来,旧日相声里的内容不健康的台詞逐漸得到修改,有的就干脆清除出去,象“造化”“走运”“全都是命哪”,等等。同时,也把“洋蠟”“洋火”“洋瓶子”等帶“洋”字詞头的詞都給“扫地出門”了。接着,就在上面所談到的改詞的基础上,进一步注意标准音問題、語法問題、使用短句問題、語言形象化問題,以至于我們提出来的新口号“語言造型”問題。可以这么說,基本上我們是向着“准确、鮮明、生动”的标准方面走的,基本上我們跳出了方言的范围,說普通話,不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地推广普通話。虽然,偶尔我們还免不了把“錯了”或“坏了”說成“砸了”,或是把“我把你”的“把”(bǎ)念成 bǎi,但是这容易糾正,

一想到我們是推广普通話的尖兵就能改了过来啦。

在現代汉語规范問題学术會議召开之后,我們相声演員更加增加了信心和勇气,我們不但要在工作推广普通話,而且还要创作并表演宣傳汉語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話的相声段子,《南腔北調》和《普通話与方言》(这个段子現在吳曉鈴先生正在帮助我做加工工作)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产生的。最近我想搞一段宣傳汉語拼音字母的段子,我在动笔之前要先动脑筋,好好地学习一番汉語拼音字母。理論得和实践結合呀!

我們誠懇地要求語言工作者多幫助我們,多指導我們,还有,多給我們任务!

一恍儿地开国就是十年了,全国在各方面的跃进情况实在使人兴奋,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就是好。單就我們这个小小的行当來說,它的变化多么大呀!單就我們这个小小的行当里的語言來說,它的变化也是多么大呀!随便举一个例子說吧,您再也听不到我們把“吃”說成“啃”(kàn)“捋”(lǔ)“开”“撮”“擰”(dén)“垫补”,甚至于“您把它‘慈悲’了吧”?这样是不是就使詞汇不丰富了,就丧失了相声的特色了,就減低了語言的表现能力呢?不,不是的。相反地,出了北京,我們在湖南、浙江、江苏、福建以至于一些兄弟民族地区都闖开了天下。

我常常这么想:十年来的相声語言似乎是在不同形式的傳統艺术里改进得較有成績,我們在推广普通話的工作上起了一点儿小作用,我們感觉到振奋。但可能有人要說:“你們有条件哪!先天的底子厚,后天又不失調。”不,不是。誠然,我們有一个較好的条件——純粹口語,沒有尖团字和上口字在里面扰着;可是,从我們所走过的曲折而艰难的道路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凡是搞語言研究的人都知道,越是距离普通話近的方言越不容易改向服从普通話,北京話的这个毛病最显著。不过,認清目标,解放思想,鼓足干劲,跟着党走,沒錯。

## 啓 事

本期稿挤,郑林曦《按詞連写問題》和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的《語言学名詞解釋》(十三)下期刊出。

本刊編輯部



# 昆曲的語言音韻

韓世昌

昆曲是拥有五百年左右历史的艺术遗产，从文学方面来看，它承襲了古歌謠、賦、詩、詞、大曲、变文、散文、駢文各种文体的結構；从音乐方面来看，它包括了宋以来的詞、大曲、唱賺、諸宮調、南北曲、民歌、外曲（兄弟民族的曲調）的曲調及唱法。多少年来在民間艺术家的丰富創造、細心揣摩，文人学者的笔墨潤色之下，不断地成長发展，并影响了許多兄弟剧种，同时在文学方面也逐漸形成一种被人重視的文体。

解放前，昆曲長时期受到旧社会的輕視冷落，只有少数文学家、爱好者作为欣赏研究的对象或資料。在这样的情况下，許多傳統剧目的表演艺术被失散、遺失了，許多身怀絕艺的老艺人因流离困頓而喪失寶貴的艺术生命，这就使得昆曲剧种長时期脱离了群众。直到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針的领导下，才得到新生和培植。作为一个剧种来講，昆曲一直保持著数百年前的艺术面貌。它在剧本文学、音乐、曲牌、表演各方面，都可以使我們了解到数百年來寶藏的形式，給戏曲文学音乐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資料；但是作为給广大群众服务的艺术，就感到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討的地方。

昆曲的剧本承襲了很多的宋元时代的方言，这点法也曾有人認為是昆曲文学的特殊風格，給以贊許，而且一直沿襲使用着。例如：

沒搗菱花偷人半面	(游园)
沒乱里春情难遣	(惊梦)
兀的不痛煞人也么哥	(哭象)
破不喇馬嵬驛舍	(彈詞)

这在几百年前是当时流行的口語，元代的偉大戏剧家关汉卿就會以在作品中大胆地运用口語，創出了戏曲的新格，为当时所推重，因而奠定了元曲的自然本色，能反映多方面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但是現在对戏曲文学的研究講授，都还需要翻資料进行考訂注釋，如果只通过舞台上的一般唱念（或有幻灯字幕），就要广大观众能理解充滿数百年前方言土語和文言字眼昆曲，当然更是有困难的。

另外在音韻方面，昆曲唱念最講求四声阴阳，但它遵循的规范是“南宗洪武”（洪武正韻），“北問中原”

（中原音韻）。不仅这两种韻書的訂立时代，已离今天有五六百年，而且在昆曲的唱念上，由于使用南北曲牌調的不同，入声字的讀音有着严格的区分。例如：

“白”	南音讀 be	北音讀 bai
“落”	南音讀 luo	北音讀 lau
“關”	南音讀 guo	北音讀 gau
“着”	南音讀 zhuo	北音讀 zhau
“黑”	南音讀 he	北音讀 hei

除此还有所謂“上口字”（無論南北曲，凡是昆曲唱念都是如此发音），如：

臉	讀作	jian
喊	讀作	xian
河	讀作	ho
知	讀作	zhi[ʒi]

如不是非常熟悉戏曲語言的現象，也会听之費解。

不可諱言，昆曲在广大群众中有“听不懂”的普遍反映，除去剧本文学的深奥典雅外，以上两点也是构成同今天观众有距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样說并不意味着要把傳統剧本剧目一律大事改动，我們知道戏曲的改革是个复杂艰巨的工作，尤其对待遗产，更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因为它牽涉着文学結構、歌唱韻、旋律、表演各方面的配合統一。但为了剧种的发展，更好地为广大群众喜爱接受，个人觉得，在改編历史剧、創作現代剧时，可以从剧本文字到作曲多考虑这两方面的問題。北方昆曲剧院在現代剧目《紅霞》的創作中，就試用了新詩的文字体裁处理唱詞，在繼承傳統四声的基础上，唱腔方面大胆地采用了普通話的音韻。在演出时也同样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解放十年来，党挽救了几近衰亡的古老剧种“昆曲”，使它得到了新生和发展，党給我們指出了“百花齐放”“两条腿走路”的方向，如何繼承发展昆曲，这个艰巨的任务應該由我們昆曲工作者自己担当起来。庆祝偉大的国庆十周年，緬怀已往，我除去感激兴奋之外，更覺得我們应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使昆曲艺术能够早日为更多的观众理解、爱好。希望語言学的專家們帮助我們，使得这古老的剧种在繼承发展道路上取得光輝的成就。（傅雪漪整理）

# 魯迅作品中色彩詞的运用

朱 泳 燄\*

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渲染音响,給讀者以听觉上的刺激;也常常描繪色彩,給讀者以视觉上的刺激。汉语中許多象声詞是渲染音响的要素;而色彩詞,則是描繪色彩的不可缺少的材料。所謂色彩詞,就是指以顏色来表示物体性状的詞。

客觀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不同的物体具有不同的色彩。有些物体彼此間色彩的區別很明显,象藍天与白云,紅花与綠叶,黑墨与黃紙,等等。有些物体彼此間的色彩虽有區別,但不很显著。同样是紅,有的是血紅,有的是紫紅,也有的是猩紅;同样是藍,有的是烏藍,有的是深藍,也有的是宝藍。作为画家來說,他假若要把客觀事物正确地反映到画紙上来,一定要調配多种的色彩,运用最适当的色彩。作为作家來說,他假若借助顏色正确地反映不同物体的不同性状,使作品增加真实感,就必须掌握大量的色彩詞,并能够运用最适当的色彩詞。

魯迅先生是我們祖国杰出的語言大师,他的文学語言具有很多特色,本文准备談談魯迅先生文学作品中运用色彩詞的情况。

## 二

魯迅先生善于准确、鮮明、生动地大量运用色彩詞,这些色彩詞加强了作品的鮮明性和形象性。

首先,魯迅先生常常运用色彩詞加强作品中景物描写的气氛。讀者讀到这些景物描写,仿佛亲临其境,眼見其物。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和真实感。例如:

- 1)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藥)
- 2) …从篷隙往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远近橫着几个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气。(故乡)
- 3) 窗外沙沙的一陣声响,許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烏油油的肥叶和血紅的花来。(在酒楼上)
- 4) 故乡的風箏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風輪

声,仰头便能看見一个淡墨色的鸞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風箏)

例1中“烏藍”这个色彩詞,确切地描繪了秋天出前一瞬間天空的情景。讀者讀到例2中“蒼黃”这个色彩詞,眼前好象呈現了一片冬天肃杀的景象;魯迅生用“蒼黃”形容深冬时候的天色,不仅十分准确,而与他当时的心情也紧紧地配合起来,造成一股悲凉气氛。例3中“烏油油”的肥叶和“血紅”的花在积雪十分鮮明,为深冬雪后的园子增添了不少活气。例向讀者展示了一幅春日的活潑的有声有色的图画,“墨”“嫩藍”两个色彩詞用得十分明朗自然。

魯迅先生除了精煉地以一两个色彩詞描写景物外,还善于运用一連串的色彩詞仔細地、多方面地描景物,渲染出作品的情調和風味。例如:

5) 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忽然閃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深藍的天空中挂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綠的西瓜,…(故乡)

6) 粉紅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条石綠色的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眯眼。天边的血紅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鉄一般的冷而白的月亮。(补天)

7)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黃袍、青牛、白口袋,着就坐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一会,已只有黃尘滾滾,什么也看不見了。(出关)

例5中,“深藍”的天空、“金黃”的圓月、“碧綠”的西瓜,配合成一幅神异、鮮明的图画,我們仿佛真的到了沿海农村的景色;作者讓我們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讀完例6,閉上眼睛想一想,“粉紅”的天空、“石綠色”的浮云、“血紅”的云彩,冷而且“白”的月亮,交映得多么艳丽生动,給我們视觉以明亮的感觉。这段文字中,魯迅先生發揮丰富的想象力,借助色彩詞描繪了上古时代天空奇丽的景致,有力地襯托《补天》全篇的神奇、幻想的情調和風味。例7里用的

\* “燄”字根据旧日反切应音 yì。——編者。



惜色彩詞，“黃”“白”“青”“灰”相映，也是一幅鮮麗畫；或者說，這是彩色影片中的一個“淡入”的

其次，确切地运用色彩詞，突出人物形象，是魯迅常用的描繪人物的方法之一。这里先举大家都熟悉《祝福》中的有关描写为例：

8) 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換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帶她進來了，頭上扎着白頭繩，烏裙，藍夾袄，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却还是紅的。

在這短短一段文字中，作者用了六個不同的色彩詞，把年輕時候的祥林嫂的外貌活生生地勾劃了出來。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魯迅先生在這里替祥林嫂拍了一張彩色的全身照片，並且把這張照片清晰地印在讀者的腦海里。又如：

9) 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土，但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象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故鄉）

舊社會里一位終年辛勤勞動，終日吹着海風的在錢上掙扎的樸實的農民，好象就站在我們眼前。黃的臉，“通紅”的眼睛，這兩個色彩詞用得多么傳神！再看下面這一段話：

10) 女孩——約十歲。紫發，烏眼珠，白地黑方格長衫。（過客）

魯迅先生一共只化了十五個字，就勾出了這位女娃外形。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個字中有四個是色彩詞，描繪了這位女孩的頭髮、眼睛和衣着，使這位《路》中的主角形象鮮明地出現在讀者面前。

魯迅先生還常常反復運用相同的色彩詞描繪人，突出人物形象。在《鑄劍》中，魯迅先生這樣描寫那助眉間尺復仇的壯士：

11) 前面的人圈子動搖了，擠進一個黑色的人來，黑須黑眼睛，瘦得如鐵。

12) 人迹絕了許久之後，忽然從城里閃出那一個黑色的人來。

13) 最先頭的一匹大狼就向黑色人撲過來。

14) “那是一個黑瘦的、乞丐似的男子。”

15) 中間夾着一個黑色人。……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須、眉、頭髮都黑；

16) 炭火也正旺，映着那黑色人變成紅黑，如鐵的燒到微紅。

在這一篇小說中，魯迅先生用“黑”做“基調”，描寫

了壯士的形象。凡是提到壯士，都稱“黑色人”，“黑色的人”，“黑瘦的、乞丐似的男子”；因為他的髮、須、眉和眼睛都黑，身體和臉容都是黑瘦的。這樣反反復復地用相同的色彩詞強調地描寫，就有助於突出這位壯士的剛強、豪壯、堅毅和不畏強暴的性格，這位為民除害的勇士的形象就深深地留在我們的印象中。

在《孤獨者》中，魯迅先生對主角魏連受形象的描寫，也採用了類似的手法。

第三，值得提一提的是，魯迅先生運用色彩詞描繪景物和人物，貫串着強烈的愛憎精神。魯迅先生總是恰當地運用色彩詞，表現了被描寫對象的性狀，同時，也常常表現了自己的態度。

魯迅先生回憶閩土時，運用色彩詞描繪了一幅神異、鮮明、美麗的農村風景，也表現了少年魯迅對農村的強烈的喜愛和嚮往。從對祥林嫂的細致的以色彩詞為主的描繪中，也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對這位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婦女的同情。又象在《傷逝》中描寫子君時這樣寫：

17) 于是就看見帶着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

“蒼白”，是作品中主角涓生對柔弱的子君的臉色、肤色的感覺，包含着涓生對子君的愛怜的心情。在這個描寫中，也滲透着魯迅先生對這位以後遭到悲慘結局的青年的怜惜的心情。

相反，當描寫那些吃人的、害人的、卑鄙的東西時，魯迅先生運用色彩詞的態度就完全不同。

在《狂人日記》中，對那些“吃人的人”，魯迅先生通過“狂人”的口這樣描寫：

18) 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

19) 他便變了臉，鉄一般青。

20) 他……滿臉都變成青色了。

21) 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厉厉的排着，這就是吃人的家伙。

對封建社會的現實，魯迅先生通過“狂人”的口加以評價：

22)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23) 屋裏面全是黑沉沉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從上面這些借助色彩詞的描寫中，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寫出了那些“吃人的人”的丑惡的形態，殘忍的本質；也暴露了封建社會、封建家庭的黑暗。

又如在《理水》中，對那位自以為是、污辱大禹為虫的“烏頭先生”，魯迅先生這樣描寫：（下轉 496 頁）

# 現代漢語中一個新的語助詞“看”

陸 儉 明

本文所要談的，是关于“試試看”“听听看”“叫一声看”“等一等看”的“看”。这个“看”，过去許多語法書上都沒有談过它，一般人还往往把它当動詞看待。有少数語法學者，也注意到了这个“看”的特殊作用，但是沒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有些語法書或文章偶尔談到它，看法也不一致。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漢語教研室編的《現代漢語》(上册)一書中，在談到連動結構時，曾舉“你試試看”<sup>①</sup>為例。很显然，編者把“試試看”中的“看”是当動詞看待的。又如林漢達在《動詞的連寫問題》<sup>②</sup>一文中，曾把“看看看”視為動詞“看”的双重迭形式。他說：“聲音重迭的動詞原來說是一個單音詞兒，為了語氣關係或為了叫听话的人听得更清楚些，就把這一個單音節重復一下，就成了兩個音節，甚至重復兩次成了三個音節……比如說，‘讓我看’，‘讓我看看’，‘讓我看看看’……”<sup>③</sup>其實漢語中根本不存在他所說的這種重迭形式。不难看出，“看看看”和“試試看”是一個格式。又如楊欣安等在談到動詞重迭式時說：“重迭動詞的后面也可以接上‘看’，這樣一來，表示‘試作’的意思更明顯。‘看’也讀輕聲。”<sup>④</sup>接着舉了兩個例子：

他還沒有想通，你再跟他談談看。(老舍)

你的腿？我看滿可以不再拄拐了，走走看，走走看吧！  
(老舍)<sup>⑤</sup>

在談到多音節動詞重迭式時又說：“多音動詞重迭起來后面也可以接上‘看’，表示試作的意義。比如：‘研究研究看’、‘商量商量看’、‘联系联系看’。”并也舉了個例子：

“究竟火車幾點鐘開？你再去打听打听看！”<sup>⑥</sup>

很显然，楊欣安等是看到了這個“看”接在動詞重迭式之后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是念輕音；但是他們沒對這個“看”作進一步論述。

這個“看”應該引起語法學者們的注意，因為1)現在這個“看”運用範圍很廣，特別在口語中，2)這個“看”實在跟“看电影”“看你怎麼辦”中的“看”有很大區別，不是同一個詞。我想在這裡談一些肤淺的認識。

## 二

先看一下這個“看”字在句子中經常所處的位置：

1)直接附在動詞重迭式的后邊。例如：

你們列位想想看，這種人出來做了官，這吏治能有起色呢？(官場現形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326頁。)

等我再去斟酌斟酌看(同上，669頁)

你看這個辦法倒不錯，咱們就这么試試看，……(英雄傳，73頁)

嬌嬌的西房要是不好騰，我先到別處找找看，……(同上，26頁)

他想到這兒來，並沒希望找到我，只是碰碰看，……  
自找到了我。(老舍短篇小說選，151頁)

這個“看”附在單音節動詞重迭式后邊，是最常見的，而附在雙音節動詞重迭式后邊的情況比較少。

2)直接附在單音節動詞另一種重迭式(如“想想”)的后邊。這種情況也較常見。例如：

此刻不過亥正，恐怕桑家姊妹還沒有睡呢，去請看看。(老殘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94頁。)

滿喜和大年都要報名入社，袁丁末也沒有說不，只是說等一等看，……(三里灣，134頁)

3)附在動補結構的后邊。情況又有二：

(1)補語是個數量詞詞組(數詞為“一”，或動詞“几”)，動詞本身不重迭。例如：

我們姑且到那邊第三家去問一聲看。(官場現形記，673頁)

待我叫一聲看。(《小劇本》雜誌，1959年第1期，1頁)

先讓他做幾天看。

(2)補語是趨向補語，動詞本身也不重迭。例如：

這件事倒要講起來看。(官場現形記，411頁)

這個還要碰壁起來看。(同上，1000頁)

你不妨先把它壓下去看。

4)附在動賓結構后邊。情況也有二：

(1)前面動詞是個重迭式，賓語則只是一個名詞。例如：

① 見該書201頁(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③ 見《漢語的詞兒和拼写法》(第一集)，中華書局，114頁。

④⑤⑥ 見楊欣安等編：《現代漢語》第三冊，重慶人民出版社，78頁、79頁。



支部書記你來評理看。(《雨花》雜誌, 1959年第10期, 5頁)

大家再動動腦筋看。(同上, 第5期, 3頁)

那我来替你找找毛病看。(同上, 第12期, 9頁)

还是問問嫂嫂看。(《小劇本》雜誌, 1959年第5期, 13頁)

(2) 前面動詞並不重迭, 而賓語有時是比較複雜例如:

一病倒尚有三分治得, 吃了我这藥看, …(《紅樓夢》,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版, 106頁。)

你不要只是百般的說人家, 叫你寫一篇看。

先給他吃一劑藥看。

这个“看”在句子中的运用情况大致如此。对于这种“看”具有的特点, 可以从意义和形式两方面来看。

首先从意义上来看。这个“看”已沒有实在的詞义了, 而只具有語法意义。这种語法意义主要的是

一种試探語气, 使前面動詞有試作意思。这也有情况: 一种是, 如沒有这个“看”, 句中動詞的試作

也有, 但加了以后, 这种試作意思更鮮明。凡句中動詞重迭, 或在動詞前有表示試作的“不妨”“姑且”等

成分的, 大致都屬此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 句動詞本身不含有試作意思, 加了“看”以后, 才使動詞

鮮明的試作意思。凡句中動詞不重迭, 或動詞前有表示試作意义的“不妨”“姑且”之类的修飾成分

則大致都屬这种情况。

这个“看”一般常出現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特別第二人称)的句子里, 可以說不直接用在主語为第三

的句子里, 除非在兼語式里(全句主語并不是第三人称)。例如:

叫他試試看。(《官場現形記》, 440頁)

我叫他去問聲看。(《老殘遊記》, 94頁。)

你叫他在我眼前擺擺看。(《萌芽》雜誌, 1959年第5期, 7頁)

当主語是第一人称, 則表示主語将要試試某种行动。如果“看”是安在“想”“考虑”这类動詞的重迭或以此种動詞为主要動詞的动宾、动补結構的后半, 則又往往表示說話人对某件事情或某个問題不能立即进行或作出决定或答复, 要求先讓考虑一下的意思。例如:

如今这笔錢到底是捐在那月善堂里, 我們倒要查查看。(《官場現形記》, 802頁) (能否查出則說話人当时是不知道的。)

“啊, 等等,” 尤老二进了里屋, “我想想看”。(《老舍短篇小说选》, 55頁)——(尤老二一时不能答复, 要求听話人容他先思考一下。)

如果主語是第二人称, 可以分三种情况來說:

1) 說話人自己对某个事情或某种行动所引起的結果是心中有数, 但对听話人來說不一定已經明白, 或不一定相信, 因此說話人要叫听話人去試行某种行为、动作或作某种思考, 以使听話人明了, 相信。例如:

这点黃陂肉, 你們尝尝看。(《小劇本》雜誌, 1959年第3期, 15頁)

你去拔拔看, 一天拔下来, 手上都是泡, 有时还要出血, …(《劇本》雜誌, 1959年第6期, 42頁)

想想看, 农业站沒有自己的大田, 連一块試驗地也沒有, 凭什么去指导人家?(《我們播种爱情》, 57頁)

2) 說話人不了解或怀疑听話人会有什么本領、技能, 或能怎么行动, 因此叫听話人試行一下給他看看; 或者說話人对某种情况, 某个問題不清楚, 而听話人可能是明了的, 因此要求听話人給他講講。例如:

什么規矩? 怎么我不曉得? 你倒說說看!(《官場現形記》, 756頁)

你說說看, 为什么張宝玉和大胖三在你家里, 半夜三更打起架来?(《新儿女英雄傳》, 42頁)

你会騎自行車? 你騎給我看看看。

3) 对于某种情况、某个事情或問題, 說話人和听話人都是不清楚的, 因此說話人要求听話人去試行一下。至于試行的結果如何, 則彼此在事先都未能肯定。例如:

范某人到这里, 一定有什么話說, 你們二人姑且过去听听看。(《官場現形記》, 823頁)

你們姑且去查查看, …(同上, 840頁)

你算算一共要几多錢? 你算算看。(《老舍短篇小说选》, 40頁)

从意义上看, 这个“看”已不同于動詞“看”了, 它的意义已經虛化, 只表示一种試作的語法意义。从形式上来看, 这个“看”在形式上有下列几个特点:

1) 在这个“看”前面不能加修飾語; 在其后也不能帶賓語、补語, 或帶上表示動詞“体”的“了”“着”之类的东西。

2) 在这个“看”之后, 一定有語音上的停頓, 而且往往在句尾的停頓。在这个“看”后也有時可能會出現其他語助詞(如“吧”“嗎”), 但除此以外, 就沒有其他詞能安在它的后边了。

3) 这个“看”在語音上的特点是讀輕聲。動詞“看”是讀去聲(kàn)的。

4) 这个“看”並不只能附在重迭動詞的后边, 而且可以附在动补結構, 动宾結構的后边。

根据上述情况, 这个“看”不再是動詞了。它同動詞“看”不但在意义上有所区别, 更重要的在形式上也大有不同。这个“看”已經是一个同“呢”“嗎”“吧”等意态語助詞性質一样的語助詞了。

### 三

这个新的語助詞“看”，并不是憑空突然出現的，而是与動詞“看”有密切联系的。可以这样說，它是从動詞“看”变化来的。

比如說：“他還沒想通，你再跟他談談看。”“我不騙你，这很好吃，不信你尝一下看。”如果我們把这两句中的“看”去掉，改成：“他還沒想通，你再跟他談談，看怎么样。”“我不騙你，这很好吃，不信你尝一下，看味道如何。”这样原句所含有的試探語气，在改后的句子中还是存在。由此不难看出，語气詞“看”与“看怎么样”和“看味道如何”中的動詞“看”的密切关系，特別在意义上。我們还可以看一下这样的句子：

等我再叫他两声，看是如何。（《西遊記》，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914頁。）

你老不信，試試我的話，看灵不灵？（《老殘游記》，32頁）

我們完全可以把上面举的两个例句改成：

等我再叫他两声看。

你老不信，試試我的話看？

而原句的基本意思，可以說是基本上表达出来了。总之，我們可以肯定語助詞“看”是由動詞“看”虛化来的。

現在还有两个問題要考虑一下，那就是：这个語助詞“看”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发展来的？由于我知識淺薄，特別是漢語史知識的缺乏，因此在这儿不可能作出使人滿意的答复。在这里我只是提供一些不完全的情况，順帶談一些看法。

如往上推，則最早是在唐代变文中，就看到这个語助詞“看”了。例如：

相公曰：“身上有何伎艺？消得五百貫錢。至甚不多，略說身上伎艺看。”（《敦煌变文集》[上卷]，176頁）

何者名为四声十类，及三等之人耳，与我子細說看，…（同上，182頁）

佛是誰家种族？先代有沒家門？学道諸裏何人？在身有何道德？不須隱匿，且實說看。（同上，377頁）

不过在整个敦煌变文（根据《敦煌变文集》）中，只找到这几个句子。在后来的北宋《景德傳灯录》中，則这个語助詞“看”出現有三十次之多。例如：

师問僧：“汝在招庆有什么异聞底事，試举看？”（卷二十一，“漳州罗汉院桂琛禪師”，5頁）

师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卷九，“潭州潯山灵祐禪師”，14頁）

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头带角；有人嫌弄，則不值一文錢。此事为什么毀譽不同？請試拈出看。”（卷十八，“福州长生山皎然禪師”，46頁）

在《景德傳灯录》中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用語助詞“看”

以外，还在動詞前加一个“試”，而動詞都不重迭后，在明初的《三国演义》中沒有看到这个語助詞“看”而在《水滸》中有，例如：

他敢和我試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水滸》，頁）

只見洪教头先起身道：“来，来，来！和你使一棒看。”（同上，111頁）

在《西遊記》中，則这个語助詞出現的次数很多，初算在30次以上，而且形式也多，不过最多的情况在單音节動詞重迭式的后边。例如：

公公道：“你年几岁了？”行者道：“你猜看！”（《西遊記》，844頁）

且休忙，等我尝尝看。（同上，447頁）

你都站开，等我再叫他变一变看。（同上，30頁）

拿过葫蘆来，等我装装天，也試演試演看。（同上，頁）

噫！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声看。（同上，88頁）

在后来的《紅樓夢》中，則只看到这样两个例句：

病倒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这藥看，…（《出處見前》）

待我用藥看。（同上）\*

在以后的《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等晚清小說中，这个語助詞出現得很多。

根据上面所列举的情况，我有以下三点看法：首先我們大概可以肯定，这个語助詞“看”从唐代开始便逐漸在口語中。在唐代变文中和北宋的《景德傳灯录》中出現的語助詞“看”，動詞的性質还是表示試作的語气还是很弱，所以在《景德傳灯录》中表示鮮明的試探語气的，还在動詞前加个“試”。从《水滸》以后，可以說是这个“看”是个道地的語助詞了。在《西遊記》、《水滸》、《西遊記》都是用当时口語的，或者口語成分很重，这一点可以說明这个“看”是口語中（从唐代开始）逐漸形成的。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中看不到这个語助詞“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上面所談的情况看，这一語法現象是在南方話中逐漸发展起来的。唐代变文后来是用的吳語。《景德傳灯录》的語言較杂。《水滸》、《西遊記》上去是用的苏北官話，《紅樓夢》是用的当时比較純的文学語言（基本上是今天的北京話）。但在其他方言中也有这一現象，特別是吳方言用得普遍。（如《官場現形記》中的吳方言成分很多，《九尾龟》基本上是吳方言，語助詞“看”也用了不少）。一种語言現象在同一語言的不同方言中同时产生，这也是可能的。

\* 編者按：脂硯齋庚辰本《紅樓夢》的这两个例句者所据的新印本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尤其是其二例，庚辰本“待用藥看看”。这种重迭用法本文未談到，对这个問題要要的。



# 昌黎話的几个語法特点

——从《昌黎方言志》中摘出的一段——

1959年春天，河北省昌黎县志編纂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組合作，对于昌黎县的方言做了一番調查，7月初写成《昌黎方言志》。本文是書中第叁章《昌黎方言的特点》的一部分。全書已交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排印中。

## (一) 動詞“沒”字和副詞“沒”字

普通話里“沒”字是動詞又是副詞。動詞“沒”相當于“无”字。例如：“沒書（无書），沒人（无）”。副詞“沒”字相當于“未”字。例如：“沒說（未說），沒去（未去）”。動詞“沒”字跟副詞“沒”北京同音，都讀陽平 mei<sup>1</sup>。

昌黎城关的動詞“沒”字和副詞“沒”字聲調不同。動詞“沒”字讀陽平（在重讀音節前讀 t<sub>33</sub>，是平甲 413 的變調；在輕聲前讀陽平乙 111：必要時總稱陽平）。副詞“沒”字讀去聲（在陰平前讀陰去 755，在其他重讀音節前讀陰去的變調 143；在輕聲前讀陽去 434：必要時總稱去聲）。

現在把昌黎城关的動詞“沒”字和副詞“沒”字比一下。例如：

A 你有書嗎？ 沒書 [mei<sup>1</sup> tɕʰu<sup>1</sup>]。①  
“沒書”相當于“无書”，其中“書”字是名詞作賓語，“沒”字是動詞，讀陽平。

B 你下棋輸了嗎？ 沒輸 [mei<sup>1</sup> ɕʰu<sup>1</sup>]。①  
“沒輸”相當于“未輸”，“輸”字是動詞作中心語，“沒”字是副詞作修飾語，讀去聲。“書”和“輸”雖然同音，可是詞性不同，前頭的“沒”字就不同音。

A 你有鋸嗎？ 沒鋸 [mei<sup>1</sup> tɕʰɿ<sup>1</sup>]。

B 你把木頭鋸咧嗎？ 沒鋸 [mei<sup>1</sup> tɕʰɿ<sup>1</sup>]。

“鋸”是名詞，也是動詞。A句的“鋸”字是名詞，做“有”的賓語；B句的“沒鋸”的“沒”字是動詞，讀陽平甲的變調。B句的“鋸”字是動詞，“沒鋸”的“沒”字是副詞，讀陰去的變調。“沒”字后頭的两个“鋸”字雖然同音，我們從“沒”字的聲調可以斷前定一句是回答“有”的，后一句是回答“已未”的。這樣我們從“沒”字的聲調可以鑒別它后頭跟的是名詞還是動詞。即使名詞和動詞完全同音也可以辨認出來。又如“沒吃的” [mei<sup>1</sup> tɕʰi<sup>1</sup> ti<sup>1</sup>]，“吃的”是名詞，前頭的“沒”字

讀陽平，“沒吃” [mei<sup>1</sup> tɕʰi<sup>1</sup> ti<sup>1</sup>]，“吃”字是動詞，“沒”字讀去聲。

“沒”字修飾形容詞和修飾動詞一樣，也讀陰去。例如：

B 孩子大咧嗎？ 沒大 [mei<sup>1</sup> ta<sup>1</sup>]。

B 茶涼咧嗎？ 沒涼 [mei<sup>1</sup> lian<sup>1</sup>]。

B 蘋果紅咧嗎？ 沒紅 [mei<sup>1</sup> xun<sup>1</sup>]。

“沒大，沒涼，沒紅”，“沒”字是副詞，都讀陰去。比較“沒大的” [mei<sup>1</sup> ta<sup>1</sup> ti<sup>1</sup>]，沒涼的 [mei<sup>1</sup> lian<sup>1</sup> ti<sup>1</sup>]，沒紅的，[mei<sup>1</sup> xun<sup>1</sup> ti<sup>1</sup>]，“大的、涼的、紅的”都是名詞，“沒”字是動詞，讀陽平。

“沒有、沒·价”也都具備動詞、副詞兩種性質，其中“沒”字的聲調也隨詞性而異。動詞“沒有”讀 mei<sup>1</sup> iou<sup>1</sup>，“沒·价”讀 mei<sup>1</sup> tɕʰie<sup>1</sup>，“沒”字都是陽平乙。副詞“沒有”讀 mei<sup>1</sup> iou<sup>1</sup>，“沒·价”讀 mei<sup>1</sup> tɕʰie<sup>1</sup>，“沒”字都是陽去。例如：

A 你沒有 [mei<sup>1</sup> iou<sup>1</sup>] 椅子嗎？

沒有 [mei<sup>1</sup> iou<sup>1</sup>]。

沒·价 [mei<sup>1</sup> tɕʰie<sup>1</sup>]。

我沒有 [mei<sup>1</sup> iou<sup>1</sup>] 椅子。

我沒·价 [mei<sup>1</sup> tɕʰie<sup>1</sup>] 椅子。

問句和四個答句中“沒有、沒·价”都是動詞，無論有沒有賓語都讀陽平乙。

B 他沒有起來嗎？ 沒有 [mei<sup>1</sup> iou<sup>1</sup>]。

沒·价，[mei<sup>1</sup> tɕʰie<sup>1</sup>]。

他沒有 [mei<sup>1</sup> iou<sup>1</sup>] 起來。

問句和三個答句“沒有、沒·价”都是副詞，無論單用還是作修飾語（“沒·价”不能作修飾語）都讀陽去。

從以上例句可以知道，即使單說“沒有、沒·价”，從“沒”字的聲調也可以听出是當“无”講還是當

① 動詞“沒”字的例句頭上注 A，副詞“沒”字的例句頭上注 B 字。下同。

“未”講。

“沒”或“沒有”也可以用來表示比較，是動詞，讀陽平。例如：

A 今儿个沒 [mei ㄉ] 昨儿个冷。

A 穿的沒 [mei ㄉ] 吃的要緊。

A 誰都沒有 [mei ㄌ iou ㄌ] 他会說話。

“沒”字單用讀陽平甲的變調 ㄉ，“沒有”的“沒”讀陽平乙 ㄌ。

“沒”字用在“沒哭沒笑，沒大沒小”一類格式里，是動詞，讀陽平甲的變調 ㄉ。例如：

A 沒穿沒戴 mei ㄉ ts'uan ㄌ mei ㄉ tai ㄌ

A 沒死沒活 mei ㄉ sɿ ㄌ mei ㄉ xuo ㄌ

A 沒大沒小 mei ㄉ ta ㄌ mei ㄉ ɕian ㄌ

A 沒遠沒近 mei ㄉ yan ㄌ mei ㄉ tɕin ㄌ (“近”又音 tɕin ㄌ)

A 沒深沒淺 mei ㄉ ʂen ㄌ mei ㄉ tɕian ㄌ

這都是成語性質，限定四個字，並列的字限于意義密切相關或意義相反的，比如“穿”字和“戴”字，“大”字和“小”字。

## (二)“啍”字和“咧”字

普通話的輕音“了”字有兩種性質。比方“我看了戲了”，第一個“了”字類似詞尾，第二個“了”字是語氣詞。這兩個“了”字北京同音，都是 ㄌə·ㄌ。昌黎話這兩個“了”字不同音。類似詞尾的“了”是 liou ㄌ 或 lou ㄌ，我們寫成口旁留——啍。語氣詞“了”是 lie ㄌ，我們寫成口旁列——咧。我們記錄昌黎話的時候，“啍”和“咧”分開寫，行文只用一個“了”字。“我看了戲了”，昌黎話是“我看啍戲咧”。

“啍”字的用法，可以分四項來說（“啍”字用在可能補語里，如“拿動啍”，見下文（四）《可能補語》）。一是表示完成。例如：

他吃啍飯咧。

他寫啍信咧。

二是表示過去，後頭一般帶有數量詞，例如：

他請啍一桌客。

我寫啍一封信。

他跑啍兩回。

我去啍一趟。

三是表示條件，例如：

有啍人啥事儿都好办。

他們說完啍話就出來咧。

夜儿黑家(昨天晚上)我看完啍戲就回來咧。

天晴啍就叫你走。

這項用法沒有時間限制。“有啍人，啥事儿都好办”，句話可以泛指，後頭可以加上“你信不信？”“天晴啍叫你走”，說話的時候天還沒有晴，指的是未來的事。

“啍”表示條件，位置可以在賓語後頭，例如：

看見你哥哥啍，替我問候一聲。

到家啍，記着來封信。

四是用在命令句里，例如：

吃啍這碗飯。

把這碗飯吃啍。

別打啍飯碗。

別把飯碗打啍。

肯定句、否定句都可以用“啍”字，“啍”字可以用在句中，也可以用在句尾。

“咧”字的主要用法是表示變化，表示新情況的現。這可以从兩方面看，一是本來沒有這種情況，現在才有；二是本來沒有注意到這種情況，或者不知道這種情況，現在才注意到，才知道。例如：

下雨咧。

雨不下咧。(或者說：不下雨咧。)

天要晴咧。

咱們要下地咧。

上文指出，“啍”字用在命令句里，沒有肯定否定的限制，也沒有句中句尾的限制。“咧”字也在命令句里，不過用法上有兩重限制。第一，肯定命令句不用“咧”；第二，“咧”只用在句尾。例如：

這碗飯別吃咧。

別說咧。

把“咧”字改成“啍”字，意思就不同了。“這碗飯別吃咧”，是對方正在吃這碗飯，叫他半路打住不吃。“這碗飯別吃啍”，說這句話的時候，對方還沒有在那兒吃碗飯，叫他不要吃這碗飯。“別說咧”，是對方正在那兒說，叫他停住不說。“別說啍”，說這話的時候對方沒有在那兒說話，叫他不要開口。從吃到不吃是一種變化，從說到不說也是一種變化。“咧”是表示變化的，所以這一類命令句用“咧”，和用“啍”的命令句不同。

上文說過“啍”表示條件。“咧”正相反，表示結果。例如：

有啍人啥事儿都好办。

他來啍就好咧。

“有啍人”，“他來啍”是條件，“啥事儿都好办”，“就好咧”是結果，都是指新的情況。同樣的：

這就好咧。

那你就別去咧。

都表示新的情況，“這”和“那”承上文的條件而言。



### (三) 卷舌化①的几种作用

昌黎方言卷舌化的作用比普通話广,普通話說“杏儿、花儿、这儿、那儿、黄儿、玩儿”,昌黎也說,共同之点里不討論。昌黎方言卷舌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分成三来说。

第一,昌黎名詞卷舌化除了和普通話相同的以外,还有相当于名詞加“里”的。例如:

扔海儿去。  
屋儿坐去吧。  
掉缸儿咧。

三句話相当于“扔海里去,屋里坐去吧,掉缸里咧”,“海儿、屋儿、缸儿”可能就是由“海里、屋里、缸里”来(普通話“这儿、那儿、哪儿”由“这里、那里、哪里”来,名詞沒有这类現象。)

第二,昌黎動詞卷舌化大部分相当于動詞加“啍”。例如:

剃儿头咧      磕儿俩头。  
走儿火咧      跑儿两回。  
受儿凉咧      打儿一下。  
喝儿酒咧      去儿一趟。

“剃儿头咧”相当于“剃啍头咧”,“去儿一趟”相当于“去一趟”。还有一些動詞卷舌化可以解釋成動詞加“得(到、在)”加“着”等。例如:

放儿桌子上。      装儿箱子里咧。  
掉儿井里咧。      盛儿碗里。  
丢儿街上咧。      扇子攔儿那儿咧?  
坐儿椅子上。      攔儿柜子里。

“放儿桌子上”可以解釋成“放得(到、在)桌子上”,“攔儿柜子里”可以解釋成“攔得(到、在)柜子里”。

坐儿車来咧。  
坐儿車来的。  
騎儿馬來咧。  
騎儿馬来的。  
哭儿走咧。  
哭儿走的。

“坐儿車来咧”可以解釋成“坐着車来咧”,“坐儿車来的”可以解釋成“坐着車来的”。又如:

他碰儿門上咧,碰儿他自各儿咧。

也可以說:

他碰到門上咧,碰啍他自各儿咧。  
他碰到門上咧,碰着他自各儿咧。

这样說那样說,几种說法同样自然。②

第三,昌黎形容詞卷舌化相当于形容詞加“啍”,并且只用在“去咧”的前头。例如:

白儿去啍。      多儿去啍。  
美儿去啍。      远儿去啍。

“多儿去咧”、“多啍去咧”,两种說法可以互換,也同样自然。大概这类形容詞卷舌化都是由形容詞加“啍”造成的。

这三項卷舌化的詞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能用在停頓的地方,后面必須帶有別的成分。

### (四) 可能补語

普通話的可能补語有各种格式。例如“吃得,吃不得;来得,来不了;拿得动,拿不动”。“得”字北京一律讀  $te^4$ 。

昌黎話的可能补語跟普通話略有不同。在否定式里,昌黎話的說法跟普通話相同。只是“吃不得”的“得”字昌黎讀  $ti^4$ 。在肯定式里,昌黎話和普通話不同。普通話說“来得,拿得动”,昌黎話說“来了啍, [lai<sup>4</sup> ɬ lian<sup>4</sup> l(i)ou<sup>4</sup>]; 拿动啍 [na<sup>4</sup> tuŋ<sup>4</sup> l(i)ou<sup>4</sup>],”普通話是“動詞+得+补語”,昌黎話是“動詞+补語+啍”。普通話說“吃得”,昌黎話說“吃得啍” [tɕ<sup>4</sup> ti<sup>4</sup> l(i)ou<sup>4</sup>],也是“動詞+补語+啍”的格式。例如:

这果子吃得 [ti<sup>4</sup>] 吃不得 [ti<sup>4</sup>]?

这是熟的 [ti<sup>4</sup>], 吃得啍 [ti<sup>4</sup> l(i)ou<sup>4</sup>].

那是生的 [ti<sup>4</sup>], 吃不得 [ti<sup>4</sup>].

你們来了来不了 [lai<sup>4</sup> ɬ lian<sup>4</sup> lai<sup>4</sup> pu<sup>4</sup> lian<sup>4</sup>]?

我沒 [mei<sup>4</sup> ɬ] 事,来了啍 [lai<sup>4</sup> ɬ lian<sup>4</sup> l(i)ou<sup>4</sup>].

他忒 [t<sup>4</sup>uei<sup>4</sup> ɬ] 忙,来不了 [lian<sup>4</sup>].

这个事儿三天做了做不了

[tsou<sup>7</sup> lian<sup>4</sup> tsou<sup>7</sup> pu<sup>4</sup> lian<sup>4</sup>]?

你做了啍 [tsou<sup>7</sup> lian<sup>4</sup> l(i)ou<sup>4</sup>].

我做不了 [tsou<sup>7</sup> pu<sup>4</sup> lian<sup>4</sup>].

这块石头很沉,拿动拿不动?

我拿动啍,

他拿不动。

这房子你上去上不去?

① 昌黎南部(包括城关)“儿化韵”讀卷舌韵,北部无卷舌韵,“儿化韵”多数讀 -w 尾韵。

② 也有少数例子,不能換成動詞加“啍”等的。例如:“騎馬找儿馬。”是騎着馬找馬的意思。

我上去囉，  
他上不去。

這釘子你拔出來拔不出來？  
我拔出來囉，  
他拔不出來。

動詞帶肯定的可能補語，要是再帶賓語，賓語就放在“囉”字前頭。例如：

你這病吃不得干飯。  
他病好囉，吃得干飯囉。①

以上舉的例句，凡是問句都用反復問句，如“來了 [liau˥] 來不了 [liau˥]，拿動拿不動，上去上不去。”（肯定的可能補語在反復問句里都不帶“囉”字，在別處都帶“囉”字。）昌黎不說“來得了，拿得動，上得去”，當然也不說“拿得動拿不動，來得了來不了，上得去上不去”。昌黎倒是另有一種說法，就是在肯定的可能補語後頭加“阿[ɑ˥]（在[u]後頭讀哇[ua˥]）”。例如：

（上接 489 頁）

- 24) “這這些些都是費話”，…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  
25) “人有叫大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連忙咽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面，鼻子紅到發紫，吆喝道。  
26) “哼！”烏頭先生氣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  
27) 看客也漸漸的走散，烏頭先生就紅着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面，…

通過幾個平平常常的色彩詞的巧妙運用，魯迅先生把一個心胸狹窄、剛愎自用、知識淺薄的“學者”的丑態全部揭露了出來，讓讀者感到他的卑鄙和可笑，因而更加感到中國民族古代代表人物夏禹的偉大和可敬。

從上面的例句和分析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魯迅先生對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運用色彩的手法：這中間充分體現了魯迅先生一貫所有的強烈的愛憎精神。

### 三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魯迅先生運用色彩詞是十分豐富、準確、鮮明、生動的，因而使文學作品更加真實，更加生動，更加有力量。魯迅先生為什麼能夠這樣善於運用色彩詞呢？這是與他生活經驗的豐富和寫作態度的認真分不開的。

你們來了 [liau˥] 囉哇？  
這塊石頭很沉，拿動囉哇？  
這房子你上去囉哇？

都是問能否的。

這兒是說昌黎話可能補語的說法跟普通話不同，至於表示情況的補語，昌黎話跟普通話一樣，都用“得”字，不過“得”字北京讀 ta˥，昌黎讀 ti˥。例如：

他說得快不快？

這是問情況的（不是問能力的），回答是“他說得快”或者“他說得不快”。普通話“說得快”可以指情況（對“說得不快”而言），也可以指能力（對“說不快”而言），要靠實際環境上下文來確定它的意義。昌黎話“說得快 [suo˥ ti˥ k'uai˥]”指情況，“說得快 [suo˥ k'uai˥ l(i)ou˥]”指能力，分別很清楚。

① 這句話要是說成“他病好咧，能吃干飯咧。”第二“咧”字不能改成“囉”字，因為上頭沒有“得”字，“囉”字就上不去了。

魯迅先生從小就喜歡和勞動人民接觸，從小就愛好大自然，這就是供給他的無窮無盡的色彩詞的源泉。據魯迅先生親友回憶，魯迅先生從小就“非常喜歡美術，搜集過很多民間繪畫，也繪制過很多美術作品，很喜歡花草…幼年的魯迅真可以說是個小小的植物家”（見《文學知識》1959年第5期，張能歌：《魯迅的青少年時代》）。後來，從日本留學回國後，魯迅先生“一面努力於文學的創作、翻譯及古代作家著作的整理工作，另一方面他又致力於考古學及生物學知識探求。…星期日，他也常下鄉去拓印碑帖，或與三弟建人先生一起，帶着工具到鄉下去採集植物標本。來後又細心的整理與保藏起來。”（同上面引文）愛好繪畫，學習繪畫，喜歡花草，注意研究植物，這種種實踐活動使魯迅先生獲得了許多有關色彩方面的知識，掌握了豐富的色彩詞。

魯迅先生諄諄教誨青年：“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見《答北斗雜誌社問》）他自己就是一切毫不馬虎，實細致，寫作態度十分嚴肅認真的。他的許多傑作以說明這一點：他在作品中運用色彩詞的豐富、鮮明、生動，也是有力的證明。



# 语文短评

636 唐代天宝年間，古代画家吳道子，奉唐明皇之命，还專門来这一帶，画过嘉陵江的山水呢！（人民日报 1959年5月22日8版）

“唐代”已具体指明是古代，用“古代”修飾“画家”是多余的。应删去“古代”。最后一个逗号也应删掉。（雨田）

637 不过，我認为如果把小小說認为只是一种鍛煉群众創作的过渡式的手段，我以为是低估了它的价值。（人民日报 1959年5月26日8版）

“我認为”跟“我以为”重复。应删掉“我認为”。（雨田）

638 “…同学們，咱們想想，中国儿童这样受苦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楊沫：青春之歌，263頁）

“因为”与“原因”的意思相同，在一句話里同时使用嫌重复。可任去其一。（潘力）

639 每个能上山劳动的大人每人一整套，…（曲波：林海雪原，210頁）

前面已经有“每个”了，后面又加上“每人”，重复累贅，可任删去一个。（盧延权）

640 去年上旬，…（人民日报 1959年3月11日5版）

一句为十天，一月分为三旬，即上旬、中旬、下旬。說“去年上旬”，这是去年的什么时候呢？显然，这样說是錯誤的。（刘琳）

641 随着全国工农业的发展，中小学教育的日益普及，农村幼儿园的普遍設立，儿童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人民日报 1959年3月16日4版广告）

“大大增加”的不是“儿童”的需要量，而是“儿童讀物”的需要量；应该在“儿童”后面加上“讀物”两字。（陈向羣）

642 我向你們反映一个共产党员不該信迷信的事件。（共产党员 1959年4期，26頁）

1) “信迷信”应改为“迷信”。2) “我”所要“反映”的是“一个共产党员‘迷信’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該迷信’的事件”，“不該”只是說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而已；因此应把“不該”删去。（向羣）

643 恰巧，在一九五四年我因身体健康不好…（中国青年 1959年16期，38頁）

說“…身体不健康”或“…身体不好”或“…身体健康情况不好”都可以，就是不宜說“…身体健康不好”。（伍均仁）

644 希望你能多給我以帮助。（中国青年 1959年16期，38頁）

这句話里用“以”，可能是受文言“待之以礼”等这种格式的影响，在现代汉语里，特别是口語，这种格式已經不用了。这里的“以”可以删去。（伍均仁）

645 无论病到什么程度，仍得要向工头和資本家卖命，在棍棒下去生活。（人民日报 1959年4月3日第1版）

“向”是表示方向或目标的，“为”是表示目的的。这里“向”应改成“为”。（宋玉桂）

646 我想，这不仅是文艺理論探討探討所能解决，而是靠作家的創作实践才能解决的問題了。（羊城晚报 1959年5月22日2版）

汉语里没有“不仅是…而是…”这种格式，这里是把“不仅是…而且是…”和“不是…而是…”两种格式糾纏起来了，应把“是”字删去。（向羣）

647 资产階級右派同人民的矛盾在性質上也是敌我矛盾，只是在处理方法上，为了爭取中間派，也便于分化人民，而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而已。（中国青年 1959年4期，6頁）

在这句里，各分句間沒有轉折的意思，“而是”在这里用錯了，应删去。（王燕）

648 如果說我們从林黛玉这一典型形象中所感受到的那个社会的阴暗和潮湿，以及那种令人窒息的时代；那么…（蔣和森：紅樓夢論稿，92頁）

分号以前显然应该是一个分句，但是由于缺少一个系詞“是”，結果使得句子成为沒有謂語的殘句了。这个“是”应该填在“感受到的”和“那个社会”之間。（宋玉桂）

## 評《談北昆的“漁家樂”》一文的語病

楊靜仁

我讀了《文匯報》1959年5月25日3版所刊載秦瑾的《談北昆的“漁家樂”》一文，覺得有几个句子在用詞和結構方面值得提出與作者編者商討。

- 1) 改編者一開始便集中的展開了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突出了主題思想及時代背景，人物性格也刻劃得更顯明了，因此把原劇本中“萬事由命不由人”的唯心主義的觀點加以洗刷，而重點的描述勞動人民與統治階級之間的不可協調的鬥爭。

“展開了…矛盾”不如用“描寫了…矛盾”更合習慣。第一個句號也應移到“…更顯明了”的後面才恰當。“集中的展開了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與“…描述勞動人民與統治階級之間的不可協調的鬥爭”是一件事的兩種不同說法，它們之間沒有因果關係，用了“因此”，就顯得因果無據。可以把“因此”改為“改編者”。前面的“改編者”最好也改為“改編本”。

- 2) 改編者首先抽掉了清河王劉蒜與鄧飛霞兩人愛情的這條綫，也刪除掉清河王應允封鄧飛霞為正妃的那段戲，因此增加了鄧飛霞的深度，使得她的性格更完美無瑕了。

“鄧飛霞”這個人物有什麼“深度”可以“增加”呢！講不通；“因此”也用得沒有道理。把這個有毛病的分句去掉，會顯得更緊湊，並且不影響原意。

濫用表因果關係的關聯詞語，就嫌累贅；反之，苟簡則又顯得關係鬆懈。例如：

- 3) 作家身處在明末魏忠賢專政的動亂時代，當時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他借東漢的故事來隱喻當時的政治情況，因此這個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的意願。

原劇本寫得很樸實自然…有些地方作者更大膽的運用了民間的蓮花落、民歌，所以這是一個比較接近人民的作品，這個戲是有保留的價值的。

這裡，用了“因此”“所以”，成為兩個複句，結構就較複雜，必然要用“這個戲”“這”來使主語重複出現；其實在這兩個句子里，刪去“因此”“所以”，意思很明白，用了反嫌累贅。而“這個戲是有保留的價值的”是由上述情況得出的結論，上下文的因果關係必須敘述明白，

否則這句話便無着落；這就得在這個句子前邊加上“此”，使結構緊湊。

這篇文章在使用並列成分時，中間多用“及”例如：

- 4) 《十五貫》及《紅霞》曾經給我們提出了兩個在與發展上的範例…
- 5) 從改編本中，我們可以看出金紫光及黃勵兩人的志是花了相當多的苦心的。
- 6) 如馬瑤草的音樂，開始、結尾及主要骨架子是“三醒”做基調…
- 7) 表演方面…也作了一些新的調度及新的處理。
- 8) …並且特別注意在舞蹈中盡量要表現出人物性格及戲的內容。

“及”跟“和、與、同”用法雖然差不多，但表示意思却有細微的區別。它是從文言里繼承過來的，來有“由此及彼”的意思，所以它的前後顯然有主次或先和後之分。上面列舉的例句4—8里，都主要、次要或先後之分，甚至例6里的“主要骨架子”比“開始、結尾”顯得重要。從語言規範化的角度要求保存“及”跟“和、與、同”的有用的區別，這“及”最好都改成“和”。

- 9) …使它盡量的能與現在的廣大群眾取得聯繫，促成這個劇種能在社會主義的新生活中重新繁榮茂盛起來。

“以促成這個劇種”和“使它”的語意重複，是多余的詞語，刪去才簡潔。

- 10) “蓮花落”的曲子，是昆曲中保留民間風格較多的曲子，它尚未宮廷化，因此仍留用原曲調，不加重了它的民間色彩。

既然是“仍留用原曲調”，怎么能“更加重了它的民間色彩”呢？“不過”後面應該有“略加修改”這類詞語。

評介戲曲的文章可以說是具有專業性的，對讀者說來，這類文字應該特別注意準確性、鮮明性、動性。但是，《談北昆的“漁家樂”》這篇文章，在這方面是注意得不够的。



# 党的教育方针在民族语文教学工作中的辉煌胜利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八年来的工作简况——

吴 一 飞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成立已经八年了。八年来，党的正确领导，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经过整反右和红专大辩论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全系师治觉悟大大提高。1958年由于全面贯彻了党的方针，教学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迎接我们祖国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这八年的历程，我们带来乘风破浪、继续跃进的力量和信心。

## (一)

根据1950年前政务院批准的“筹办中央民族学院方案”的决定，1951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招收了五名志愿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学生和有相当少数民族学生成立一个藏语班，培养藏语文的人员。同年秋教育部又调来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中毕业生六十五人，增设了七个民族语文专业，就个基础上1952年正式成立了语文系。八年来先后共招收了八百八十九名学生，开设了蒙、藏、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僮、布依、傣、彝、苗、瑶、侗、黎、纳西、景颇、佤、拉祜、哈尼、黎和高山等二十个民族的六十三班。另外还开办过语言研究修科和专修班各1个，汉语文学班两个，共招收生二百七十五人。1956、1957年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合办过语言调查训练班和突厥语研究。目前在校的有五个年级二十三个班次，包括十专业的五百八十四名学生，八年来共培养出学生人，分布在中央和各民族地区从事民族语文教学、和科学研究等工作。

过去几年工农成分学生比例较小，如1956年入学科学学生一百零二人中，工农学生十五人，仅占百分之四十七。自1958年度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高育向工农开门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年招收的本科学生一百六十人中，工农学生共一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工农学生的急剧增加，为培养在民族语文工作中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了积极可靠的条件。

第一届藏语班成立时，只有专任教师一人，现在已发展到有教授、讲师、教员和助教等一百二十八人。包括汉、蒙、回、藏、达斡尔、维吾尔、锡伯、柯尔克孜、哈萨克、苗、瑶、土家、纳西、彝、傣、哈尼、拉祜、景颇、佤、僮、布依、水、傈、黎、高山等二十六个民族成分。其中五十四人是语文系本科或研究班培养出来的师资。其余的很多少数民族教员也是在教学工作中培养锻炼出来的。由于教学任务的需要，按语言系属分设七个民族语文教研组、一个语言学教研组和一个汉语文学教研组。

1954年起，先后有苏联谢尔久琴柯教授、托达叶娃专家和捷尼舍夫教授来校，除了为研究班讲课，给我们带来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外；并指导语文系的全面工作，对教学计划和科学研究都提出了宝贵的指示和具体的意见，使我们的工作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经过历年教学实践，教学计划日趋完善。初创时期教学“方案”是培养翻译人材，课程只有民族语文与语音学，学习时间是两年。其后随着国家建设形势的发展，教育计划曾多次修订。就目前的计划来看，语文系是培养少数民族语文的教学、编译和科学研究的专门人材的学系，学习四——五年毕业，除专业民族语文外，还要加强政治课和基础课的学习。为了适应民族语文工作发展的需要，新的教学计划规定在高年级分语言、文学和编译三组，要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掌握一种专门化的知识。

语文系的教学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把生产劳动也列入教学计划中。一是每周的分散劳动，主要是在校内或帮助附近公社义务劳动，一是每学期集中劳动一个月左右。这样做在学生中形成了既热爱劳动又认真读书的风气，通过劳动联系生产实际，丰富了社会知识，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语文系在建系之初就注意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实习相结合。结合每个民族语文的实际，贯彻党的语言政策，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武装思想。课堂教学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如讲授专业民

族語文即結合黨幫助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方針，提高少數民族文化 and 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以及黨的語言政策師生共同參加辯論。講授“語言學引論”時，一面批判資產階級的語言學說，一面讓學生樹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正确觀點和解決語言工作上的正确理論基礎。這樣的教學方法，培養了學生的思考能力。為了使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學生在校學習三年還要到所學的專業民族地區實習和調查。八年來已有四十七個班的五百五十三名學生到達內蒙、西藏、新疆、廣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南和雲南等地區實習，同少數民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提高了覺悟，熟練了業務，鞏固了專業思想，同時還提高了學生獨立工作的能力。

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除去實習外，我們還參加了有關少數民族的語言、社會歷史調查工作。1952年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共組工作組到貴州從事苗語的初步調查。1955年又共組調查組去貴州、雲南、廣西的三十多個縣市進行苗語調查。又同科學院和新疆內蒙兩地語文研究機構組成調查組到新疆調查了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族的語言，到內蒙、甘肅、青海等地調查了蒙古、達斡爾、土族、東鄉族的語言。而規模較大的是1956年同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所和地方語文機構及其它單位組成七百多人的七個全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隊（中央民族學院參加四百零七人，其中語文系師生三百九十三人）深入十六個省、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語言普查，這為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改進和改革文字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和科學根據，提高了我國少數民族語文研究的科學水平。去年又有師生一百三十二人參加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通過調查加強理論與實踐的聯繫，把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結合起來，擴大了眼界，豐富了知識，也樹立和鞏固了專業思想。如本年度畢業生百分之百地要求到民族地區去終生獻身民族工作。

科學研究工作，過去較長時間曾經只是少數教師在搞，特別是有些老教授不教課，關着門搞科學研究。1958年向國慶獻禮時，全系師生在黨的領導下貫徹黨委師生三結合的原則，苦戰十餘晝夜，共同編寫出專家們八、九年沒有搞成的藏漢、維漢、和蒙漢、柯（柯爾克孜）漢、彝漢、漢僮、漢布口語詞典及苗語方言對照詞匯的初稿，參加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並選派代表參加了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通過這次編纂工作，生動地說明在黨的領導下群眾路線的正确，全體師生在政治思想上，在業務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 （二）

幾年來語文系的教學工作能取得如前所述的成績，主要是跟做好了以下的幾件工作分不開的。

1) 加強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根本保證。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之後，為了貫徹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語文系首先健全了在黨總支領導下由黨政工團與師生代表組成的系務委員會，並建立了在黨總支領導下的級主任制。通過系務委員會充分發揚民主，調動全系師生的積極因素，共同研究、討論解決教學上的問題。級主任有的是專職，有的是任職教師兼任，他們全部參加學生支部工作，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思想和生活情況，全面貫徹黨的意圖，這就保證並加強了黨對教學工作的絕對領導。

同時，要定期進行教學檢查，系領導、級主任和課教員都參加班上的座談會，听取同學意見，在教學方法和講授內容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革，這對教學質量的提高有很大幫助。

2) 加強集體備課，搞好師生關係，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語文系教師的特点是：少數民族教師，漢語文水平低；而漢族教師的少數民族語文又不夠熟練，這就形成合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其次，少數民族語文科學是一門新的科學，不少語音、語法現象需要集體備課才能夠辯論得清楚明確。因此要集體編教材，集體討論，有問題全組展開討論。每次討論大家都提高。往往一個課就有不少人幫着找資料增補例子。對於學生反映的意見也共同分析研究，這就減輕個人單干的負擔，加強了集體主義精神，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和教學質量。

師生關係的好壞對提高教學質量也有直接關係。自教學整改以來，大多數任課教員和級主任都到學生飯廳吃飯，到同學宿舍談話，關心同學的生活。或者在假日與同學一道去玩，這樣就可以經常了解同學的學習情況和思想上的問題，還可以密切師生關係，促進學相長，從而發揮教師在講課、留作業、改本子、輔導考試等一系列的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

3) 以教學為中心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學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學，首要任務是不斷提高教學質量。科學研究應同教學工作密切相連，以教學為中心，服從於提高教學質量的要求。過去少數人搞科學研究工作，不是成績微薄就是同教學無密切聯繫。經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之後，明確了科學研究應為教學服務。去

（下轉 468 頁）



# 十年来我国語言学界記事

1949——1959

本刊編輯部

这篇“記事”是根据手边現有的資料編就的初稿。因資料不完全，編者的見聞有限，而且对某些事件的取舍难以定出明显的界限，因此一定有些遺漏、錯誤或取材不当的地方，請讀者和有关方面来信指正、补充，打算集中大家的意見下月做一番修訂。

## 1949年

- 10日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
- 11日 东北铁路实行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代替以前的注音字母电报。
- 10日 《新文字周刊》在上海創刊。第68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85期，1952年5月5日改为《語文知識》月刊。

## 1950年

- 5日 天津新文字研究会成立。
- 17日 廈門新文字研究会成立。
- 《俄語》月刊在哈尔滨創刊。
- 郑易里等編《英华大辞典》出版。修訂本1957年12月出版。
- 1日 《中华俄語》月刊在上海創刊。1958年10月改由北京俄語学院編輯。1959年1月改名《俄語学习》。
- 17日 《新語文》（《光明日报》副刊）在北京創刊。1951年12月30日停刊。
- 1日 廈門《新文字月刊》在廈門創刊。
- 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短評：《請大家注意文法》
- 28日 杭州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
-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設立“学术名詞統一工作委員会”。
-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 1日 《翻譯通报》（内部发行）在北京創刊，1951年1月15日公开发行。1953年6月15日改为内部刊物。
- 1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斯大林《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李立三譯）。
- 23日 广州新文字出版社成立。
- 3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斯大林《論語言学的几个問題》（齐望曙、曹葆华譯）。
- 《斯大林論語言学問題》（草嬰譯）出版。
- 14日 广州《新文字月刊》創刊。
-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李立三、曹

葆华等譯）出版。

- 11月 2日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語文系、东方語文系、西方語文系联合举行斯大林論語言学問題的座談会。
- 12月 9日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召开座談会，討論罗常培的报告《斯大林論語言学問題与中国語言研究的联系》。

## 1951年

- 2月 11日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召开第二次語文专题座談会，討論語法問題。
- 3月 11日 中华全国世界語协会在北京成立。
- 3月 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各民族訪問团与西康省西昌軍事管制委员会和彝族人士共同完成西康民族拼音文字初步設計工作。
- 3月 陆志韦編著《北京話单音詞詞汇》出版。
- 4月 周祖謨《广韵校本》出版。
- 5月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备会在北京成立。
- 5月—9月 北京一部分文字改革工作者提出修改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見，香港新文字工作者于6月提出答复意見，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7月15日第三次理事会通过了答复意見，武汉文改协会分会9月也提出了意見。
- 6月 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論《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争》，并开始連載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至12月15日完畢。单行本于1952年12月出版。
- 6月 7日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对所屬机构及全国出版工作者发出号召，要求积极响应《人民日报》6月6日社論的号召，并将同日开始刊登的《語法修辭講話》当作經常的业务学习材料。
- 6月 馬学良著《撒尼彝語研究》出版。
- 7月 31日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举办的語文干部訓練班在北京开学。
- 8月 15日 《語文教学》月刊（語文教学社編）在天津創刊。出至第9期停刊。
- 9月 26日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标点符号用法》。

- 10月 1日 《俄文教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
- 10月 6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西南、中南少数民族语言座谈会。
- 10月 12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
- 10月 20日 《语文学习》月刊在北京创刊。
- 10月 丁易著《中国的文字》出版。
- 11月 2日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汇通方案及汉字注音问题座谈会”。
- 12月 26日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第31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通过组织简则和委员名单。

### 1952年

- 1月 6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在《人民日报》介绍“速成识字法”。
- 2月 5日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 2月 《新建设》月刊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协助下，开辟《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特辑》栏，开始发表各家对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意见。
- 2月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到云南工作。
- 4月 23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为奖励“速成识字法”创造者祁建华的功绩，特举行给奖仪式。
- 5月 5日 杜子勤编《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年谱》——文字改革六十年大事记——在《语文知识》创刊号开始连载。
- 5月 28日 《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使文章和语言愈见接近起来！》。
- 5月 李荣著《切韵音系》出版。
- 5月 周有光著《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出版。
- 6月 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
- 7月 20日 《中国语文》月刊在北京创刊。
- 7月 20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语法讲话》开始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到1953年11月号连载完毕。
- 8月 曹伯韩著《语法初步》出版。
- 9月 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设语言专修科。
- 9月 杨树达著《积微居金文说》出版。
- 10月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学文化字典》出版。
- 11月 28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召开“新闻语言问题座谈会”。
- 12月 25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相声语言座谈会”。

### 1953年

- 2月-5月 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语言学界。

- 3月 5日 斯大林同志逝世，各语文刊物本月发表社论哀悼。
- 4月 5日 《语文知识》发表社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
- 6月 袁家骅著《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出版。
- 7月 13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举行“学术译名问题座谈会”。
- 9月 26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扩大会议。
- 9月 黎锦熙、刘世儒著《中国语法教材》出版。1952年8月出齐(正文六册，附录一册)。
- 10月 22日 《中国语文》展开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1952年7月告一段落，编辑部作出小结。
- 10月 管燮初著《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出版。
- 10月 新华辞典书社编《新华字典》(初版)出版。修订本1957年6月出版。
- 11月 23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举行“中学语文教学座谈会”。
- 11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讨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问题。

### 1954年

- 1月 22日 《中国语文》发表罗常培《语文工作者怎样为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服务》。
- 1月 20日 田恭《语音学常谈》开始在《中国语文》发表，1954年11月连载完毕；1956年修订后以罗常培、王均名义改题为《普通语音学纲要》出版。
- 1月 中国语文杂志社所编《中国语文丛书》开始出版。至1959年6月出至26种。
- 3月 17日 《文字改革》双周刊(《光明日报》副刊)在北京创刊。1958年10月20日停刊(共刊出119期)。
- 6月 27日 文字学家丁易在莫斯科逝世。(1913—1954)。
- 7月 10日 《蒙古语文》季刊在呼和浩特市创刊。1957年1月15日改为月刊。
- 8月 高名凯著《普通语言学》上册出版。1955年11月下册出版。
- 8月 郭沫若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修订本)出版。
- 9月 22日 《中国语文》发表韦戡《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为准备逐步实现文字改革而奋斗》。
- 9月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傣语工作队赴广西调查傣语方言。
- 10月 苏联语言学家格·谢尔久琴柯教授应聘来华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蒙古语专家托达也娃同来。1957年回国。
- 11月 7日 《外专校刊》双月刊在哈尔滨创刊。
- 12月 23日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



## 1955年

- 1月7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全国各地展开讨论,征集意见。
- 1月20日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关于整理汉字问题”的报告。
- 2月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同音词典》初版发行。
- 3月15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
- 4月9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邀请北京语言学界座谈汉语规范化问题。
- 4月19日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开始在《语文学习》连载。1957年10月完署。
- 5月16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邀请北京语言学界座谈汉语拼音文字怎样处理声调问题。
- 5月21日 文字改革问题研究者杜子勤在北京逝世。(1898—1955)
- 5月24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汉语规范化问题座谈会。
- 5月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中学《汉语》课本出版。1957年12月6册出齐。
- 7月13日 教育部发出“举办小学语文教师标准语音训练班”的通知。
- 7月19日 《语文学习》展开主语言问题的讨论。1956年3月告一段落。
- 8月19日 《语文学习》发表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
- 9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发布“关于推行新蒙文的决定”。1958年3月25日决定停止推行。
- 9月5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中国文字改革文献资料展览会。9月16日闭幕
- 9月 一部分初级中学试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
- 9月 胡附、文鍊著《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出版。
- 9月 罗马尼亚语言学家格拉乌尔院士来我国访问。
- 10月15日 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10月23日闭幕。
- 10月25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0月31日闭幕。
- 10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
- 10月30日 《中国语文》和《语文学习》联合举行座谈,招待出席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代衣。
- 10月 波兰汉学家赫迈莱夫斯基教授来我国访问。1956、1958年第二、三次来访问。
- 11月13日 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结束(1949年9月4日成立)。
- 11月17日 教育部发布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 11月18日 教育部向全国教育行政部门发出指示,要求中、小学和师范学校逐步用普通话教学。
- 11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 11月21日 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各级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
- 11月21日 教育部对推行简化汉字和横排、横写等作出规定。
- 12月6日 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共同召开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12月15日闭幕。
- 12月10日 桂西僮族自治区公布僮族文字方案(草案)。
- 12月11日 上海复旦大学设立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

## 1956年

- 1月4日 《文汇报》发表吴玉章《为大力推行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而努力》。
- 1月28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 1月 各语文期刊转载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党八股和改进报刊编辑工作的指示(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加的按语)。
- 1月 中国科学院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 1月 《中国语文》展开对唐兰文字改革理论的批判。
- 2月6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 2月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在职工中推广普通话的通知。
- 2月9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
- 2月10日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
- 2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推广普通话》。
- 2月14日 文字、训诂学家杨树达在长沙逝世(1885—1956)。
- 2月16日 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一期开学。
- 2月20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普通话实习讲座”。
- 2月20日 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合办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开学,6月底结束。
- 3月5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扩大),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议上作《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报告。
- 3月5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通知。
- 3月 铁道部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全国铁路推行文字改革的指示。
- 3月20日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

联合指示。

3月27日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学习报告会。

3月—9月 《中国语文》展开什么是词的讨论。

3月 桂西僮文学校在广西武鸣开办。

3月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语言学论文选译》第一辑出版。1958年12月出至第八辑。

3月 喻世长著《布依语语法研究》出版。

4月10日 文化部发出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的通知。

4月20日 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的《外专校刊》改名为《俄语教学与研究》双月刊,并公开发行。

4月—6月 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各地民族语文机构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七百多人,分成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陆续出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5月15日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推广普通话的联合通知。

5月22日—29日 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5月 教育部、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开始播讲。

5月31日 《语言研究通讯》创刊,1957年12月休刊,共出12期;1958年7月复刊,至1959年7月停刊。前后总共出版19期。

5月31日 《语言研究通讯》第一期第一次报导我国语言工作者正在进行的“语言研究选题”(第二次报导见同刊第三期,第三次报导见同刊第4、5期合刊)。

5月 张志公主编的《语法和语法教学》(论文集)出版。

5月 比利时语言学家贝维廉教授来我国访问。

5月 教育部公布“关于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科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并使用新课本的通知”。

5月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以及各综合大学、各高等师范学校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

6月8日 上海语文工作者开会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6月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词典编辑室。

6月25日 《语文教学》(双月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语文教学编辑委员会编)在上海创刊。

6月 苏联突厥语专家捷尼谢夫教授来我国讲学,1959年3月回国。

7月2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在青少年中逐步推广普通话的通知。

7月19日 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基本知识纲要》开始在《语文学习》连载。

7月22日 《中国语文》发表社论《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政策,为语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提高而奋斗》,展开贯彻学术上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7月27日—8月1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在青岛召开“法座谈会”。

8月4日—11日 第41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叶籁士、陈原、张企程代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参加。

8月13—22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8月15日 《拼音》月刊创刊。1957年8月15日改名《字改革》月刊,1958年8月15日改为半月刊。

8月27日 交通部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8月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组成调查队,开始调查新疆各民族语言。

9月9日 上海语文学会成立。

9月12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副院长、语言学家坦因尼茨来我国访问。

10月10日 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

10月19—21日 民族文字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在贵阳举行。

10月22日 《中国语文》发表社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鼓舞我们前进》。

10月31日—11月7日 苗族语言文学问题科学讨论会在贵阳市举行,并通过《苗族文字方案(草案)》。

10月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海南岛黎族语言调查工作。

10月 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著《关于创立民族文字建立标准语的问题》出版。

11月4—7日 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在贵阳举行,并通过《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

11月21日 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

11月25日 《民族语言调查通讯》(内部月刊)创刊。

11月—12月 藏文专家张克强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

12月18—24日 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在成都市举行,并通过《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12月29日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

12月 《语言研究》创刊。

12月 刘泽荣主编《俄汉新辞典》出版。

12月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开始出版《汉语知识讲话》丛书。

12月 孙常叙著《汉语词汇》出版。

## 1957年

1月6日 天津市语言学会成立。

1月9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学术委员扩大会议,讨论《汉语的构词法(草稿)》。



1月26日 西南民族学院的凉山彝族拼音文字师资训练班开学。

2月6日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在伊宁市举行。

2月10日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中国语文》常务编辑委员赵卓在北京逝世(1913—1957)。

2月11日 黎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在黎族苗族自治州通什市举行。通过《黎文方案(草案)》

2月16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举行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起组织中国语言学会。

3月16日—27日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在昆明举行,并通过哈尼、傈僳、景颇、纳西、拉祜、佤等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3月 岑麒祥编著《普通语言学》出版。

3月 《国语词典》的简本《汉语词典》出版。

3月 王力著《汉语史稿》上册出版。

1958年4月、6月中册、下册出版。

5月8日 中国语文杂志社邀请在北京各单位语言工作者二十五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商谈组织中国语言学会事。

5月16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5月27日继续举行。

5月25日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分科举行学术论文报告,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部分报告袁家驊、張元生《僮语词法初步研究》和周祖谟《周秦韵部与两汉韵部的异同》论文两篇。

5月 北京速记学校成立,1958年8月开办第一期。

6月1日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傅懋勳去苏联参加第一次全苏东方学者大会。

6月25日 《西方语文》季刊在北京创刊。1959年2月15日改为双月刊。9月20日改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

6月25日 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汇报会议。

6月 黄伯樵主编《德华标准大辞典》(修订本)出版。

7月1日 广西僮族自治区《僮文报》在南宁创刊。

8月22日 《中国语文》发表社论《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9月19日 《语文学习》发表社论《坚决地打击右派,积极地教育自己》。

10月22日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在《中国语文》发表第一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第二批异读词审音表(初稿)于1959年7月22日在同刊物发表。

10月25日 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同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11月1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11月29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僮文方

案。

11月18日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合办的突厥语研究班开学。

11月19日 王力、高名凯应邀去波兰讲学。

11月 陆志韋等著《汉语的构词法》出版。

12月11日 吳玉章、黎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在《人民日报》发表。

12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

12月 我国世界语者在首都集会纪念世界语发表七十周年。

12月2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通知在全军宣传和试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12月 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宣传工作计划要点”。

12月 格西曲札著《藏文辞典》汉文修订译本(法尊、張克强等译订)出版。

## 1958年

1月10日 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

1月10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派出宣传组宣传《汉语拼音方案》。

2月3日 吳玉章主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2月11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

3月13日 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教学拼音字母的通知。

3月19日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语言科学跃进座谈会。

3月26日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决定继续使用旧蒙文。

3月27日 中国科学院和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确定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原则,制定民族语文工作的跃进规划。4月16日闭幕。

3月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司发表“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语文工作方针而奋斗”。

4月—8月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方言与普通话集刊》(共五本)出版。

4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需要促进》。

4月22日 《中国语文》发表社论《鼓起革命干劲为语文工作的大跃进而奋斗》。

4月 各语文刊物展开文风问题讨论。

4月 上海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编《语言学引论》出版。

5月15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第三批简化汉字。

- 5月22日 《中国語文》、《語文学习》組織“文風筆談”。
- 6月8日 武汉語言学会成立。
- 6月 金鵬著《藏語拉薩、日喀則、昌都話的比較研究》出版。
- 5月—12月 語言学界响应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号召，紛紛提出語言研究和語言教学各方面的跃进計劃。
- 7月22日 《中国語文》发表高等院校語言学課程整改的文章。
- 7月22日 《中国語文》发表社論《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为实现文化革命而貢獻我們的全部力量》。
- 7月25日 第一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在北京开幕。8月31日閉幕。
- 7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展开对語言学課程中厚古薄今、脱离实际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批判。
- 8月18日—23日 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学討論会在貴阳举行。
- 7月 岑麒祥編著《語言学史概要》出版。
- 8月22日 《中国語文》发表社論《讓推广普通話的紅旗插遍全国》。
- 8月26日 福建省在大田县召开推广普通話現場會議。
- 8月 苏联語言学家凱涅斯巴也夫和諾明哈諾夫来我国訪問。
- 8月 教育部、团中央和广播事业局举办少年儿童講普通話比賽。
- 8月 丁声树編录《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9月22日 《中国語文》发表社論《在語言学界展开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批判》。
- 9月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編《語言学研究及批判》第一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9月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教研室青年教师、研究生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出版。
- 10月1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首都历史建設博物館筹备处主办的文字改革展覽会在北京开幕。
- 10月1日 《高等学校俄語教学》双月刊在北京創刊。
- 10月1日 《英語学习》月刊在北京創刊。
- 10月1日 邮电部試行汉语拼音电报。
- 10月12日 《汉语拼音报》在北京創刊。
- 10月17日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開設“文字改革”課。
- 10月30日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加注拼音字母”的通知。
- 11月15日 《語言学譯丛》季刊在北京創刊。
- 11月 《世界語运动簡訊》(内部参考)在北京創刊。
- 12月3日 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連环画、儿童讀物、扫盲讀物以及各种通俗刊物上尽可能加注汉语拼音字母”的通知。
- 12月13日 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苏联科学院語言文学部副主任Б·А·謝列勃連尼柯夫院士来我国講学。
- 12月13日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在北京逝世(1899—1958)。
- 12月13日 教育部发出“关于介紹山东、河北两省拼音字母扫盲試点經驗”的通知。
- 12月20日 上海語文学会举行《馬氏文通》出版六十周年学术座談会。
- 12月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集体編写的《汉语講义(初稿)》出版。
- 12月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汉语教研室編的《现代汉语》(上册)出版。

## 1959年

- 1月2日 上海市文字改革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 1月14日 广州市文字改革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 1月19日 《民族語文工作簡訊》(内部刊物)在北京創刊。
- 1月25日 《外語教学与翻譯》月刊在上海創刊。
- 1月27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員曹伯韓在北京逝世(1897—1959)。
- 1月 《語文》月刊在重庆創刊。
- 2月24日 內务部、教育部联合发出“試行雙人汉语手指字母方案”的通知。
- 2月 《語言文学》双月刊在呼和浩特創刊。
- 2月 梁东汉著《汉字的結構及其流变》出版。
- 3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利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和推广普通話》。
- 4月17日 法国語言学家馬·柯恩来我国訪問。
- 4月22日 《中国語文》展开建立新的“語言学引論”課的討論。
- 4月 《語文研究通訊》在保定創刊。
- 5月4日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举行語言学“五四”科学討論会。
- 5月 《中国語文》、《語文学习》和《語文知識》发表章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 7月 王勤、武占坤《現代汉语詞汇》出版。
- 7月15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第四批簡化汉字。
- 8月1日—8日 第44次国际世界語大会在波兰华沙举行，叶穎士代表中华全国世界語协会参加。
- 8月10日 第二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在上海开幕。8月21日結束。



## 介紹兩本苗漢詞典

《苗(黔東方言)漢簡明詞典(初稿)》(以下簡稱《黔東詞典》),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研究室、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二工作隊合編。貴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10月第一版,50開,418頁。

《苗(川黔滇方言)漢簡明詞典(初稿)》(以下簡稱《川黔滇詞典》),編者、出版者同上,1958年10月第一版,50開,452頁。

這兩本詞典是根據新創制的苗族文字,分別以苗語黔東方言、川黔滇方言同漢語對照而編輯的。由《黔東詞典》的凡例第一條看出,這兩本詞典主要是為了幫助初步掌握苗文並具有高小漢文程度的讀者學習苗族標準語而編寫的。为了不使篇幅過多,便於隨身攜帶,編者對於意義具體的本族固有語詞條目和漢語借詞條目只同漢義對照,未加說明和舉例。用法比較特殊或意義不很具體的語詞條目都有比較簡單的說明和舉例。這對於漢族學習苗文很有用處。

這兩本詞典根據苗族文字方案的規定,凡是苗語固有的詞都沒有連寫。看來,在編輯的時候也會努力使一個條目代表一個詞,不過里面也有一部分是詞組。例如,《黔東詞典》42頁: cob hfat bongf hsaïd 吹糠見米,《川黔滇詞典》44頁: cuat yangf cuat zhangd 各種各樣。在苗語什麼是一個詞的問題沒有解決以前,詞典的條目不連寫,兼收詞和詞組是便於檢查的。

對於漢語新借詞都是依照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漢語標準語的,同時也按漢語習慣連寫。這樣極便於掌握漢語拼音字母的人檢索。

在編排上,兩本詞典似乎是有意識地使體例不同。《黔東詞典》在條目前標※符號表示土語語詞,例如27頁: ※ bob denb 棉球; 球。標※符號表示歌謠用詞,例如342頁: ※ tak 轉,回。例: “Diangd mongl nenx diux, tak mongl nenx zaid” “轉他家,回他屋。”標★符號表示新借漢詞,例如257頁: ★ lianguan 連貫。標▲符號表示新創語詞,例如208頁: ▲ hxak fangd

vangl 民歌。而《川黔滇詞典》對於新借漢詞和新創語詞未作標識,對於方言土語語詞在解釋后用括弧注明“方言”字樣,例如87頁: droux 錘子(方言)[例] droux hlout 鉄錘, ib dol droux 一個錘子。對於歌謠用詞在解釋后用括弧注明“歌謠”字樣,例如200頁: los (歌謠)。現在看來,兩種體例各有優缺點,《黔東詞典》的優點是一眼就看出哪個條目是借詞、土語詞和歌謠用詞,缺點是滿紙麻子,版面不干淨。《川黔滇詞典》的優點是版面干淨,缺點是借詞、新創語詞和固有語詞沒有鮮明區分標識。總起來說,在這方面我個人覺得《川黔滇詞典》比較好,因為是否借詞和新創語詞由漢義一讀便知,不一定要加標識。尤其是新借漢詞本身沒有聲調符號,又是詞兒連寫,和苗語固有語詞在正字法上都有區別,更無須加標識。至於土語語詞和歌謠用詞用括弧注明比加標識也好一些,在查詞典時不須死認哪個符號表示土語詞,哪個符號表示歌謠用詞。

這兩本詞典還存在着一些缺點:

1) 書後沒有由漢字查苗詞的索引,這種索引對於不懂苗語的人是十分必要的。

2) 書前苗文聲韻調表未注國際音標,各條目也沒有注音,使不懂苗文的人不知怎樣讀音。

3) 除了《川黔滇詞典》僅注出狀詞的詞類以外,都沒有注出調類。這固然由於詞典中的條目有的不是詞而是詞組不便注詞類,但至少被認為是詞的可以注明詞類。這樣便於使用詞典的人利用詞典造句。

希望再版時克服這些缺點。

據我個人所知,在過去我國沒有出版過任何苗語詞典。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創制了苗文以後,才有條件出版苗漢詞典,它們雖然很簡單,但也足以說明黨所領導的民族語文研究工作的成就。在苗語研究方面文獻缺乏的情況下,這兩本詞典是彌足珍貴的。

聽說貴州民族出版社最近還將出版幾種漢語和苗族文字(包括苗、布依、侗)對照的詞典,這是可喜的消息,我們十分歡迎這些詞書的出版。(王輔世)

中國語文

月刊

1959年10月号

總第88期

1959年10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7號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45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北京市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每冊定價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期整訂)

1—20,760冊 代號2—4